

不被理解的毛泽东

卷八

作者：虚声

校对：**Kunter**

本文来自网络，涉及版权请联系作者虚声

第七篇 林彪篇（中）

——政治舞台上的林彪

四、林彪走上政治舞台

（一）林彪与叶群

要说政治上的林彪，必然首先说叶群。叶群之于林彪，怎么说呢，还真是难说。

叶群，生于一九一七年，福建福州人。叶群的爸爸叫叶琦，跟着国民党混的，级别不低，少将；名气不大，没啥作为。由于国民党腐败得比较早，所以跟着国民党混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基本需求供大于求。籍籍无名的叶少将也娶了三个老婆。叶群的妈妈为三姨太，很受叶少将的宠爱。叶群从小就聪明可人，自然是父母的心头肉。所以叶群受到很好的教育，去了北师大附中念书，毕业时已经十八岁，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彼时的叶群的所有的梦想也就是找一份好工作、找一个好男人，以后过小资生活。于是她凭借自身的努力（外加一点点关系）进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那可是铁饭碗哦。当然年轻的叶群是不甘寂寞的，时不时和国军军官搞点暧昧，甚至还和中统扯上点关系。如果局势一直这么发展下去，那么叶群的一辈子也就那么交代了。

然而抗战来临，原本精明的叶群成了爱国青年，和同学薛明一起，历经千辛万苦到延安。在延安，薛明成了贺龙的夫人，叶群则遇到了林彪。后来两人还因为叶群和中统那点关系闹得不愉快。

林彪遇见叶群之前，也经历过几段不算感情的感情。林彪老家有一段父母包办的婚姻，叫汪静宜。确切说没有结婚。但是汪静宜把自己视为林彪的人，为林彪守身一辈子。解放后林彪知道汪静宜生活艰难，想要接济。无奈叶群的胸襟不够。林彪只好悄悄托人给汪静宜捎点钱。汪静宜分毫没用，一直存起来。汪静宜之于林彪，就好像朱安为鲁迅。那个时代的女人啊！说什么好呢。

林彪在去黄埔军校之前暗恋过陆若冰。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陆若冰喜欢的是林彪的哥哥，林育南。这事前面已经说过。林彪第一个女人是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陆若冰给林彪的打击还是很大的。林彪的本性多疑敏感，话不多，但感情浓烈。被陆若冰拒绝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林彪的感情都是空白的。从黄埔军校，到长征至陕北，十年时间里，没有人知道林彪的感情世界。如果他想，如果他愿意，以井冈山上红军高级将领的身份，讨一个老婆还是可以的。但是林彪的生命和感情仿佛全部献给了战争。正因如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井冈山的林彪只对身上那个密密麻麻的小本子有兴趣。

长征结束后的林彪，随着共军一起摆脱了命运的危机，同时感情上也走了出来。所以他和张梅结婚了。然而很不幸，两人性格不合。原本战争年代，是没有机会考虑性格问题的。但是林彪在平型关大捷之后受伤了，去苏联治病，张梅也去了。张梅是外向型的女孩子，大大咧咧的那种，林彪的世界她不懂。当然，林彪的世界或许没有女人可以懂。但是林彪需要的，一个男人在女人身上需要的起码关怀还是必须的。为战争而生的林彪却因伤离开战场，心中充满灰暗。张梅也很有个性，对林彪不怎么妥协。于是两人吵架，闹矛盾。

就在那个时候，林彪在苏联遇见孙维世，随后展开追逐。其中的恩恩怨怨，在文革案例中已经讲过。林彪原本许下承诺要等孙维世，结果回国之后就和张梅结婚了。其实不是林彪拿感情当儿戏，而是他实在等不起了。因为他已经是三十大几的人了，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而且他是一个军人，为战争而生的军人。要命的是战争（抗战）即将结束。国共双方怎么走还是未知数。至少共产党一方还不想决战。所以林彪想赶上抗战末班车，实在没心思在感情上天荒地老了。所以林彪和张梅结婚了，没有所谓的恋爱期，没有适应过程，结婚了。当时他和张梅还存在着名义上的夫妻关系，他们还有个女儿叫林晓霖。放现在，标准的重婚罪。

但是不得不说，张梅是最适合林彪的女人。林彪的世界，张梅也不懂。但是张梅愿意围着林彪转，这是她胜过张梅的地方，也是让林彪决定不再等孙维世的原因。

林彪和张梅。生活上，张梅是林彪的另一半，两个孩子的妈妈，照顾林彪的生活起居。军事上，多余。

政治上，则是林彪的耳目。某种意义上讲，张梅充当林彪的耳目，不仅没能让他耳聪目明，而是损伤他的神经。当然这不是把林彪的悲剧推给张梅，但张梅在林彪的悲剧中起到负面作用。

性格上看，张梅并不是特别的强悍。她也没有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或许是生活相对顺利的缘故，她的个性展示并不充分。和江青比起来，有相当大的差距。江青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政治主见是明确的。即使晚年种种不利，也没有妥协。张梅更像一个普通女人，一个依附强大男人而存在的普通女人。如果说她有啥特点，那就是精明。那种精明适合生活，但不适合生活在政治舞台上。

遗憾的是，走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因为身体和性格的原因，使得不适合在政治舞台上耍的张梅成了他的主要助手。

从现在留下的资料看，张梅在林彪的政治生活中很少起正面作用。张梅一直没少给林彪败人品。林彪和贺龙之间最初的不愉快，很大程度上就是张梅惹起来的。这些前面说过了。因为张梅，林彪和罗荣桓还搞出了不爽。

林彪性格孤僻，基本上不和别人往来。但是在平津战役结束之后，突然去看望老搭档聂荣臻。两人客气一番之后进入正题：林彪想让聂荣臻去四野当政委。当时的聂荣臻已经加入军委，并且兼任平津卫戍司令，根本抽不开身。当然更让聂荣臻诧异的还是林彪为啥会有这样一个主意。因为四野原本就是以毛泽东的嫡系为班底的。司令员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栽培起来的。在整个共军高层将领中，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独特又亲密。后来的十大元帅中，论和毛泽东的亲密程度，林彪可以排第二位。排第一的，恰好就是罗荣桓。罗荣桓从秋收起义就跟着老领导毛泽东干了。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干实事，从不出风头。

罗荣桓担任四野政委，不论是人际关系还是个人能力乃至工作态度都是上佳人选。而且罗荣桓对林彪从来没有不敬。林彪竟然看罗荣桓不爽，让聂荣臻搞不懂。最终的原因竟然是叶群在枕头边吹风。

罗荣桓让叶群不爽，有两件事。一件是房子问题。东北战争期间，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去办一个学校，帮助孩子们上学，找不到校舍。罗荣桓就把之前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住过的花园洋房腾出来当校舍。那房子原本是分给林彪的。但是林彪住在前线，叶群也不住。当时的条件困难，罗荣桓就把它拿出来公用了。叶群很不爽，向林彪告状，说：“育蓉，罗政委带头搬家，是将我的军，搞得我没房子住，只有挪到一间小阁楼里。”林彪听了之后也很不爽。但这事并不是叶群不爽罗荣桓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第二个，孙维世。

林彪在苏联猛追孙维世，回国后又和叶群结婚。孙维世从苏联回国时已经是四八年，途经东北。孙维世还是那个孙维世，还是那个才貌双全的女人。叶群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自然没法比。因此叶群如临大敌，担心自己遭到张梅的命运。特别是有人提议让孙维世留在东北工作，叶群更是心惊胆战。向来谨小慎微的叶群为了把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决定大胆包天一把：不经任何领导同意擅自用罗荣桓的名义向中央发报，提出将孙维世调走。

罗荣桓当然很生气，让高岗找叶群谈话。叶群得知罗荣桓要追究此事，吓得向高岗跪地求饶。因为孙维世最终没有留在东北。如果林彪知道是叶群在背后捣鬼，肯定不会给她好脸色看。但叶群由此迁怒罗荣桓，开始对林彪吹枕头风曰，林罗不是一条心，林罗早晚得分手，要提防罗荣桓。

加上辽沈战役时，林彪和罗荣桓在对待锦州问题上不一致，所以林彪对罗荣桓开始不爽。但是叶群的作用还不止这些。十大元帅中，罗荣桓最早去世。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叶群竟然想办法敲打林月琴。典型的公报私仇。罗荣桓都不在了，还欺负人家林月琴，那不是给林彪败人品么？高层哪个不知道罗荣桓在军队的地位，哪个不知道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

叶群真正把林彪推入深渊的是罗瑞卿事件。

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说过，罗瑞卿倒霉，叶群并不是主角。但是叶群呢，只是一阵风，一阵不好

的风。林彪和贺龙之间，战争年代，贺龙资格比林彪老，级别从来不比林彪低。叶群的不良因素只是个人隐私。林彪和罗荣桓之间，罗荣桓资历也不比林彪低，就算初期没有林彪的上升速度快，等林彪从苏联回来时，两人已经平级。叶群就去吹风。罗瑞卿就不同了，虽然年龄比林彪大，但他的资历不如林彪老，级别从来没有林彪高，甚至入党时间都没有林彪早，一直都是林彪的部下。叶群更不会客气了。

解放之后，叶群好像从来不拿罗瑞卿当外人。所以当她有所需要，就会让罗瑞卿办。比方说当初她想评军衔。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是大校军衔。林月琴是红四军老革命，领大校军衔当之无愧。叶群也想去挣，去找罗瑞卿。罗瑞卿没有满足她。叶群最后得中校军衔，感觉很无趣。叶群是一个精明而不适合生活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因为她会把那种生活中的精明带到政治中。当她有什么需要，就会想办法找人解决。如果是林彪的四大金刚，迎着林彪鼻孔出气，那无所谓。但是罗瑞卿不同，罗瑞卿忠于领袖毛泽东，而不是领导林彪。在叶群的意识中，罗瑞卿仅仅比四大金刚的级别高那么一点点而已。罗瑞卿对她当然看不惯。

有件事很有趣。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五号，中央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当时罗瑞卿作为总参谋长发表了讲话，林彪对罗瑞卿的某些讲话不赞同，就以领导的身分给罗瑞卿指示。罗瑞卿回到家看见林彪的指示，然后又接到叶群电话：“总长，今天下午我有事去总后，就出了这个事。一〇一(林彪代号)发了大脾气，把两个孩子都吓坏了。现在，他已经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请你到我这儿来谈谈。”

等到罗瑞卿到毛家湾见到叶群，时间已经不早了。叶群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解释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他们两个也叫来。”那姿态仿佛在说男女授受不亲，实在没办法才如此这般。然后她又罗嗦一大堆本来不该由她说的话。虽然当时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已经走向破裂，但叶群这唱的是哪一出？如果她以林彪夫人的身份说话，那么军委工作跟她就没有关系。如果她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讲话，却又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避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罗瑞卿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老子已经忙碌一天了，深更半夜还要听你这婆娘罗嗦。如果是林彪也就算了。你只是林彪的婆娘而已，不要狐假虎威。但是罗瑞卿又不能发作，毕竟她只是一个婆娘，一个林彪的婆娘。罗瑞卿回家之后便对郝治平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是怎么回事！”确实不像话。很多事情就是叶群这么搞糟糕的。

最不应该出现的一幕还是在最后时刻出现了。拿下罗瑞卿原本是毛泽东和林彪发动文革的战略布局。但是导火索却是叶群拿着材料跑到杭州毛泽东那里揭发告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号早晨五点，毛泽东工作一夜，还没有睡觉。叶群跑去了，秘书告诉她有两个小时时间。结果叶群一口气讲了四五小时。结果很明显，毛泽东相信了她。

叶群当然可以揭发罗瑞卿，但是得有料才行。假如罗瑞卿叛国了，通敌了，干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揭发的那些是啥呢，要么就是罗瑞卿对林彪不敬等鸡毛蒜皮的消息，要么就是罗瑞卿和毛泽东思想不合拍等空洞玩意。那些事情原本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当时不论如何定论，日后历史总会做出客观评价。如果是别人揭发，日后可以说是搞错了。叶群亲自跑去，只能说那是有预谋的。叶群肯定想不到这些。因为她的精明适合生活。如果她足够精明，这种事就应该闪一边。

不仅如此，上海开会倒罗时，叶群又跑去作报告。讲啥呢，无法是把告密的那些话重复一遍。罗瑞卿事件是文革的标志性事件。日后否定文革，叶群的这些举动就是铁证。叶群的铁证也就是林彪的铁证。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罪名就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施行反革命。叶群就是提供证据的那个人。

（二）背景

大饥荒之前，毛泽东的臂膀有两个，以林彪为代表的军人，以刘少奇为首的文人。建国之前，战场上的林彪更为耀眼，刘少奇埋头于党务。建国之后，刘少奇走上前台，林彪身体不好，基本在养病。两条手臂原本交集不多，运转得很好。但是之后出现了变化。

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剿匪完毕之后，国家开始全面建设。特别是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各项职能都在健全。当时毛泽东打算把国家主席让出来。继承者要么是朱德，要么是刘少奇。后来朱德谦让了，国家主席便成了刘少奇。时间是一九五八年。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军内出现了反教条运动。刘少奇和粟裕错误地被批（参见第二篇）。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林彪身体好转，准备出山，并且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林彪和粟裕，两位共军之中才华横溢、性格相似的天才统帅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走向了两个方向。

如果国家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政策充分执行，那么刘少奇将成为中国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也就没有日后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话，新中国的历史将更为辉煌灿烂。

应该说在那样一个时间，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也做了两手准备：好的一手和不好的一手。

好的一手就是一切都好，具体表现就是粟裕。让粟裕靠边站，有两个目的：一，斩断刘少奇和军方的联系，二，为刘少奇日后留下一个掌控军事大局的人。因为刘少奇在军内威望并不高，和元帅的关系并不亲密。粟裕和刘少奇的关系不错。当初刘少奇整顿新四军，就发现粟裕的军事才华。而且粟裕比较年轻，身体也不像林彪那般虚弱。

不好的一手就是以防万一，具体表现就是林彪。建国之后，林彪的工作就是问题。林彪身体不

好，又不喜欢和别人来往，不懂政治。由于彭德怀从朝鲜回来，威望如日中天，也轮不到林彪掌控日常军事。而他的地位又很特殊，工作比较难。所以林彪就一直闲着，这地修养，那地疗养，闲了将近十年。

当刘少奇走向前台，准备大干一番。毛泽东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刘少奇背离了自己定的政策怎么办？虽然刘少奇和自己合作了几十年，虽然了解党和国家的一切，但是也要以防万一。不为别的，只因为伟大的政治家布局时总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而当时正是大跃进的高峰时期，各项数字指标似乎非常顺利，一切好像顺利过了头。

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林彪出山了，进入政治局，地位高于主持日常军委的彭德怀，而且在反教条中间表现很努力。尽管很努力，仍然不像政治家，答案很简单，不是搞政治的料。

然后意外就来了，大饥荒。

一九五八年还在丰收，到五九年开始饿死人。一切转变得太快了，让人难以接受。正是让人难以接受，所以大跃进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就在饿死人和大跃进的背景下发生了彭德怀庐山罢官的那一幕。

庐山之上的林彪表现依然很努力，依然不像政治家，答案很简单，不是搞政治的料。庐山下来，林彪取代彭德怀，掌控军事话语权。从那个时候开始，为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只等那一天的到来。

林彪和彭德怀有啥区别呢？战争年代，林彪和彭德怀是共军的支柱性人物，是毛泽东最信得过的人。但是两人还是有很多不同。从为人处事，到指挥风格，到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但是最大的不同还是对毛泽东的态度上。

彭德怀对毛泽东是尊敬的，信服的，但那得建立在事实上。说得更直白一点，彭德怀首先尊重事实，然后才是领袖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领导水平出神入化，彭德怀信服。所以危难之际，彭德怀总是挺身而出。庐山之上，建国之后，毛泽东出现了失误，彭德怀依然选择尊重事实。所以才有庐山罢官那一幕。

林彪对毛泽东则是另外一个样子。

（三）毛泽东使用林彪

要说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必须首先弄明白毛泽东如何使用林彪。

没有毛泽东的精心栽培，就不会有后来的林彪。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就认准他了。千里马与众不同，伯乐同样与众不同。

为了给林彪搭建平台，毛泽东可谓费尽心思。所谓平台，也就是搭档问题。毛泽东以常人无法察觉的眼光看到林彪的潜力。他要做的就是那种潜力最大化，就是选择搭档问题。当初王尔琢意外死在自己人手中，林彪接任红二十八团团长。当时的红四军党代表叫何挺颖。

何挺颖，陕西人，一九零五年出生，一代英杰。何挺颖大学毕业，而且是学数学的，日后又学习社会学，相当于文理双学士。作为热血青年，他参加过五卅运动，然后加入共青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北伐战争，担任团指导员（国军中的政委），如果在国军中混，也有不错的前途。但是他为了信仰抛弃了前途，站到当时衰弱不堪的共产党那边。

共军来源主要是南昌起义，一部分是秋收起义。何挺颖就是来自秋收起义，一直跟着毛泽东干革命，资历堪比罗荣桓。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把他放在党代表（政委）的位置上。但是团长的林彪和何挺颖不来电。林彪是天才型人物，阴沉沉的，恃才傲物。按照聂荣臻的话讲，就是“专断独行”，排挤同级的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何挺颖也是才华横溢。两个人搞不到一起，就会出乱子。后来何挺颖在战争中受伤。队伍转移时，军长林彪对受伤的党代表何挺颖不予理睬，导致何挺颖被杀。当然当时都很乱，谁也顾不了谁，这事不见得能怨林彪。但是如果要转移党代表还是可以的。

何挺颖之后，毛泽东又给林彪安排搭档，谢唯俊。井冈山上，毛泽东下岗失业时，连同下岗的还有四个人，毛、邓、古、谢四个人，被尊为毛泽东的小集团。毛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邓是邓小平，谢就是谢唯俊。毛泽东就把谢唯俊给林彪。

林彪和谢唯俊依然搞不到一起。林彪左看右看，看谢唯俊不顺眼，经常跑毛泽东那里倒苦水，说谢唯俊妨碍工作之类的。毛泽东也很伤脑筋，怎么办呢，看了身边低调踏实的罗荣桓一眼，你去吧。

罗荣桓去了，林彪不再抱怨。罗荣桓和前两任不一样，是多干事、少说话、凡事对林彪比较尊重的那种人。战争年代，林罗合作那么多年，除了在东北叶群叨叨出一点裂痕，基本和谐相处。是前面两个不行么，也不至于。这事应该牵扯到政策问题。

共军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党指挥枪。有时候政委可以把首长顶得很死。比方说新四军中，政委项英就把军长叶挺架空。比方说后来的政委饶漱石就把军长陈毅挤走很长一段时间。林彪的前两任，说白了比较较真，属于不让步的那种。罗荣桓呢，只是默默工作，把一把手的位置让给林彪。所以合作愉快。林彪是天才，天才都不喜欢被束缚。毛泽东要做的，就是把林彪的束缚除掉。也就是说在林彪身边，党指挥枪的那一条功能被减弱。后来共军统帅中，只有林彪和彭德怀身边的政委相对弱势。因为那两位太特殊了。

毛泽东用林彪，就是充分使用。为此宁愿削弱政委的一部分职能。这也是毛泽东用人了不起的

地方。看看对面的蒋介石，总是给军事天才旁边放一个拖后腿的。

战争时代如此，和平年代也是如此。

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掌握日常军委。毛泽东再一次给林彪搭建了平台。这一次他的搭档是罗瑞卿。建国之后，罗瑞卿一直在公安部长的位置上。庐山会议之后做到总参谋长，负责日常军委工作。

按照历史渊源看，罗瑞卿和林彪也是关系久远且紧密。罗瑞卿长时间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对林彪也是比较尊重。如果不是后来文革过于严重，两人不会走向决裂。

那么林彪对毛泽东是怎样一个心态呢？应该一分为二，军事上和政治上，两个方面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似，却又完全不同。

军事上，林彪对毛泽东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比方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复出掌军权，四渡赤水河之际，林彪说那是浪费时间、领导不行，导致毛泽东很生气，把林彪臭骂一顿。又比如说初到陕北之际，林彪又觉得不行，想去陕南打游击，又被毛泽东臭骂一顿。比方说东征时，林彪对兄弟部队支持不太给力，又被毛泽东罗嗦一顿。

尽管如此，这些并不能影响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他们是开诚相见的。东北战场，从四平保卫战到辽沈战役，林彪和毛泽东都有冲突，但那是积极有力的，起正面作用，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再多说。

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关系，真正有趣的是政治方面。

当时井冈山根据地草创，穷乡僻壤，吃喝拉撒都是问题，还要面对国军永无止息的围剿。林彪很纳闷，咱们有前途么？很多人都很纳闷。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近，就给尊敬的毛委员写信表达自己的困惑，新的内容归纳为：红旗还能打多久。

林彪出事之后，有人拿着这封信做文章，证明林彪心里早埋下反革命的种子。实际上完全不是那回事。当时很多人都很困惑。因为大家信仰的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差距很大。特别是苏联，人家在城市折腾一段时间就成功了。中国在城市里折腾不动。所谓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当时还不明晰。

毛泽东根据那个情况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

一，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

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信的内容点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武装割据啥的，概括起来就是现在大家都熟悉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封信解决了林彪的疑虑，也解决了很多人的疑虑。

但是最能体现政治上林彪和毛泽东关系的还是另外一件事，关于张国焘。

毛泽东的党内对手中，张国焘是一个狠角色。战争年代，毛泽东被取代过好几次，好几次下岗，跟陈毅、周恩来闹过矛盾，被博古、项英等人打压过。但是真正的危险则是来自张国焘。张国焘和其他人不一样，博古等人不过是书生。陈毅和周恩来行事光明磊落。而张国焘是个强权人物，他需要的是强权。毛泽东也是一个强势人物。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

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整风运动，杀掉上千红军干部。甚至连徐向前的老婆都杀掉了。曾希圣的哥哥，黄埔军校毕业的，创建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破译技术，也被张国焘杀掉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从级别上讲，中共中央在红一方面军，自然是主。而张国焘带的是红四方面军，

张国焘只是政治局委员，自然是次。

但是红四方面军实力远比红一方面军强大，有八万人马。红一方面军因为各种失误和斗争，只有不到两万人，而且衣着五颜六色，看上去像丐帮，物质奇缺。两军会师，相当于红四方面军接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李先念请红一方面军的杨尚昆吃顿饭，多弄了几个菜，把杨尚昆吃得很开心。

张国焘是个实用主义者，讲究实力的。一看这情况，立马联想到，中央这水平还不如俺老张干得好呢。俺老张把红四方面军调理得兵强马壮，中央军就那么一点人，不行，以后的事情得由俺老张做主。张国焘的办法有两手，政治和军事双管齐下。

涉及到林彪的部分是军事的。张国焘知道，红一方面军的支柱是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确切说是林彪和彭德怀两人。如果把两个人拉到自己怀抱，毛泽东差不多就成了光杆司令，凭什么和张国焘斗？所有张国焘就对两人表示亲切关怀。张国焘让人对彭德怀说，给人（补充兵员）给钱（现大洋）给物质。彭德怀不吃那一套，把张国焘的一切和毛泽东说了。

林彪则是另一番表现，不表态。在那种情况下，不表态意味着很多。以至于当时的政委聂荣臻都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比方说某次开会，张国焘的心腹陈昌浩把聂荣臻留下来搞拉拢工作，让林彪先走。这怎么解释？红一军团内部，林彪的作用远胜聂荣臻。为何做聂荣臻思想工作而不是林彪？

为此，聂荣臻还和林彪吵了一架。聂荣臻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林彪则不以为然：“不见得吧？”聂荣臻说：“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林彪回应：“你这是宗派主义！”聂荣臻说：“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林彪说：“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聂荣臻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林彪则反问：“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聂荣臻也不客气，拍桌子站起来说：“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这段对白恰好反映了林彪当时的心境。为啥张国焘还有那么多人？统帅也是实用主义者。他的思想还留在会理会议时代。在那里他挨了批评，就是因为军事主张和毛泽东不一致。此时对张国焘的心理是复杂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张国焘的实力无疑是非常强大的。

这么说有证据么？证据就是当时毛泽东的选择。毛泽东决定北上时做了如下安排：让林彪带着红一军团向北挺进，自己连同中央则随着红三军团走在后面。然后两个军团通过密码联络。按照当时的态势，红一军团人数更多，而林彪又是毛泽东一手提拔和培养的。毛泽东和中央理应跟着林彪

才对。

但是林彪并没有在政治上背离毛泽东。这个特性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林彪走上政治舞台。战争年代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和平年代就来了。

（四）林彪的选择

林彪一直都在选择，他面对的情况都是二选一。当初毛泽东和朱德争吵，林彪做了选择题，毛泽东。毛泽东和李德，林彪又做了选择题，毛泽东。毛泽东和张国焘，林彪还是选择题，毛泽东。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结果也证明，他的选择无比正确。其他人都没法给他提供他需要的平台。

建国之后的第一个十年，林彪不需要选择。因为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毛泽东。从第一次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再一次面对选择题，毛泽东和刘少奇。

如果没有那三年饥荒，第一代领导集团就不会出现明显分裂。没有分裂，就不需要选择。没有人想分裂，没有人想选择。但是在巨大的历史问题前面，所有的个人意愿都是微不足道的。前面已经说过，三年大饥荒主要是政策失误。

那个政策是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团体制定出来的。刘少奇原本是那个团体中的一个。当饥荒到来时，刘少奇试图调整那个政策，取得相当的成功。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那种更改。因为刘少奇的更改，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就是一种修正。

而毛泽东对修正路线是无法容忍的。不能一边骂苏联人搞修正，一边在自己家搞修正，很是说不过去呵。

但是刘少奇的修正确实起到了效果，以至于整个行政界都表示刘主席的办法不错。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基本上站在刘少奇那一边。当时的毛泽东是孤立的。

孤立之中的毛泽东发现身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林彪的讲话是在一月二十九号。他的讲话已经在刘少奇篇章里讲了一些，这里再大致说一下。两天之前，也就是一月二十七号，刘少奇讲了他那著名的“虎头蛇尾”的报告。

林彪首先讲了军事问题，老一套，就是可能来自北方（苏联）和南方的危机。然后话题转移到当前问题上：“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林彪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

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林彪说：“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林彪说：“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

——总之，三面红旗是对的，总路线是对的，大跃进是对的，人民公社是对的。

怎么评价林彪这个表态呢，三个字，想当然。

因为林彪半辈子沉迷于战场上，纵横天下，但是政治他真的不在行。虽然大家都说政治和军事是相通的，但是完全是两个操作系统，两套技术手段。军事上，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把对手的肉体消灭就行。政治上，管你用啥办法，得把大家的嘴堵上。

林彪的专业技术是消灭对手的肉体，堵嘴是不可以的。而且林彪一直在养病，养病的地方就是东北、北京、北戴河、苏州、杭州几个地方。那些地方也有饥荒，但灾情并不严重。所以也可以说林彪对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懂。

但是既然走上政治舞台，就要想办法把大家嘴堵上。面对灾情，林彪如何解释呢？

林彪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林彪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

没有生产出来，相反的，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还是想当然。因为他并不了解灾情。

这样解释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忽悠不知情者也可以。但是七千人大会上那些人，哪一个都是千锤百炼，都是从地方跑上来的，大饥荒每一个人都有份。如果不是灾情严重，按照他们的行为作风，下面自己解决了，没必要跑到中央检讨，多丢人啊。

林彪这么解释，也算客观上为大家开脱。但是说服力显然不够。原因很简单，漏洞太大了，已经难以糊弄。烂摊子怎么收拾？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如何面对自己的信仰？林彪显然没办法解释。但是林彪终究是林彪，他又想到一个办法。

林彪说：“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林彪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就是林彪的想法，不是毛泽东思想错了，而是大家把毛泽东思想执行错了。

当时当然可以这么解释，现在也可以这么解释，但仅限于理论上。但问题在于，三面红旗也是毛泽东的思想结晶，也是政策。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马龙山、路宪文、吴芝圃、李井泉等人都绝对不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重新来过。

林彪想当然地以为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怎么样，正如他想当然地夸大天灾是一样的。毛泽东思想在原则上是行得通，具体政策上可能是错的。正如孔子思想总体上行得通，但是具体到君君臣臣政策上就可能是错的。正如基督思想总体上行得通，但是具体到教会教条上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林彪不懂这一切。因为他的专业是军事上。当然，也可以认为，他懂，但是没有说，或者不能说。

总之，他把思想和政策混为一谈，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远比战场决策失误严重很多。

这一篇讲话概括起来就是，大家有错误，自己找，领袖是没错的，大家要继续跟着他。反正我是跟着他的，谁敢反对他，我就不答应。不信可以试试看。就这样，洗洗睡吧。

从林彪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看，他并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即使了解，也是通过各种资料。即使详尽的资料也不如实地考察。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有外出实地考察的。毛泽东自己坐车外出巡游，秘书回到各自的家乡调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全部亲自外出实地考察。

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林彪为何对不了解的世界长篇大论发言呢？换句话说，身处高层，不管想与不想，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很多立场和目的。对于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而言，那么大张旗鼓地支持一个人，总会有自己的目的。那么林彪的目的是什么？

林彪的笔记里有过这样一段话：“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这段话现在被用来证明林彪是个野心家。林彪是不是野心家暂且不论，但这段话里透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法统。

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继承了他的工作，把《资本论》补全，干得很漂亮，成为马克思之后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带着苏联完成了工业化。蒋介石无时无刻都在宣传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他们之间，都有一种联系，就是法统。

所谓法统，也就是继承人的地位。

林彪从他的角度出发，在他的知识范畴和思维方式中得出如此结论，就是要继承老领导毛泽东的事业，为毛林。但是林彪的处境远比恩格斯、斯大林、蒋介石糟糕。

恩格斯续写《资本论》时，马克思已经过世，留下第一国际的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而恩格斯恰好是收摊子的人，而且收拾得很不错，不仅补全了，还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事情必须有人完成。恩格斯完成了那些事，所以有了继承权。

列宁的苏联也是一样，内忧外患，敌人一波接一波，问题一波接一波，危机一波接一波，看起来摇摇欲坠。列宁死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真空，说白了也是一个烂摊子。斯大林通过谋略上位，通过铁腕扫除一切。在斯大林的铁腕下，苏联迅速完成工业化，然后才有苏德战争赢得胜利，威望达到顶峰。

孙中山就不用说了，去世时的全部地盘也只有广东一隅，还受陈炯明的威胁，也是一个烂摊子。蒋介石带着一帮人南征北战，东拉西忽悠，基本上统一了中国，赢得继承权。并且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看看这几个人，需要如下条件：一，在前一个人身边扮演重要角色，恩格斯在马克思身边扮演重要角色，斯大林在列宁身边扮演过重要角色，蒋介石在孙中山身边扮演重要角色。这个条件林彪符合。林彪一直在毛泽东身边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个条件，前面那人不在了。恩格斯当老大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斯大林重整苏联是在列宁去世之后。蒋介石修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也是在孙中山去世之后。这个条件林彪不符合。当时毛泽东才六十多岁，身体健康，精神很好，思维敏捷，看问题尖锐，正准备大干一番。反观林彪身体倒是弱不禁风，给人摇摇欲坠之感。

第三个条件，烂摊子。马克思、列宁、孙中山都留下一个烂摊子等人收拾。中国当时也可以说是烂摊子，经济建设走向死胡同，大饥荒导致那么多人挨饿。政策继续调整。应该是另一个大人物出现的时候。林彪选择了在那个时候表演，应该说眼光还是很准确的。但是结果已经很严重，那个人，如果说有那个人的话，也是强调政策调整的刘少奇，而不是林彪。

从这几个条件来看，林彪想要成为“毛林”，情形不容乐观。因为他只能躲在毛泽东身后，所有的政策都是毛泽东制定，所有的荣耀归毛泽东，所有的过失也归毛泽东。尽管林彪足够出色，足够威武，干过很多事，但是跟他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差别依然很大。

林彪决定好好努力，加油干活，缩小差距。条件不成熟那就创造条件。他创造了什么呢？两个字，政治。

（五）大比武

七千人会议之后两年，毛泽东搞小四清运动，然后刘少奇又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里，军队也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练兵比武。

当时军委要改革训练方式。李德生少将在部队视察，苦思冥想新方式的内容。李德生，河南新乡人，生于一九一六年，起于红四方面军，从小兵干起，一步步上升。长征中由于张国焘反复，草地过了三次，雪山爬了两次。抗战中参与过奔袭明阳堡日军机场，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又直接参与淮海战争，随后加入志愿军，在最残忍的上甘岭战役中接受考验，可以说是身经百战。这样一个人，经历过共军历次战斗的老将，作战经验上无可指责。这样一个人想要寻找新的训练方式，一定不容易。因为之前的共军经历过各种残酷而残忍的考验，能生存并胜利，可以说方法是有用的。但也正是条件艰苦，战争一波接一波，基本上都是在实战中磨练，系统训练很少。现在要改革训练，怎么改变？

李德生也学着政治运动的办法，到各个部队去蹲点。蹲过很多地方，都很失望。失望过多次之后，迎来巨大的希望。一次蹲点中，他找到一种让他满意的训练方式。李德生认为，问题解决了。于是他找到那个指挥训练的副连长，郭兴福。

那种让李德生心动的训练方式是郭兴福亲自创造的。

李德生把郭兴福塑造为典型。这个典型和四清运动中塑造的典型完全不是一回事。政治运动中的典型，多半都是斗争的产物。而军训典型，是骡子是马都要遛的。而且郭兴福能否成为典型，不是李德生说了算，上面还有很多大人物的。大人物看，行。

一九六三年底，叶剑英给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发一封信：“罗总长并报军委：我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南京，二十四日到镇江参加总参军训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看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以后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总共有十九个课目）。看了以后，大开脑筋，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在全军推广一种方法提高军人素质，名曰郭兴福教学法。

郭兴福何许人也？能让叶剑英如此看重？就是典型的共军：贫农家庭，幼年丧父，生活困苦，没念过几天书。因为吃饭问题跟了共产党，然后又信仰共产主义。但是郭兴福算是战争年代最后一批共军。一九四八年，十八岁的郭兴福加入共军，是典型的后进生。但是来得晚没少干活，淮海、渡江、淞沪、漳厦等战役。打完仗后，到军校“进修”过一段时间。大饥荒时代在南京军区当副连长。

但是英雄不怕出身低，英雄不怕地位低，英雄不怕文化低，一切可以在实践中得到。

虽然全国大饥荒，但是郭兴福没有闲着。作为基层军官，他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创立了一种新的练兵方法，即郭兴福教学法的原创作者。主要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谆谆善诱，耐心说服。

反正理论就这么多，要做全军推广，必然是大动作。

当时大家都在搞政治运动，还折腾啥大比武呢。

中国军队打完抗美援朝已经七八年了，没怎么动过。虽然在六二年时敲打了印度，也只是小规模。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大规模陈兵，战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数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远比今天的钓鱼岛地区压抑烦闷。而南方也不平静，越南那边一直在闹腾呢。虽然七八年不用兵，士兵却随时都可能上战场，正是在那种情况下，军委搞出来了一个比武练兵。

罗瑞卿收到叶剑英的电报后，立即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仔细审读了一遍，把“把兵练得

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下面划了一道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同时指示，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而且让主官一把手亲自抓。

事情就这么定了。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号，中央军委关于全军学校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

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现将叶剑英同志参观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后给军委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军委同意叶剑英同志的报告。全军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宣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规模，大体上要像宣传学雷锋、学好八连一样，要反复宣传，使它深入人心，引起全军广泛的密切的注意。

郭兴福教学方法，不单是包括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还包括作风问题，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军推广，以使军委和林总关于军事训练的方针、原则、方法进一步落到实处，使我们的军事训练工作练出更能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

军委相信，只要全军共同努力，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全军就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好的新的“郭兴福”；一定会出现一批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行各业自己的“郭兴福”；一定能够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附去叶剑英同志的报告，请一并加以研究，认真贯彻执行。

调子定下来之后，剩下的就是推广了。罗瑞卿亲自去抓。随后的时间里，罗瑞卿到处宣传推广那个方法，搞得很多人不以为然。毕竟嘛，大家都是老家伙，见过世面的，后生小辈郭兴福能有多少能耐？

一月二十五号，罗瑞卿找到机会，搞一场现场表演。观看者有陆、海、空军军以上单位的首长、高等军事院校首长、各总部业务部门的负责干部一百多人，都是牛人。罗瑞卿也不说废话，直接让郭兴福上场表演。大家一看这不是演戏，要来真的，都集中精神，看看到底有啥门道。

一年之中，一月份最冷。郭兴福很不走运，碰上阴雨绵绵的天气。那种环境下，即使穿上羽绒服也能冻得牙齿打架。当然郭兴福和他的战友们是没有羽绒服的，只能刺骨的寒风和绵绵的阴雨中现场表演。表演的舞台就是训练场，而且很泥泞。不是遭罪受么这不？但是没办法，这不是别的，是要上战场的。战场之下狠一点，战场上成活的概率就高一点。如果搞室内表演，就郭兴福他们那相貌是吸引不了那些牛人的。人家看文工团岂不是更好？

郭兴福一点也不含糊，指挥战友们就在泥泞中施展，很快变成一个泥人。但是他们没有停下

来，一连串演出几个小时。要知道那种天气下，全身泥人，搞不好就送命了。但是从头到尾都是生龙活虎。各位将军们也不含糊，冒雨观看不说，而且越看越起劲，丝毫没有看文工团提不起精神、开会打盹的现象发生。大家仿佛又回到了烽火连天岁月，想起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刻，想起了寒冷的朝鲜战场。

他们真心地为郭兴福鼓掌、喝彩。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称赞：郭兴福真把兵练活了。在小组会上，他忍不住第一个发言：“过去我们也当过基层干部，也教过战士，但是没有郭兴福搞得好，他教得严、教得细、教得活。战士稍有一点差错，他能及时发现，耐心纠正。他训练出来的战士，脑子反映很快，能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处置和动作。我们的部队如果都能训练成这样，那就什么敌人都不怕。”

军事学院院长张震说：“今后打过仗的老干部越来越少，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做才能使新干部把我军优良的战斗传统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传下去呢？现在郭兴福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采用多流汗，多用脑的办法，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多年用鲜血凝结起来的宝贵经验传下去，并且大大发扬起来。”

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说：“从红军起到现在，没有看过一个班的防御搞得这么好。”在表演中，特别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有两位政治工作干部，一位是随侦察兵进行攀登作业的指导员侯书信，另一位是随通信兵进行架线作业的副指导员商顺富、侯书信已30多岁，但同战士们一样全副武装爬上峭壁。商顺富同战士们一样爬高竿、上房檐。大家看了都说：“这是郭兴福教学方法在政治工作干部身上开出的鲜艳花朵。”

——看这口才，刚刚滴。

大比武规模空前，而且赢得了很不错的口碑，应该说圆满成功。

罗瑞卿总结发言：“过去主要靠打仗来训练，现在主要靠训练学会打仗。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战备。”

罗瑞卿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军事训练的方针和原则，是编写条令教材的指针。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训练方针和原则，还必须有正确的训练方法。而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成熟的教学方法。”

罗瑞卿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是红、活、硬、细、实。红指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政治上好；活就是教得活、学得活，练得活、用得活；硬就是战术过硬、技术过硬；细就是教得细致具体；实就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从实际出发，从实战需要出发。他指出：郭兴福教学方法着重在一个‘练’字。只有下苦功夫练，才能真正练出硬功夫。”当然最后还是老一套：号召

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掀起军事训练的热潮，把我军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此刻的罗瑞卿是得意的。身为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他是此次大比武的实际策划人和执行者。大比武如此成功就意味着个人干出了成绩。特别是和平年代，军事长官想干出点成绩不容易的。因此他有得意的理由。

罗瑞卿的特长也是搞军政，但是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局势非同寻常。或者说正是意识到局势非同寻常，才要搞出点成绩，增加自己的筹码。当时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方兴未艾，从小四清到大四清，高层分歧越来越大。军方虽然相对封闭，但大家都是共产党，一家人不是，政治中的分裂必然波及到党内，再从党内延续到军内。

南京大比武掀起了一股热浪，向四面扩展。然后是天津大比武，济南大比武，随即又掀起一系列军事演习。一连串的动作中出现很多问题，主要是钱的问题和人的问题。

先看钱的问题：比武也好，演习也罢，归根到底都得用钱，用很多钱。虽然大家都是老干部出身，能节俭就节俭，能将就也行。但依然要花钱。那个时代的中国刚刚从大饥荒中走出来，老百姓贫苦，国家也穷。一点资源都是心头肉。而且全国范围内查账啥的。此时通过大比武和演习花那些钱，虽然是国家形势不妙，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但是必然有很多人眼睛在盯着。

再看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就是风气问题。中国人有一个特征（或许外国人也有）（好坏先不说），就是喜欢跟风。一种新的东西出现，受大家追捧，马上必然有很多类似的玩意潮水般涌来。比方说一个电影票房好了，马上就有无数类似的电影，直到让观众胃口道完。这个特征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

一个郭兴福在大比武中红了，就会有很多类似的人物出现，他们是李兴福、王兴福，他们是典型。郭兴福人家虽然红了，但是人家有真才实学，确实有能耐，值得推广。知道几十年之后，文革结束，郭兴福死去，郭兴福教学法还在影响军队训练。但是跟风者就不一样了，就是跟风而已。原因很简单，军事训练，每一种训练方法都是千锤百炼。可不像商品，把手机换块电池就是另一个牌子，把药物中的某种成分增加或减少一点就是新药，那是忽悠人却有利可图。军事最怕忽悠。

典型的背后都有人在支持。每个典型都是钱堆出来的，需要包装、策划、宣传，都需要钱。国家根本就没多少钱。给军队的经费也是有限。有限的经费用来浪费，那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周边危机四伏的情况下。

那种情况下，罗瑞卿在到处推广郭兴福时又多一个任务，到处灭火：典型不需要太多。

但是私下忽悠不可怕，上升到政治问题就大了。

那么这一切和林彪啥关系呢，关系很大。

（六）突出政治

和平年代，军队搞大规模动作，实际是一笔政治资本。这笔资本中，荣耀归于罗瑞卿。因为他是实际负责人。罗瑞卿一人去负责大比武，实际上有点大包大揽的嫌疑。比方说，当时叶剑英元帅主管军事训练。大比武也是叶剑英写信给军委提出的。当大比武开始时，竟然没有叶剑英什么事。只有罗瑞卿在搞。按道理说，叶剑英级别比罗瑞卿高，干革命资历比罗瑞卿早，军方根基也不差，又是主管那方面的工作，没理由被晾在一边的。

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虽然主要罪名很扯，但是有部分还是对的，就是有点嚣张跋扈、刚愎自用。仅仅怠慢叶剑英一人，那也好说。还有一个人是罗瑞卿玩玩不应该怠慢的，就是老领导兼顶头上司林彪。

正常情况下，那么干也是没问题的。因为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和林彪一样，罗瑞卿也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想当初罗瑞卿大难不死，孤身一人从武汉跑到井冈山，找到组织，一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无论什么情况下，罗瑞卿对毛泽东的态度不会变。从建国第一个十年，让罗瑞卿当公安部长就能看出来。从庐山会议之后，让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就能看出来。战争年代看，罗瑞卿和罗荣桓一样，是林彪的好帮手。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成为军方招牌，他的搭档就是罗瑞卿。军委日常工作也是由罗瑞卿主持。

但那时不正常情况，因为建设出了问题，大家都在搞政治运动。同在一党的屋檐下，都免不了。罗瑞卿和林彪，名义上是军方，实际上政府内部也有职位。而且扯不清。

就军委内部说，罗瑞卿和贺龙关系很亲密。贺龙和林彪关系一直不怎么样。贺龙是前辈，林彪是后起之秀，加上薛明和叶群那扯不清的关系，庐山会议之后又存在竞争。贺龙和彭真的关系很好。贺龙和薛明搞恋爱，彭真就是媒人。到北京之后，彭真更是经常拜访贺老总。而彭真正是刘少奇最重要的助手，而且和林彪关系很不好。当初在东北，两人矛盾一大堆。而罗瑞卿本人和彭真关系也很铁，从延安时代就不错。比方说建国之后，北京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常常展示一下革命同志之间的亲密友谊。

由于罗瑞卿当时的地位很重要，刘少奇对罗瑞卿也很客气。而此时刘少奇已经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七千人大会上，除了林彪之外，罗瑞卿并没有明确坚定地表态支持毛泽东。相反，彭真还在大会上火了一把，说毛主席也该检讨。

这些关系实在太复杂了。正是这些复杂的政治关系把大比武提升到政治层面，把它推向政治层面的，恰好是林彪。

后来林彪责怪罗瑞卿不通气，根源就是从大比武时代开始的。因为那事确实没有对林彪表示足够的尊重。毕竟林彪是军队代言人嘛。虽然小事不怎么管，全军比武那样的大事，不可能放任的。

邱会作后来回忆，林彪听了汇报后说：“空军的建设有成就，对空军应当宣传一下。”为啥要学空军呢，空军司令刘亚楼是林彪的铁杆。罗瑞卿原本也是铁杆，现在生锈了。林彪让罗瑞卿学习空军，实际上是传递信息：不要跑太远了。

按照邱会作回忆：林彪知道刘亚楼和罗瑞卿混得过密，经过反复考虑提出向空军学习，从而拆散罗瑞卿和刘亚楼之间的不健康的关系。罗瑞卿对林彪的这一举动感到突然，他说：“我们真跟不上林总的思想，学空军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表面上采取了拥护的态度，却又在办公会议上说：“学空军是有政治目的的”。

不错，一切都是政治目的。问题是那个目的该如何解释呢？

罗瑞卿的大比武，作为罗瑞卿的上级，林彪要突出政治。

突出政治，日后成了林彪的罪状。

根据这个罪状：政治斗争是不好的，林彪在政治斗争之中突出政治，加速了政治斗争，使得很多人受到伤害。所以林彪是坏人，很坏的那种人，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吹牛拍马屁、不顾他人死活的那种坏人。仿佛日后的种种不良现象，都是因为林彪的不良目的，即以“马恩”“列斯”“孙蒋”为目的，继承毛泽东的地位。

实际情况如何呢，过度的政治斗争确实不好，林彪确实在政治斗争中突出政治，但并不能就此认定林彪是很坏的那种人。

首先看突出政治，这并不是一条很大的罪状。因为突出政治是党的传统，即使在军内，当指挥抢也是一条铁律，谁敢触碰谁就会死得很难看。身为军界的招牌人物，如果林彪敢对政治视而不见，那才是见鬼了，结局将会可以预见，彭德怀的例子就在前面嘛。

林彪突出政治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对毛泽东有交代，伟大领袖，俺是忠于你的，以前是，现在还是。所谓突出政治，还是重复那些老话题。老话题就是遵循当的领导，毛泽东是党内一把手。那是战争以来形成的传统和政策。在那个政策之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无法撼动的。这个思想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思路一脉相承的。

那次大会上，林彪对毛泽东表达了言语上的支持，还表达了团结的重要性：“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当时林彪是抓住“团结”做文章。因为历次困难面前，共产党的法宝都是团

结一致。

没有人想要破坏团结，但是巨大的灾难面前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所谓分裂，也就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人要“调整”之前的政策，走“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强调团结，就是要威慑他们。

如果说那次大会还是言语上支持。此后的时间里，言语表了行动上的支持，即以军方招牌人物的身份表态，突出政治，加强团结。如此，相当于代表军方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当时的政界，正是刘少奇全力拔高四清运动，把小四清推向大四清的时期。

另一个目，是对下。

大比武基本上是罗瑞卿一个人在搞，连主管军训的叶剑英元帅都没有多少镜头。作为罗瑞卿老上级的林彪，自然也很不爽。特别是联系到罗瑞卿与彭真、贺龙、刘少奇的关系时，更为不爽了。至少林彪明白，罗瑞卿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个罗瑞卿，至少不再对他林彪言听计从了。

林彪在那个时候强调政治，正如强调他对毛泽东的支持一样，同时也在敲打罗瑞卿，不要走太远，最好还是支持你的老领导。

但罗瑞卿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有自己的打算（参照前文），但还是低估了一点，即林彪在军中的巨大影响力。共军之中，像彭德怀、林彪那种级别的人，除了毛泽东亲自出马，是谁也难以撼动、难以取代的。

从当时的局势和林彪的身份、处境看，选择那个“突出政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看问题要看本质，本质就是，虽然“突出政治”可以理解，却是务虚不务实。

务虚，说白了就是不干实事。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作为技术手段，片刻的务虚是可以理解的。不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长时间的务虚是不可以理解的。那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不论是谁，掉进那个陷阱里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毛泽东也好，林彪也罢，或者说甲乙丙丁等草根。

（七）务虚与务实

政治舞台上，看看史书上赞扬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务实主义者，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成就的人；那些被批判的人，基本上都是务虚。

务实之人，看看秦国的商鞅、齐国的管仲，都是通过自身远见和卓越的政治才华赢得了一系列赞誉。再看看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也是一样。干了实事，让国家和百姓得到利益，总会被记住的。

务虚之人，看看党派之中的那些阴谋家和书呆子，满口仁义道德，但仅仅停留在嘴上。比方说唐代的朋党之争，比方说明代的阉党和东林党。都是满嘴大道理，却不能把哪怕一点点的道理落实下来的主。用一副对联给他们画皮：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看见务虚和务实两个字，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务实是干活，务虚就是不干活。不是那样，很多人务虚，同样也是忙得噼里啪啦，开会、作报告、走场宛如一台工作机器。

对高层而言，务虚和务实的区别在于：说出去的话、制定好的政策能否贯彻实行。林彪想做那种人？当然不想，问题是他在干那种事。

对林彪来说，他的前半生毫无疑问是务实的，因为战绩摆在那里。之所以说是务实的，之所以能赢得那么大的战绩，皆因我班子稳固，军令如山，言出必行。后半生则是务虚的，因为陷入政治斗争中无法自拔。而政治斗争中那些口号是没办法落实执行的。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但他只是一块牌子，因为他没有彭德怀那般的精力和身子骨，啥事都能自己动手。林彪更多的时候是待在恒温的房子里苦思冥想。军委日常工作本来应该是他的份内事，却落到贺龙和罗瑞卿身上。贺龙从来就不是给林彪打下手的。至于罗瑞卿，本来对林总客客气气的，时间长了，活都是自己干的，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军委日常工作是林彪亲自抓的，大比武是林彪亲自搞的，那么在开会时“突出政治”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干实事的人跟他不在一条船上，他就变成了务虚主义的代言人。

但从林彪的性格上讲，他从来就不是务虚的人。他甚至懒得因为要搞人际关系而讲废话。他制定的那些战术也是实用的。如今转战政治舞台，虽然布景、道具都变了，林彪还是那个林彪，依然不是务虚的人。但是他一直在干务虚的事，吧唧吧唧讲，讲了半天还是空话，因为干事的不是自己的人。

前面说过，处在他的位置上，必须“突出政治”，操持日常军委事务的两个大人物他无法驾驭。为了突破那个尴尬，为了“突出政治”变得言之有物，唯一的办法就是换人。把各个重要部门换成听话的自己人，让整个军委像当年野战军司令部那般有效。

但是贺龙和罗瑞卿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特别是贺龙，共军中非常独特的一个人。想动他们并不容易，而且不可能一步达到目的。在达到目的之前，必须进一步制造麻烦，等待局势变迁之后重新洗牌。如何制作麻烦呢，继续务虚，继续讲政治。

军方本来就不是一个务虚的地方，因为政治运动风波波及进来，才搞得风浪很大。但不管风浪多大，军内同志们基本上都是实干家。对于说话、讲理论那一套，有领袖去干就可以了。其他人最好还是个干个事。道理是很明白的，一个队伍内部，有一个诸葛亮那是好事，有助于提高办事效率。

大家都是诸葛亮，那就要乱套了。

要讲述林彪当时的处境，只需要看看他和罗荣桓的关系变化就知道了。战争年代，林罗铁板一块，为共军最经典的搭档之一。就是那样一个铁杆搭档，却在和平年代出现了裂痕，而且他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

五、罗荣桓倒下

（一）罗荣桓元帅

十大元帅中，罗荣桓是特别的一个。因为他是政治元帅，他的存在体现共军特色。湖南走出的共军三大元帅中，各个都特点鲜明。彭德怀和贺龙就不用说了，罗荣桓的特点就是低调，低调到让人以为没有特点。

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最为亲密。毛泽东如此重视林彪，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没能跨过罗荣桓。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号，罗荣桓去世。当时毛泽东正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负责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元帅正在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破裂，也是中国原子弹和导弹攻关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听到消息之后，让大家起立默哀。

默哀完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一九零二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天夜里，毛泽东的心思都在罗荣桓那里。夜深了，不能入睡。吃了安眠药，还是久久不能入睡。躺下又起来，写了首诗——《吊罗荣桓》：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鸢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一辈子写诗不少，大多都是豪迈豁达之作。真正怀念故友的只有两首，除了《吊罗荣桓》，另一首为《蝶恋花·答李淑一》。那首《蝶恋花》也是浪漫豪放之作。唯有这个《吊罗荣桓》情真意切，真情藏于安宁。毛泽东和罗荣桓的关系，就是这首诗里的关系，低沉。低沉到两人共事几十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十大元帅中，只有罗荣桓是跟着毛泽东从秋收起义中走出来的。但是那并不是他和毛泽东关系亲密的理由。特殊的罗荣桓元帅首先是一个特殊的人。

罗荣桓，原名慎镇，字雅怀，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一个乡绅之家。因为家境还可以，受到不错的教育，先是念私塾，然后念新式小学，再读中学，最后进入青岛大学。那时候恰逢五四运动爆发，那时代火一样的热情击中了罗荣桓的心。随后又去武昌中山大学念书。两所大学中，罗荣桓选的都是理科。

他的最初志向是一名建筑师，想走实业救国的路子。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当时那年头，一个建筑师能否找到工作机会先不说。即使找到工作机会，毕生的心血，也不够一场战争破坏的。太黑

了，世界太黑了。想救国，当务之急不是实业，也不是建筑师，而是首先终结掉那恐怖的黑暗，让有志之士和有才之人有一个平台。那就只能干革命了。

所以出身乡绅之家——不愁吃穿、大学毕业——应该也能找个职位混饭吃的罗荣桓投身革命事业。在日后的岁月里，罗荣桓单衣草鞋遮体，小米饭、南瓜汤果腹，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但是他不后悔。路是自己选的，信念是自己的，那就不用回头。

不仅自己不后悔，还用自己的知识帮助他人，解决同志们的困惑，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工作。他从最基层的连队干起，与贫苦农民出身的广大战士同甘共苦，而且身先士卒，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榜样的作用与革命理论相结合，效果非常的好。

罗荣桓参加井冈山起义，然后队伍转移。队伍转移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减员、逃兵、思想悲观，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那些问题，毛泽东在三湾那个地方搞了一次改编。三湾改编在共军历史上非常重要。多重要呢？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创造性提出了富有共军特色的“党指挥枪”的原则。

正是那次举世闻名的改编中，罗荣桓开始了党代表的职业生涯。他带着一副近视镜在一群大老粗中看起来是那么的另类——而他的工作却是那么的有效。

罗荣桓的工作是啥呢，就是搞政治工作。现在提起政治工作，很多人会想到，那就是磨嘴皮子，责任心强点的就多搞点人际关系，责任心不强的照本宣科念文件了事，很容易嘛，没啥大不了的。但是在罗荣桓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

罗荣桓那个时代，政治工作最难搞。因为队伍是新的——自己招兵；要灌输新思想——什么党指挥枪啊、官兵一律平等啊；没有军饷——就是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这些问题要落实非常困难。每一条要落实下去都很困难。怎么落实呢？当然是讲道理。一天讲不完两天讲，然后天天讲，月月讲。

讲道理是需要水平的，光能言善辩还不够，还要有耐心。一天把道理说完，让大家遵守，第二天自己跑去睡大觉了，那是不行的，还要当模范，就是所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在队伍建立之初，大家对“党代表制度”没啥概念的。特别是那些从旧军队出来的兵油子，对党代表的态度，完全是看人，跟制度没关系。如果党代表能打仗，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赞叹“兄弟佩服”，尊重之余还会端茶递水；如果没有那打仗本领，一边玩去，不要跟大爷推销那套“狗皮膏药”，大爷健康着呢，没病。

对很多人来说，所谓闹革命就是打仗，现在农村吃苦受累，就是为了打进城里去，去吃喝嫖赌享受一番，传统嘛，要党代表干嘛？当然那些大爷们也比较有能耐，比方说赌博，有几个赌鬼赌钱时，派人在门口放哨。他们在自己的腿上拴上绳子，绳头交给放哨的，政委一来，放哨的一拉绳子，

里面就赶紧收摊子。

这就是罗荣桓要面对的工作。怎么办呢，罗荣桓的办法当然是批评教育、再批评再教育，自己力量不够，就让大家一起批评教育，就不相信搞不定一帮兵油子。连那帮兵油子都搞不定，怎么打天下、怎么解放全人类？嗯？呵呵。

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一锅粥。对于那些老鼠屎，倒还容易办，能批评教育就批评教育，实在不行剔除队伍算了。真正的困难在于那锅粥。

林彪当上红四军军长时，政委一直是个问题。后来罗荣桓去了才解决问题。当时红四军的第三纵队（和后来的纵队不是一个概念）刚刚组建，问题一大堆。罗荣桓亲自入驻，解决问题。他发现那里天天吵架，也没大事。就是队长是湖南老乡，爱吃辣椒。政委是广东人，偏偏不爱吃辣椒。买菜的时候，队长经常嘱咐司务长买辣椒，要挑那种又红又尖的，越辣越好。队长这种爱好得到了同样喜欢吃辣椒的江西籍的战士支持，可却遭到不爱吃辣椒的政委和福建籍战士的反对。队长旧军队出身，有点野蛮，嘴里骂娘家常便饭，而政委也不肯忍让。而且言语习惯上差别很大。吵架就不可避免了，常常吵到脸红脖子粗。

看起来芝麻大小的一点破事，换成一般领导估计会说，不要吵了，给我安静听话，不然给你们记大过，再不行踢屁股、关禁闭。罗荣桓不是那样的，他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

罗荣桓把大家叫到一起，开一个关于“辣椒该怎么吃”的会议：“我们这个大队有江西人，也有福建人，还有广东人、湖南人，来自四面八方。要不是革命，大家谁也不认识谁。革命使我们成了阶级弟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团结，工作搞不好，仗也不能打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在团结方面起模范作用。我们湖南有这样一首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团结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的重要。团结，这是一个出发点，有了这个出发点，一些具体问题，象吃辣椒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大家应当互相谅解、互相照顾。今后可以少买点辣椒，单炒，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江西人的需要就可以满足了。但是，不要放到菜里头，这样也照顾到了福建人的不同的口味。”

——现代人看来，这一连串的罗嗦，听起来像唐僧念经一样惹人烦。如果设想一下当时的情绪，大家从不同地方走到一起干革命，随时可能牺牲。在那种环境下，心情必然存在负面情绪，需要的不是压制，而是安慰。罗荣桓很好地安慰了大家，把大家团结起来，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罗荣桓不仅安慰大家，还促使大家自我批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大家融合在一起。不论干啥，作为一个队伍，必须融合团结起来，才能发挥能力。那便是罗荣桓的风格。而他的风格在严谨中不失幽默，比方说他建议大家学“国语”，也就是说普通话。广东人、福建人、江西人虽然都是中国人，在普通话没有普及的年代，都是方言，就变成了半个外国人。

更难的是打土豪的问题。要知道平时大家都很辛苦，在大山里转悠，想改善一下伙食还得自己去山里打野鸡、抓鱼啥的。队伍纪律又严格，不能随便走动。唯一的好时候就是打土豪的时候。因为土豪家有猪有羊有鱼有肉，不仅可以大餐一顿，还能带点干货存起来。

某日打土豪完毕，罗荣桓提了灯笼去视察，还没到现场就听见美妙的吆喝：“猪肝归我，猪肝归我。”这种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老百姓眼中，那个和旧军队有啥区别？

这种积习要改，怎么改，那是罗荣桓的工作。最难的工作还是收缴财物问题。根据地很贫穷，长期在敌人的枪口下搬家，没地方可以收税。所以实行财物公有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分配，才能功能最大化。

人性嘛，总归有自私的一面。打土豪时，有人就顺手牵羊，搞点私房钱。那样是不允许的，怎么办？那是罗荣桓的工作。

当然，罗荣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很多其他政治工作人员，比方说黄克诚，比方说谭政，比方说罗瑞卿，那是一个巨大的集体——罗荣桓是其中的佼佼者。

看了罗荣桓的这些工作，再结合他的出身就能明白，罗荣桓是一个特殊的人。他是乡绅之家，理工科毕业，在队伍中干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很多人没有看到那些“小事”的重要性的时候，罗荣桓已经在干了。

很多人嘲笑过罗荣桓。毛泽东对此表示：斥鸢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罗荣桓的工作不仅是把思想和人际关系搞好，还要负责军校啥的。队伍的训练也是有声有色。当初在井冈山上，毛泽东看见罗荣桓训练的人行动迅捷，赞叹曰，草上飞。这就是毛泽东《吊罗荣桓》开篇部分：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这就是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种天然契合。

毛泽东和林彪亲密，是因为毛泽东给林彪提供最好的工作平台，林彪给毛泽东最大限度的回报。毛泽东和罗荣桓的关系，就是罗荣桓落实的那些政策，干的那些事，完全都是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那一套马列主义中国化，那一套新颖的建军政策，那些全新而有效的政策，不为国际派容忍时，不被其他同志理解时，罗荣桓已经在执行了。罗荣桓之所以执行，不是因为他是毛泽东的老乡，也不是因为他跟着毛泽东走，而是因为他看到那些策略是对的，所以他执行。正如他原本不愁吃饭问题，但是他认为唯有革命才有出路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革命。这种人不论何时何地都是被人尊敬和敬佩的。

罗荣桓更加让人敬佩的一点在于，不管对毛泽东还是其他人，他总是能坚持正确意见。比方说

井冈山整风，打 AB 团，罗荣桓就没有跟风。没有跟风的罗荣桓让不少人避免了伤害，甚至搭救了同志的命。

因为没有跟风，他在红四军政委的位置上掉下来，落到总政治部。但是并没有一直往下掉，因为大家很快明白那玩意是不对的，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地位降低而改变自己。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延安整风时代。

（二）整风与整人

当年延安整风运动是共产党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整合。在那次整合中，出现了不少失误。尤其是康生抢救失足者，搞得一堆人被冤枉，怨气很大。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唯有罗荣桓的山东和黄克诚的苏北进行了积极的抵制。

罗荣桓一直都是干政工的。其实当时根据地是军事化的，军政一体。当林彪在时，军事都是林彪管。而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去苏联了。一开始陈光管过一段时间军事。陈光指挥作战还行，但是个典型的军人，脾气很大，性情急躁，和同事关系搞得很僵。陈光和朱瑞在山东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罗荣桓去了山东，一切才正常起来。

山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远的不说，当初国军中原大战，鬼子进中国，国共争霸，山东那一带大打特打。鬼子进中国之后，惨烈的徐州会战结束，控制山东全境。山东可以说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落入鬼子手中的省份。

当初八路军搞敌后抗战，就是想华北和山东那边开。在那里既可以开辟根据地，又可以避开蒋委员长的目光，可谓一举两得。等到抗战结束之后，山东的发展程度远胜华北，成为中共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调往东北的那批骨干，基本上都是从山东去的。那批人在东北成了领导干部，三年之后变成赫赫有名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山东根据地同样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当蒋介石搞重点进攻，两个拳头伸出来，一个伸到共产党大本营延安，另一个就是往山东伸。可见山东搞得多么成功。山东根据地的成功，罗荣桓当领第一功。单凭这一点，足以为他赢得元帅地位。

那么罗荣桓在山东干啥呢，看看他的几个孩子名字就知道了。罗荣桓的早夭的长子，叫罗北屯，是当时红军屯兵陕北时出生的。第二个儿子叫罗东进，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山东时诞生的。罗东进的妹妹叫罗南下，弟弟叫罗北捷，都象征着罗荣桓在山东的行动。

罗荣桓在山东干啥呢，老本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

罗荣桓强调：“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与

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

罗荣桓强调：“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之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当初朱瑞和陈光闹得不开心。不是军事实力问题，而是大家没有搞到一起。搞不到一起，也就是政治工作搞得不好。共产党之所以比其它党派的战斗力更强，主要原因就在于，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十指握拳力千斤，鲜花需要绿叶扶，英雄也需正气助。

政治搞好了，也就有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战斗力也就有了。

那么政治和军事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罗荣桓强调：“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组织政治工作去保证，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决定与实施，去完全适合党的总方针，并以行政系统的指导工作，把党的政治工作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实际，甚至与行政工作失去协调，这就必然妨碍党总的方针在某些部门中具体的实现。”

罗荣桓强调：“在军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之不够，巩固高度的集中行动，保证战斗任务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更艰苦耐烦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之民主，来启发战士的情绪，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与工作任务。这种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释为连长权大，政治指导员权小，更不能由此引起关系的隔阂。相反地应该发扬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调的一致。如在队前执行纪律时，这是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人员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要经政治工作去保证军事纪律的执行，并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任何对立与推诿责任的现象都是不许可的。”

——这些话大家都会说，关键是怎么去干的。

听其言，观其行。

罗荣桓的方法很简单。他告诉大家，俺们这些搞政治工作的，说到天花乱坠都没有用。说话要有威信才行。有威信才有人听。有人听，话才有用。那么威信从哪里来呢？没有窍门，也没有捷径，唯一的办法要靠自己：靠自己模范的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根本。其实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这么简单。

然而这个世界上的事，越是简单，反而越不容易办。牛顿定律看起来是如此简单，可是在牛顿之前没有人能发现。爱因斯坦方程也是非常简洁，直到现在还是绝大多数人搞不懂。共产党员的准则也是一样，当模范，可是看看今天那么多共产党员，正面模范反而变少，反面模范倒是数量上升。所以说越是简单的事情越是不容易干。

罗荣桓常常给大家讲长征时代的故事：行军的时候，长官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罗荣桓自己就是从长征时代过来的，并且把表率作用一直延续下来。他虽然级别很高，但从来不端架子，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同志们都把他当作贴心人，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正面意见他听，反面意见也听。他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在他面前，讲错了也没有关系，他从来都是正确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大帽子，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教育。

罗荣桓告诉大家：政治机关要联系群众，深入实际，面向连队，对部队来的指战员要热情、和蔼，及时解决下面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的也要把道理讲清楚。真正做到使政治机关成为干部之家，使干部感到很温暖，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来反映，千万不能把政治机关办成阎王爷开的店，连个鬼也不敢上门。——对应现在某些机关单位，真是先见之明啊。

——看看这种工作风格。如果不太了解，那就进书店看看，看看成堆的人际关系学。里面内容都是千篇一律，讲怎么样成功，怎么样讨人喜欢。精华部分就是罗荣桓那一套的现代文表达方式。但罗荣桓是用行动表达的。

罗荣桓不仅自己用行动表达思想，还教其他政工干部如何用行动表达思想。原因很简单，中央给政工干部权力是要他们发挥作用的，不是让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如何才能办到这一点呢，那就是老一套，理论联系实际。罗荣桓强调政治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懂业务，了解战争，熟悉部队。

他自己则是一贯作风：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战室去阅读和研究军事情况的报告，还时常督促师政治部的部长们，到司令部看军事文电，及时掌握各部队作战情况。

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部队任职，到前线锻炼，同时又从部队抽调干部到政治机关工作，把军政完全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不仅提升了业务能力，而且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他经常对大家说：“虽然现在战争环境，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习些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

罗荣桓用行动告诉大家：所谓政治，并不是嘴皮子和笔杆子，而是切实有效的了解、合作，进

而提高效率。

学习，干活，效率，在共产党的名义下。

——这点急需现代某些机关单位的大爷们学学，多学点当大爷的本钱。当大爷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了大爷不干活或者没有干活的本钱，相当于站着茅坑不拉屎。那样的话那些当不成大爷、够不上大爷的老百姓就惨了。

老百姓惨了，问题就严重了。

罗荣桓就靠着自己的工作方式把山东——鬼子重点控制的省份，发展成为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日后解放战争，大批的干部从山东走出去，跟着林彪去了东北，跟着刘伯承去了中原，还有一部分去了西北，留在山东的那批构成了日后三野的半壁江山。

其实罗荣桓的方式如上，也没啥神秘的，就是把大家团结起来，凝成一股绳，在鬼子的大网中往返穿梭游动，时不时还定而击之，战绩辉煌。

那么罗荣桓如何做到的呢，前面说过政治，在说说军事。

大家常说罗荣桓是政工元帅，往往把心思放在政工两个字上面。要知道按照修辞，政工只是修饰词、定语，元帅才是主题。罗荣桓虽然主抓政工，但是出于级别上的考虑，他参与所有的军事决策。以辽沈战役为例，林彪犹豫不决之际，是罗荣桓化身为唐三藏一五一十的罗嗦，帮助林彪坚定了信念。

罗荣桓没去山东之前，那里吵吵嚷嚷，一盘散沙。罗荣桓去了，就搞好了。但是千万不要把那个转变完全归咎于政治，毕竟那是靠军事混饭吃的年代。所谓枪杆子出政权，罗荣桓首先在山东南部，他要干的事绝对不止“疏通同志们的思想”那么简单。除了同志们各种“想不通”，他还要面对很多情况，如鬼子。除了鬼子之外，还有各种伪军，还有各种恶霸，还有各种血性男儿——火种。

罗荣桓要干的事，首先要团结可以团结的那些人，究竟哪些人可以团结、团结到什么程度都是高难度的技术活，需要准确的情报和对人性的了解。

当地有个叫万春圃的大乡绅，组织民团保境安民，江湖人称“万三爷”，很有实力。尽管万春圃的大儿子加入了共产党。但是按照共产党的传统，地主乡绅属于“革命对象”。罗荣桓决定团结万大乡绅。

罗荣桓初到万家做客时，万家按照时下流行的“高官”标准招待他，万夫人拿出绝活，特意做了鲁南风味的全羊席，从羊头到羊尾巴做了十几个菜，外加羊肉馅的锅贴。对罗荣桓、陈光他们，那是人间美味哦。万家的人也是小心翼翼，小声地说话，轻轻地走路。罗荣桓很快打消了他们的疑

虑：主动地接近他们，和他们拉家常，搞好关系。

万春圃邀请罗荣桓在自己家住一段时间，罗荣桓答应了。万乡绅每天总要到罗荣桓屋里坐坐。罗荣桓就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八路军的历史和传统。万春圃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邀请罗荣桓在家住，除了拉关系之外，也是想近距离观察这位共产党人，看看他们是不是只会耍嘴皮子，肚子里有几分货，毕竟那年头江湖郎中太多了。他很快就大吃一惊：他看见罗荣桓教勤务员认字、写字。他看到罗荣桓和战士一样穿的是几乎褪成白色的军衣。他看见罗荣桓盖的是打了补丁的被子。他看见罗荣桓吃的是高粱煎饼就咸菜。他听说，罗荣桓对马夫、炊事员亲如兄弟。他听说马病了，罗荣桓亲自动手和马夫一起给马灌药。

耳闻目睹之下，这位性情豪爽的山东乡绅服气了，感叹：“俺活了五十多岁了，还没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真正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啊！国家就有希望。”此后万春圃归了共产党，在抗战最艰辛的日子里。建国之后，万春圃任政协委员。

在鬼子占领区里，有万春圃那样的汉子，也有很多汉奸。鬼子占领中国，基本上靠汉奸控制地方。对于那些和鬼子勾结的日杂，只有霹雳手段方能显示菩萨心肠，很简单，抄起看家本领，打土豪，分田地。抱犊崮与天宝山区的中间有个地方叫白彦，是南北交通枢纽，战略要地。那里有一个叫孙鹤龄的大地主。他的儿子孙益庚是白彦的乡长。罗荣桓曾经想争取他们一起抗日。孙家当然不同意，人家甘心当鬼子和伪军的下酒菜。在他们眼中，八路军是穷矮挫兼土肥圆，哪有皇家高帅富看着顺眼。所以拒绝。

不论孙地主怎么想，战略要地是要拿下的。结果很简单，罗荣桓让人拆毁了孙鹤龄经营了几十年的碉堡寨墙，开仓放粮。那些把附近的树皮都剥光了的饥民，手捧着刚分到的救命粮，眼睛里都闪烁着感激的泪花。很快根据地也搞起来了，组织建立起来了，兵员富足起来。

这样一手抓，一手打，根据地就出来了。

山东南部站稳脚跟之后，罗荣桓开了一个会议，变身为唐三藏，罗嗦老半天，给大家提出了行为要求：

- 一、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
- 二、普遍深入地建立与群众血肉相联的关系，要成为爱护根据地与民主政权的模范；
- 三、实现高度的政治团结，建立无产阶级的友谊，自觉地遵守纪律，不断地求进步；
- 四、灵活、机动、果敢、坚决，发扬我军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
- 五、坚持严肃、紧张、精细的工作作风，坚定不屈不挠的革命立场。

这些听起来都是罗嗦，但是在彼时彼刻的那个团队中，只有理解这种罗嗦的人才能生存下去，才有希望。因为罗荣桓这番罗嗦之后，要扩大根据地，向北发展。

按照地势，山东南部 and 苏北多山，有利于搞根据地。西北部则是鬼子的重点控制地区。越往北搞，危险系数越高。然而搞革命的，都是刀头舔血过日子。那些都是中国人的土地，终究是要拿回来的，所以危险也要去。

向北，往沂蒙区渗透。

向东，一直挺近到滨海。

鬼子当然不会坐视不理，拿出鬼子的看家本领——大扫荡。鬼子不说扫荡，而是“强化地方治安”，所谓强化，就是三光。鬼子调动三个师团、四个旅团为主力，加上一部分伪军，围剿根据地，重复当年蒋委员长的故事。鬼子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然后采取分区“清剿”和“辗转抉剔”的战法，想要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那是鬼子最大规模一次扫荡。生死存亡之际，向来搞政工的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他告诉大家：在敌人大“扫荡”时，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小部队要树立独立自主作战的精神，不要在遭受敌人第一次合击后陷于被动，应当适时跳出合击圈。在情况未查明前，先以敌为轴心转动，不宜跳得过远，免遭新的合击。要切实掩护群众，不使敌人杀害群众和抓走壮丁。连排干部要熟悉地形，做到六十里以内行动不请向导。

在罗荣桓亲自组织下，八路军安全有效地跳出鬼子在沂蒙山区的包围圈。跳出包围圈没啥大不了，毕竟在井冈山开始就练习那种技术，到如今已经二十年了，早已炉火纯青。

罗荣桓带着大家跳出包围圈之后，又回来了，回到沂蒙山区反扫荡。

既然回来，为何还要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不走，按照土八路那种草根屌丝级别的装备就会成了鬼子的下酒菜，正好上了鬼子的当。明知上当的事，只有傻瓜才去干。罗荣桓不是傻瓜，朱瑞、陈光、肖华等人也不是傻瓜。

一出一进，没别的，战术。鬼子发现八路军主力跑了，正要对付老百姓。罗荣桓和陈光把特务营副营长黄国忠叫来交代任务：“敌人在留田扑空后，正在摸我们的去向。我们要将计就计，暴露一下自己，把敌人从中心根据地调出来。敌人抢劫了很多牲口、物资，要运到费县，必经石岚。你带上两个连在石岚附近打埋伏。要打得狠，声势大，动作快，打了就撤。敌人正想寻我主力决战，其侧后受到威胁，他们的兵力一定会从我中心区调出来。”

罗荣桓亲自给黄国忠选择好伏击地点：东西两面高山耸立，中间一条大道伴着一一条沙河，自北而南，纵贯而过。战士们占领了两侧的高山，把住南北山口，布置好口袋阵，等鬼子。参与伏击的

很多人都是一一五师骨干，参加过平型关伏击战。此战仿佛又回到当年。他们忍受着寒冷细雨，在岩石后面苦等一天，终于把鬼子等来了。鬼子正带着抢来的东西高兴得哇哇乱叫，全然不知道死神已经守候在前方。然后又是一场哇哇乱叫，只不过先前是笑，然后是哭。同样是哇哇乱叫，那效果和画面很不一样。

罗荣桓的计策凑效，鬼子果然离开根据地中心。罗荣桓又回来了，但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走的时候是生机勃勃，回来时已经满目疮痍。他看见被杀的同胞尸体，他看见青年男子被拉走当壮丁，他看见被凌辱的妇女，他看见荒芜的家园。这就是战争，丑陋的战争。战争本就是丑陋的，但是因为鬼子的存在，更加丑陋了。

一切丑陋的结果，都是老百姓遭殃。老百姓没有办法避开丑陋的战争，只能选择支持一方结束丑陋。他们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才是这片大地的主宰。那是不论遭受多少痛苦、不论世界如何转变都不能改变的事实。

双方就如此这般捉迷藏。罗荣桓带着大家游走在刀刃上，其指挥艺术也得到发挥。他沉着、果断、极致的性格一次又一次解决难题。比方说有一次转移，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河上只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也只能改为一路纵队，后面有敌人来追，形式相当危险。罗荣桓向参谋侯向之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趟过去，看看水有多深。”

侯向之从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趟到彼岸。罗荣桓马上命令大家过河。部队过河之后，罗荣桓并没有急着走，而是让大家用树枝把河两岸的脚印统统扫掉，消除徒涉的痕迹。因为他要保留那座独木桥，让敌人慢慢去走。

罗荣桓也不是一直跑在前面让鬼子追。他还常常带人跟在鬼子身后，和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某些时候，鬼子刚刚离开，罗荣桓就来了，简直是在玩捉迷藏，胆子之大让人咋舌。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罗荣桓的侦查工作很到位。

侦查技术不如鬼子，却能在捉迷藏中胜出。原因很简单，土八路赢得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决定在那场丑陋的战争中支持土八路。

当然，在捉迷藏游戏中，不少人牺牲了。罗荣桓本人也经常身处险境。比方说，某次罗荣桓和部队失去联系，身边只有警卫员和二三十个战士。那点人，别说遇到鬼子，就是民团不见得能对付得了。遗憾的是偏偏就撞鬼了，遇到鬼子。危机时刻，罗荣桓果断带着大家往相反的方向转移，那边有很多鬼子的据点，幸好他们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一路上遇到盘查据点，畅通无阻。那些人显然不知道，那几十个身穿皇军大衣的人正是自己最大的苦主。

如此反复周旋五十天，流过很多血、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之后，终于赢了，赢得了反扫荡

战争。鬼子的计划落空了，土八路再一次险中求胜，站稳脚跟。但是罗荣桓却没有胜利的喜悦，因为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备受折磨。

在山东，罗荣桓的身体垮了。他本来就有痔疮，经常大便出血，医疗条件差，没得治，连歇一会都很困难。痔疮那玩意比较常见，他也不怎么放在心上，直到小便也出血，才知道问题大了。他是山东老大，自然要好好调养，调养的待遇是吃一种消炎药。鬼知道那药有没有用，反正已经是最好的药了。当然还有一个办法，辣椒不吃了。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罗荣桓给中央写信，要求请假半年修养，但是没有得到批准。一方面山东确实离不开他，另一方面在最高领导人眼里，山东队伍就是原来的一一五师，再往前追溯，那是井冈山的老底子，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是毛泽东的本钱。那支队伍只能放在最值得信赖的人手里才能放心。队伍原本是林彪的菜。林彪走了，只能是罗荣桓。因为对毛泽东而言，要么是林彪，要么是罗荣桓，别人就没有那么踏实。所以毛泽东和朱德给罗荣桓回信：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不仅不让休息，中央还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也就是说，山东都归罗荣桓一个人了，工作量加大。

罗荣桓没办法，只能强撑。好在新四军那里有一个外国医生，医术不错，罗荣桓去那里治疗一下，勉强工作。从那之后，罗荣桓一直抱病工作，直到最后，累死。身上的劳累固然难受，比起精神上的折磨还要好一点。那便是整风运动。

（三）折磨

世事总有很多面，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好坏分不清的一面。伴随着共产党事业的整风运动就是那样一个很多面的事。整风运动是否必要，答案是很必要。因为共产党兴起的时候啥都没有，除了各类敌人。过一段时间，组织就要来一次自我净化。

自我净化，就是整风。

但是每一次整风，都会整一大批人，冤枉很多人。

那些被冤屈者，一部分是程序出现偏差，另有一部分被公报私仇，反正都是被冤枉了。所以说整风那些事，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在战争年代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某些人在整风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疯狂欲望。

比方说夏曦当初在红二方面军那种整风，简直是杀人狂魔。延安整风运动，同样冤枉了一大批

人，这些前面都说过。延安整风运动是战争年代最大一次整风运动，其经验和技术手段直接影响到建国之后的各种运动。

当延安整风运动疯狂开展时，下面各个根据地也不能幸免。山东作为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尤其不能免。作为最大抗日根据地的一把手，罗荣桓应该怎么应对呢？

其实罗荣桓对整风运动印象深刻，他基本上经历过中央内部历次整风运动。对于整风中的各种弊端也是了如指掌。建国之后大跃进中刮起的浮夸风，早在整风运动中就存在了。之前的整风运动中，他甚至亲手救下了梁兴初的命。没有罗荣桓，后来赫赫有名的四野虎将、朝鲜战场上的“万岁军长”就要英年早逝了。

在之前的整风运动中，罗荣桓只是中央内部的一个干部，尽管级别不低，也跟领导的关系很铁，但终归说不上话。他能做的，也就是解救个别的“梁兴初”。这一次不同，他已经独挡一面，是最大根据地的一把手。他的态度将决定很多人的命运、前途、甚至生死。

当延安搞抢救运动时，也在推广自己的经验。中央搞了一个特派员去山东推广经验，那人就是舒同，后来大饥荒中的山东一把手，新五虎上将之一。舒同到了山东就说，这里是抗日前线，很重要，要整风和审干。

如果他跟着“大势”走，一番猛打，拉出来一大帮特务、内奸啥的，即使搞得人心惶惶，也没有人会指责他什么。大家都那么干嘛。共产党讲团结嘛，服从命令听指挥嘛。比方说新四军内部，饶漱石甚至连陈毅一起排挤了。大多数时候，随大流都是最保险的方案。

罗荣桓想一想，那样不行。他的心思飞到一九三九年，一一五师刚到山东不久，西湖地区就搞过整风，即肃托，相当残酷。那次整风中，使用了很多刑法，如毒打，如坐老虎凳，如灌辣椒水，如过电（用手摇电话机），如点香烧，如用子弹刮肋骨，残酷程度堪比满清十大酷刑。而且处决数百人，是一起大冤案。发起者只是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而已。正是罗荣桓亲自赶到，才结束那场毫无意义的屠杀。

现在又来那一套，那还了得？不行，绝对不行。

但是中央精神又不能不执行，康生的大作——抢救失足者——已经寄到山东，舒同特使已经来了。按照延安那一套，接下来就应该“引蛇出洞”了。

引蛇出洞，又称钓鱼，技术含量相当之高。

本来大家好好工作干革命，既然一部分人要去整另一部分人，那就要有把柄。把柄怎么来，那便是钓鱼。

怎么办呢，中央命令又不能违抗。罗荣桓一拍脑门，好吧，这么着：既然整风无法避免，上有政策，我就来个下有对策，来一场富有山东特色的整风运动。

所谓山东特色的整风运动，就是搞几个定点试验，看看效果，然后推广。这个看起来没啥，联系到历史看，就意义非凡。因为历次整风运动，都是一阵风，结果都是损失惨重。后来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也都是一阵风，全国范围，损失更严重。直到后来改革开放，有了苏联前车之鉴，才先搞试点再慢慢推广，经济上的定点试验。现在所谓一国两制，实际上也是定点试验，政治体制改革的定点试验。

当年罗荣桓在山东就搞那样一套定点试验，实际上是一套相当独特的创新。罗荣桓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给舒同搞几个试点，让整风运动的弊端暴露出来而已，应付一下上头。

罗荣桓以山东一把手的身份告诉大家，康先生的大作暂时不要全面下发，大家有想法先到 ABCD 几个地方去，去整风，去钓鱼，也就是引蛇出洞，也就是抢救失足者，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

根据理论，所谓整风运动，也就是假设团队中有恶人，要把恶人给整出来。但是恶人不会自己出来，那就要想办法让他们自己暴露出来。

根据理论，恶人之所以为恶人，只因为他们要攻击革命队伍。要想让恶人跳出来攻击，那就给他们制造机会，让他们自己现身。

根据理论，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是民主。以民主名义下暴露出破绽。根据民主的名义，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内心的想法暴露出来。就像某些镜头下，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秋后算账时，会一笔一笔算清楚的。

于是民主大会开始了，鼓励大家，各个学校、政府机关、各条战线的同志们提意见：“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

美其名曰：通过发扬民主，使下情上达，帮助和促进领导改进缺点——党的秘密策略，对外则秘而不宣，又美其名曰：对于特务世界性与群众性的认识不足，片面地强调山东的特殊性，如说山东外来干部少，国特不易打入，军队没有问题，我们的干部大都经过锄奸斗争与长期考验等等。所以山东也要认真搞。

大家一听，好事啊，本来就应该发扬民主精神嘛。大家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那个一系列缺点，吧啦吧啦说个没完，说啥的都有。比如《大众日报》社长陈沂因喜欢吃辣椒，赢得一定帽子“生活特殊化”。光说还不过瘾，还有人用漫画连载形式，说领导同志怎么不行。由于纸张比较匮

乏，有人直接把图画涂抹在墙壁上，相当有喜感。

这也正是整风主持者想要的。他们如同阴险的猎人一样，把同志们当成需要猎捕的野兽，全心全意的收集猎物的蛛丝马迹，在寻找破绽，伺机发动致命一击。

其中最有名的是王若望事件了。

王若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相当特殊。应该说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典型的“清流”，是那种眼中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书生或者说幻想家，如果需要形容词的话，前面加个“硬骨头”。

王若望年轻的时候是左翼作家，加入中共。后来被国民党抓住了，判刑十年。国共合作之后，被释放，去了延安。用笔杆子辛辛苦苦地为共产党干事。文革时是右派。改革开放之后，又变成彻底鼓吹自由化的旗手，被邓小平亲自点名开除党籍。晚年又流亡海外，成为一个彻底的叛国者。可是他在美国组织民运，又被那帮后生小辈出卖、利用，但依然痴心不改，坚持反对共产党的心思不动摇，最后义无反顾的客死他乡。

看看王若望的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谁是最有权势的那一个，他就批判谁，反对谁。当年蒋介石是老大，他就批判蒋介石和国民党，说种种不行，即使冒着坐牢掉脑袋的危险，依然坚持。建国之后，毛泽东成为最大的那一个，他依然拿起批判的笔，即使戴上右派的帽子也在所不惜。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又反对，说邓小平搞得不彻底，没有像苏联那般一次性解决问题。等到自己去组织民运吧，又搞不定组织。最后白发苍苍，一事无成，只留下曾经的批判。

这样一个人物应该怎样评价他呢？首先必须承认他的骨气和勇气，敢言常人之不敢言，为常人之不敢为。比起那些愤青和墙角阴暗的一群人，他至少敢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哪怕是坐牢，哪怕是流落他乡也在所不惜。

如果给他一顶高帽子，可称他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实际一点，他终究还是一个靠嘴皮子吃饭的人。通俗一点说，就是：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现实世界需要他那样的人，但是不需要太多。因为任何政府都是不完美的，需要批判。太多的批判则妨碍干事情。但是他晚年的极端表现，认可者甚少。

这样一个人在当初的整风运动中，注定是很活跃的。因为他有很多话要说。平时没有机会都要忍不住唠叨两句，有了民主大会那还了得。

当时王若望还很年轻，对共产主义事业信心满满，但是也对很多现实现象不满意。他对罗荣桓还是信服的，因为罗荣桓看上去就像是共产主义人士的模版。但是对其他人，王若望就不怎么看得

上眼了。比方说山东分局常委黎玉，就看起来很不爽，官僚主义严重。王若望以清流文人特有的苛刻，给黎玉总结出了“八大盲目性”，走的方针路线都是错的。

主持者一看王若望自己跳出来，眼睛直放光，业绩有希望了。因为罗荣桓的软磨硬顶，整风审干的收成不怎么样。又搬不动罗荣桓，只有抓其他人向中央交差了。他们通过专业技能，经过一系列的牵强附会、移花接木，把王若望塑造成一个反面典型，套上一个响亮的名头——山东王实味。王实味同志是中央搞出来的典型。并且添油加醋说，王若望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煽动其他人来反党。舒同把王若望定位特务，上报中央。中央来点，准。

眼看王若望就要遭殃，罗荣桓顶风站出来。罗荣桓告诉大家：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不是特务和敌人。罗荣桓这么干是冒很大风险的，但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干了。

罗荣桓还专门约王若望谈话，说你这家伙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过于唯我独尊、目空一切。

罗荣桓拯救了王若望。既然拯救了王若望，也就拯救了所有人。因为王若望是特使钦定的，中央批准的典型。

罗荣桓的观点非常鲜明：放一把火，把领导同志烧一烧有好处。这么做可以烧一烧那些狂妄自大的人，比方说王若望同志（此君太特殊了）。他不相信身边有所谓的特务：山东形势特殊，处在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里，敌人已为我们审查好了干部，如果某同志是特务，他早就自己跑了，根本用不着以发扬民主的方式来暴露敌人。

——这话说得相当朴实却又相当霸气。

这才是罗荣桓的真实想法，利用中央的整风运动，给某些好高骛远之人泼一泼冷水，让他们冷静下来好好干活！

罗荣桓敢于这么干，不是因为胆大妄为，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胶东区是一个试点。中央特使具体领导了区党校的审干，动用十八般武艺，诸如疲劳战、车轮战啥的全部用上，成功将一批干部打成特务。最后收获颇丰：“特务”们供出的枪支比整个军分区拥有的枪支还多！

——还有天理么？还有法律么？简直是笑话，天大的笑话。

那笑话恰好证明了罗荣桓的判断。所以他也不客气，要求停止那种毫无意义的钓鱼大会，大家好好干活。当然鬼子也很配合，出来扫荡，八路军再次反扫荡。在反扫荡的过程中，那些所谓的特务居然没有一个通敌投敌的，岂不怪哉？

这么一番折腾下来，结果固然很好，但是很多问题还得反思。先看看结果：罗荣桓能让山东在

整风运动中全身而退需要很多原因的。

首先是罗荣桓本人。罗荣桓本身是一个可敬的人，一个接近理想意义上的共产党员（人嘛，都有缺点），他的风格就是大公无私。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罗荣桓在毛泽东眼中的位置。

罗荣桓说话有人听，一方面是他在山东的地位高，另一方面有中央支持。正是因为中央让罗荣桓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所以罗荣桓说话的胆气才能很壮。要不然像陈毅在新四军中那般摇摇晃晃，他在山东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正是因为罗荣桓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整风特使舒同才没法拿他怎么样。

罗荣桓之所以能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更为紧密。看看陈毅，被饶漱石折腾得脑袋巨大。没办法，当时陈毅没法得到毛泽东的绝对信任，因为两人在井冈山时代就有疙瘩。开始长征之后，两人也没办法沟通。所以饶漱石折腾陈毅时，毛泽东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搞得陈毅在新四军部呆不下去。

罗荣桓不一样，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唯一从一开始就跟着毛泽东干，而且从来都是默默地干活。默默干活没啥，但是罗荣桓干的活和毛泽东的主张基本吻合，也就是说毛泽东和罗荣桓有一种天然的默契。那种默契并不是来自共产主义理论，不是来自莫斯科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而是共同对中国现状的探索。

所以毛泽东起伏的时候，罗荣桓也跟着起伏，因为他们对中国现状的看法类似。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和邓小平跟着倒霉——说的是事实，罗荣桓和邓小平，是毛泽东走上最高领导岗位之前的少数的铁杆粉丝。

所以毛泽东在《吊罗荣桓》中写道：今君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绝不是虚言。

而且在毛泽东眼中，罗荣桓不仅能干活，而且没有权力欲和野心。所以林彪去苏联养病之后，毛泽东才把自己的家底，一一五师放心地交到罗荣桓手上。罗荣桓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把山东搞成最大的抗日根据地，空前强壮。山东强大，意味着毛泽东的嫡系力量强大，意味着说话有底气。所谓整风运动，就是要整合全党。所谓整合全党，就是要把那些“异己分子”，如国际派修理一番。

罗荣桓原本就是搞政工的，平时就把风气抓得很严。看看之前罗荣桓在山东的那些手段就能发现，所谓整风，罗荣桓一直在搞，只是没有整人而已。把中央整风文件，除了康生的拯救失足者，和罗荣桓在山东的行为对照一下，基本上是一致的。

如果把山东也那么搞一通，相当于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延安在鬼子的范围之外，整一部分

人不会造成太大损失。如果山东也那么搞法，估计鬼子很快进村。所以毛泽东让罗荣桓成为山东路线的正确代表，所以山东可以在整风运动中全身而退。

理清了这一层关系之后，就能清晰地看到，早期的革命活动中，人治色彩非常浓厚，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如果把罗荣桓换成另外一个人，比方说陈毅，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当然在战争年代，实效是第一位的，没条件搞什么法制那一套。因为敌人根本就不给你时间走那些程序。有时候人治更为有效一点，原本无可非议。但是这一点显然被忽略了，那就是把战争年代那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带到建国之后的国家建设中，所以才会造成那么大漏洞。

对比一下战争年代的整风运动和建国之后的政治运动，非常神似。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领导人才回过神来，慢慢搞法制建设。这些都是后话。

因为罗荣桓在山东表现出色，毛泽东在全党推行“山东经验”。

正是因为罗荣桓的成功，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才有大批的军政干部从山东走向全国。罗荣桓也去了东北，在那里他再次和林彪搭档，全程参与林彪的第二次军事实践。虽然战场之上的林彪威风凛凛，罗荣桓基本上参与了全部决策，搞好了战场之外的各种关系，是第四野战军名副其实的第二天号人物。

（四）林彪与罗荣桓

林彪和罗荣桓的合作基本上是愉快的，也就是叶群在中间惹出一点小小风波，以及锦州决战问题上出现一点偏差。

罗荣桓和林彪在东北总体上非常顺利，除了叶群折腾出一点小动作，基本上没啥。林彪的任务是决策军事运作。那是东北最重要的事。林彪干得很棒，对得起东北一号的称号。作为东北二号人物，罗荣桓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林彪决策，也就是说罗荣桓参与了决策过程。战争决策中，还是林彪为主，罗荣桓只是辅助作用。罗荣桓真正的作用在战争之外。

要知道战争的军事运作之外还有很多事，比方说政治沟通——那是罗荣桓的强项。更为关键的是，从山东去东北的那些人，很多都是罗荣桓一手培养的。林彪离开中国之前的一一五师只有几万人而已。罗荣桓培养的人，罗荣桓说话就有用。罗荣桓知道林彪是个天才，就全力帮助他完成战场之外的事——这正是两个人合作的基础。

但是在战略上讲，作为政委，罗荣桓是有发言权的。以打锦州为例，林彪从实际情况出发有些犹豫，和毛泽东的战略有分歧。毛泽东那个人，用人足够有气魄，但是在战略原则问题上，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所以毛泽东的态度也很坚决。关键时刻，罗荣桓选择站在毛泽东那边，倒不是想拍

毛泽东马屁。如果想拍马屁，第一次四平大撤退就不会站在林彪那边了；也不能说罗荣桓改变了林彪——因为林彪不是罗荣桓可以改变的，但是罗荣桓起到了林彪和毛泽东之间的润滑作用。

然而罗荣桓和林彪还是闹了不愉快，倒不是在战略决策上，而是在写战后报告上。辽沈大战，充分显示了林彪的英明神武。但是把锦州决战之前的犹豫写进去的话，就显得林彪不是那么英明神武了。罗荣桓作为政委，如实把一切写进去。林彪看了就很来火。在林彪看来，如此军事杰作怎么能留下瑕疵呢？分明是罗荣桓故意找茬嘛。再加上叶群适时的枕边风：林罗不一条心。使得两人紧密的关系里有了阴影。还好战争结束了，两个病号分开了。

日后罗荣桓抱病上班，林彪养病一阵子。没想到两人再次在工作中相遇，冲突竟然无可避免。

一别数年，罗荣桓还是那个罗荣桓，林彪已经不再是那个林彪。

之前的那个林彪，是一个军事天才。他愿意为军事付出所有，他已经为军事付出所有。但是那个林彪已经不见了，因为作为军事天才的林彪的生存环境不见了。在当初林彪横行天下的那个时代，是炮火连天的时代，林彪得以发挥天赋。朝鲜战争结束，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作为军事天才的林彪只能在政治上展示自己了。

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所有的辉煌和挫折都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之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如今还是毛泽东，还是毛泽东思想。他们之前因为毛泽东思想而团结，如今因为毛泽东思想而分裂。之前他们因为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一致而团结，如今因为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一致而分裂。

因为之前是军事，如今是政治。军事上的林彪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林彪，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政治上的林彪，选择站在毛泽东的阴影里。

任何一项选择都是一种高难度的技术手段。因为毛泽东绝非一般人，要紧紧跟随他，必须能揣摩出他的心思。即使是一般人，要完全揣摩他的心思也不容易。因为人心是世界上最善变、最说不清的东西。

所以要紧跟一个人，又不想犯错，是很难的。

所以要降低难度，减少犯错概率，就要多动嘴皮子少动手。说得更为直接一点，就是多说空话，少干实事，就是务虚不务实。原因很简单，人不是十全十美的，干事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只要干事，就可能犯错，就可能惹那人不高兴。

按照叶群的笔记：面带三分笑。至于干事要遵循三项法则：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应该说精明的叶群通过小女人的那种小聪明看透了拍马屁的要诀。身为林彪的办公室主任，人际关系

上面，她的行为就代表着林彪。

真实的林彪又如何呢？也在奉行那一套，只不过更为高明一点。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决心启用林彪，代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那不是简单的一次换人，而是军方的人事大变动。那么大的事，自然要征询罗荣桓的意见。因为毛泽东信任罗荣桓，因为罗荣桓是政工的象征。

毛泽东让彭真和罗荣桓去问话。按道理说罗荣桓和林彪是铁杆，是毛泽东的左右手，没有理由反对林彪出山。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罗荣桓反对。之所以反对，并不是他看林彪不爽，也不是替彭德怀抱不平。他的理由很简单：“国防部长的外事任务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乎不宜担任这一职务。我建议，由贺龙任国防部长。”罗荣桓基本上没有和贺龙一起共事过，也不存在私人理由。他挺贺龙，只因为贺龙看起来更合适。

当时国防部长不太可能落到贺龙头上。原因很多，这里不再啰嗦了。其实毛泽东已经想好了，重新启用林罗那对经典搭档控制军方，不仅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还让罗荣桓担任政治部主任。至于军委日常工作，交给贺龙和罗瑞卿。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军方权力的架构。在这个架构里，林彪、罗荣桓、罗瑞卿都是毛泽东的铁杆，谁也无法撼动。虽然贺龙的资格足够老，但是从解放战争开始基本上离开指挥一线。按照毛泽东的构想，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军方都会站在自己的身后。但是很遗憾，后来发生了变故，导致文革从清扫罗瑞卿等人开始。

林彪和罗荣桓虽然再一次成为搭档，但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在战争年代，两人之所以可以成为经典搭档，在于分工明确。林彪管军事，罗荣桓管政治。现在没有战争，林彪在政治斗争中上台，要插手政治。那本来应该是罗荣桓的工作。林彪和罗荣桓在战争后期已经有些不爽，才有林彪请聂荣臻取代罗荣桓的一幕。重新上台的林彪，知道罗荣桓原本推荐贺龙当国防部长，心里更不爽了。而且在新的领导架构中，林彪虽然成了军方代言人，因为身体原因，并不管事。从林彪的角度看，如果军委日常主持者贺龙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走在一起，自己将成为一个花架子。两位虽然战功不如自己显赫，但大家都是元帅，是平级的同事关系。贺龙资格老，罗荣桓搞政治工作，而且和最高领袖的关系非同一般。

林彪上任之后，开始以天才军事家的身份搞政治了。而且身手不凡，刚上任就搞出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捷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窍门。”

——这话基本上是对的。因为之前的陈独秀、王明等人已经证明了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没办法搞定中国的事实。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才发生实际作用。林彪是毛泽东忠实的追随者，自

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铁杆粉丝，更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对林彪而言，那个早已死去的欧洲老头太遥远了，而且没啥用处，跟官僚眼中的孔老二差不多，只有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毛泽东思想才是硬道理。

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是一个基调，接下来是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林彪拿出总结战术的本事，搞出一个新名词，叫：三八作风。

那个玩意是怎么来的呢？来自于遥远的一九三九年。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些口号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些口号成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的典范。成为典范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中国这地方，一旦某事成为典范，就会有一系列后续的典范出现。林彪一个人成了典范，就会有很多人模仿那个典范。一个人吹捧另一个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很多人跟着那个人去吹捧。如果这一切只有一次，一阵风吹过也就算了。

林彪成了一个大功率的吹风机。吹了一阵又一阵。

三八作风刚刚过去，又来了四个第一。

林彪说：“什么事都要搞个数目字。”数目就来了。

所谓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个听起来像空话。那么好吧，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看看林彪这些做法，是不是很眼熟？想想东北的林彪，三猛战术，三三制啥的战术思想，是不是非常类似？当然。只不过当时是军事，现在是政治。对象不同，差别巨大。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摧毁了国军精锐部队。政治上那一套，则带来巨大的分裂。

林彪这是干嘛？接过刘少奇的旗帜，继续神话毛泽东。

当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正是刘少奇为首的一帮人开始概括总结毛泽东思想，结果过了头，成为神话毛泽东的源头——好在刘少奇干得并不是太过分。不管怎么样，刘少奇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相当有道理的，而且延安整风运动的正面效果非常显著，把原本略显松散的共产党搞得铁板一块，在日后的解放战争中效率奇高。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威望依然太高了，高到有点影响共产党的初衷——集体领导。历史早已证明很多次，即使是巨人，也不可能解决所有事。正因如此，当刘少奇等人想要修改经济政策时，分裂了。

接下来要做的，应该像七千人大会那般，大家坐下来好好讨论，哪怕是争吵一番也无所谓，只要能解决问题。很遗憾，问题不是在争吵中解决，而是在争吵中扩大。详情参照前面的各种政治运动。

林彪的那些做法相当于继续拔高毛泽东的威望，神化毛泽东。刘少奇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表现，那是正面作用多于负面作用。如今林彪的做法，负面作用多于正面作用。因为当初之所以经济建设遭到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三面红旗推广得过于严厉和凌乱。之所以严厉，是没得商量。之所以凌乱，是在没得商量的条件下失控。

三面红旗推广到那个程度，是整个领导集体的责任。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威望过高。因为毛泽东威望高，一切才能搞得下去。林彪复出之后，继续拔高毛泽东的威望，而且是以军人的手法，看起来不仅怪异，而且明显不可行。

更怪异的还在后面，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

这个啥意思呢？可以说毫无意义。但是作为曾经出现过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浪花，又必须找出其中的意义。按照最直观的理解：往好的一方面想，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实际工作；往不好的一方面想，就是遇到问题要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找答案。

一听不错啊，毛泽东思想就是共产党和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嘛，但是把目光放远点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按照邓小平的解释，毛泽东思想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

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是原则性和纲领性的，指导政治行为是有效的，具体到某些实际领域中，不见得有用。历史已经证明过了：看看中国的传统历史，儒家那些纲领性思想听起来也不错，仁啊、义啊听起来多好。等到整个社会的思想都局限在儒家思想的内部时，却是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落后，然后是近代无尽的耻辱。基督那种救世思想听起来也不错，可是整个西方世界陷入到教会中时，迎来的却是黑暗的中世纪。

世界就是这样，当一种思想独霸一切、统治一切时，最终总会是负面影响。因为这个世界是奥妙无穷的，没有一种思想可以决定一切。有人想要用一种思想确定一切，最终只会带来更为不利的结局。林彪继续神话毛泽东，就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

这条路上的林彪也许是清醒的，也许是糊涂的，但必将是坎坷的。他的第一道障碍来自党内同志，昔日的战友们。

首先是罗荣桓。

原因很简单，罗荣桓做了一辈子的工作，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套搞法。要说对毛泽东思想的领悟，十大元帅里，罗荣桓自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前面已经说过，从罗荣桓的人生经历和选择看，

他和毛泽东有着天然的默契。毛泽东思想也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罗荣桓参与了全部过程。所以林彪按照搞军事那一套照搬到政治时，罗荣桓不同意。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交锋。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号军委开会，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等人围坐一圈，讨论闲杂人等接触不到的军事问题。那年头政治压力大，即使是共和国的开国将帅开会，也要讨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开始大家很和谐，当他们讨论到一个文件，叫《合成部队战斗条例概则》时，开始不和谐了。

林彪是一个善于创造的人，战场上善于创造，处理公事也有许多创造。一般的公文，在他那里不看，只用耳朵听，即由秘书先看，然后摘要读给他听。比起现在某些大爷们，能听一听公文摘要已经很不错了。对那个条例，林彪睁开睡眼首先表态：“这个条例好。大家有什么意见？”

正常情况下，林彪为军委级别最高的那一个，他先说好，其他人也不好再说啥。但是这一次不同，罗荣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

这是交锋么，看起来不像。但这只是开始，大家都是几十年的老同志，太了解了，要说啥只要动动指头就可以了。因为“带着问题学毛选”正是林彪的“精华”所在。但是林彪却不打算正式接招。因为他知道那位老搭档的政治功底，所以虚晃一枪，问：“这句话在哪里呀？”

林彪的反应非常有趣。一般情况下说一句名言警句，大家也只是说说，要问具体出自哪里，恐怕很多人都说不出来。如果罗荣桓回答不上来，接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笑话，问题也就过了。但是罗荣桓对林彪也太熟悉了，而且早有准备。罗荣桓让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把有关段落读一遍：“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大家都知道这话是林彪发明的经典语录。林彪一看这情况，分明是准备好了来砸场的，很生气很愤怒。我一个搞军事的跑到政治舞台上，好不容易弄到的一点劳动成果，我容易么我！你还来挑刺！

但大家都是老人家了，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志老搭档，真动气也不太好。林彪强压怒火，盯着罗荣桓反问：“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

这句话刚说完估计林彪就后悔了，因为那是罗荣桓的强项。这样一个问题在罗荣桓那里简直就是小儿科。所以罗荣桓很轻松地给出了答案：“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句‘带着问题学’改掉为好。”

接下来出现一段时间的冷场，大家谁也不说话，集体沉默。沉默到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都觉得不对劲。其实他很明白，沉默就意味着大家赞同罗荣桓的话。所以他勉强应付一下：“不好，不

好就改掉嘛。”

罗荣桓以为林彪听了自己的话，很开心，开始发挥一贯的作风：“改掉就对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等等等”唐三藏一般，把林彪说得脑袋大。

林彪本是一个性格敏感、好强、且已经证明自己很强大的人。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创造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政治真的不是他的强项。他在政治舞台上搞出的那一点花样，也是呕心沥血、熬死很多脑细胞的。罗荣桓倒好，一番啰嗦不仅否定了林彪那点劳动成果，还蹂躏了他那可怜的“政治自尊心”（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汇）。

林彪终于按捺不住，粗暴地打断了罗荣桓的发言：“好了。啰嗦什么？散会！”起身拂袖而去，留下众人目瞪口呆。罗荣桓更是气得浑身发抖。一连几天，罗荣桓陷入沉思之中。妻子林月琴偶尔听他咕噜一句：“讨论问题嘛，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还不是天才放错了地方。让乔布斯去管理大家吃喝拉撒同样很不爽。

林彪根本没有接受罗荣桓，甚至没法接受罗荣桓，接受了罗荣桓的话，就意味着放下自己手中的政治旗帜。那旗帜是不能放下的，因为他还要效法恩格斯接班马克思，斯大林接班列宁，蒋介石接班孙中山，自己接班毛泽东呢。所以两人吵了一架，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林彪继续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罗荣桓当然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就打电话给总书记邓小平，报告他与林彪的分歧。邓小平感到问题严重，于是拿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果依然是大多数人赞同罗荣桓的意见。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罗荣桓与林彪在公开争论中占到了上风。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司令和两个政委争论政治问题，获胜的概率能有多少嘛。一时间搞得林彪压力很大，某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风，说我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没有什么事嘛！我还受表扬嘛！我不会有什事，就是有什么事，我也绝不牵连你们，我的妻子儿女也不牵连。”

如此一来，林彪看罗荣桓更不爽了，以至于以病号之身抱怨罗荣桓病号。林彪听见罗荣桓到处宣传他理解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林彪那一套。林彪一看那情况，抱怨曰：“他一个老病号，不注意休息，还到处跑什么？”因为罗荣桓的病情比林彪严重。

当林彪得知罗荣桓的讲话内容：“一九六一年全年的工作中心是四抓一调查。四抓是抓思想、抓训练、抓作风、抓生活，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更为不爽了，动火曰：“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讲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当时罗瑞卿在场，对林彪的反应很吃惊。罗瑞卿老半天才搞明白，林彪恼火，是因为罗荣桓和他不一路。

林彪和罗荣桓的关系就是这样，是志同道合之人，也是铁杆搭档，最后出现了裂痕。之所以志同道合，是因为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民族危机之际以身许国。之所以是铁杆，是因为他们都是民族之精英，为了共同的目标各自分工不同，最终又建立赫赫功业。之所以出现裂痕，是因为再一次困难之际（国家建设出现问题）选择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两个人的裂痕没有进一步加深，原因很简单：罗荣桓早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号，罗荣桓逝世，终年六十一岁，十大元帅第一位离开人世。

如何评价罗荣桓的一生呢？答案很简单：共产党人的楷模。如果共产党人都能像罗荣桓那般，现在的中国已经站在世界之巅。

罗荣桓的死折射出林彪心中的矛盾。罗荣桓病重期间，林彪没有探望过。这个可以理解，毕竟林彪是出了名的不搞关系。

在罗荣桓的公祭大会上，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参加了，惟独林彪缺席。并非林彪铁石心肠，而是心理矛盾复杂。

罗瑞卿回忆：公祭大会开始之前，叶群给罗瑞卿打电话，问林彪要不要去参加追悼会。罗瑞卿回答说，由他们自己定。叶群说林彪身体不好。罗瑞卿说，身体不好就不一定要参加了。逝世的已经不在，在世的还是要保重身体。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打来电话说，林彪说他还是要参加。罗瑞卿向叶群交待了参加时间和行车路线，然后向负责主祭的刘少奇汇报。又过了一会儿，还是叶群的电话，又说林彪身体不好，还是不去了。罗瑞卿又连忙向刘少奇报告。公祭大会即将举行时，又传来叶群的电话：林彪说他还是要参加。罗瑞卿又布置行车路线，通知会场主持人，说林彪马上出发。刚忙完，叶群再次通知说林彪不参加了。

——如此反复复杂，只有林彪了。

罗荣桓虽然去了，但故事依然没完。

林彪依然走在自己的路上。

——坚持继续神话毛泽东，在务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是一条死胡同，没有出路的。

林彪想要脱困的唯一办法就是真的接班成功，迅速转回来——然而那个可能性不大。毛泽东本人的身体相当的好，游长江或者北戴河都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身边有一大群反对者，他们是跟着刘少奇走的。

大家虽然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但是刘少奇是铁了心要调整经济的。林彪呢，唯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扛起“传统”大旗。那面旗帜就是维护之前毛泽东的既定政策，如三面红旗。那个位置原本

是刘少奇的。刘少奇在那个位置上呆了将近二十年，直到大饥荒来了，呆不下去了，另起炉灶。林彪要去坐那把刘少奇坐过的椅子，结果必然不容乐观。

因此，即使毛泽东当时的身体不好，真的要退下来，林彪也不见得能接班。——除非使用武力。那是不可容忍的。所以林彪只能在那条死胡同里继续摸索。那是林彪想不到、不愿意、却没有任何办法的事情。

胡同虽然是死胡同，却并不平静，风暴一直在刮。什么风暴呢，看看郭兴福的遭遇就知道了。因为大比武，郭兴福出名了。按照个人成绩，郭兴福应该出名。因为他的方法是有效的，出名当之无愧。

出名之后的郭兴福换了工作，不再是带着一帮人到处表演，而是去了南京军区高级步兵学校当教员，成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新岗位比野战军当排长要舒服多了，但是他却因此遭殃，因为文化大革命来了。如果郭兴福还是在野战中当一个小排长，估计就躲过去了。因为当时北有苏联威胁，南边有美国威胁，野战军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跟平常一样，不搞啥文化大革命。但是军校就不一样了，属于文革之风必吹之地。

郭兴福虽然是李德生发现的，但郭兴福教学法是罗瑞卿推广的。相当于说，罗瑞卿成就了郭兴福的大名。文革恰好是从批斗罗瑞卿开始的，郭兴福毫无悬念地成为罗瑞卿的“狗腿子”，惨遭批斗。

一般来说，文革初期那段时间特别猛烈，对郭兴福那种典型人物更为猛烈了，所以她的高帽子比别人更高。批斗郭兴福，实际上是为了让他揭发罗瑞卿。但是郭兴福是真正的军人，血性男儿，绝不冤枉别人。罗瑞卿对他有知遇之恩，更不会往罗瑞卿身上泼脏水了。所以他成了死硬分子，遭受更多折磨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在夏天最热的时候高达四十度，郭兴福被逼嘴里叼着一根稻草在水泥地上爬行，爬一步磕一个头，嘴里还要大声说我有罪。对一个真正的军人而言，这是致命的羞辱。更为致命的是，那羞辱不是来自敌人，而是自己人，是曾经的战友，曾经的上下级，自己的同胞。所以郭兴福绝望了。

绝望中的郭兴福除了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坚决不揭发罗瑞卿之外，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死。不仅自己去死，全家一起去死。他原本是这片土地上朴实无华的男人，有着朴实无华无法的希望。但是看见大地上如此狂乱，那就最彻底地与之决绝。

他和她夫人商量好，先把孩子掐死（免得在那绝望的世界里被摧残），然后全家通电自杀。事情原本是有序实施的，但是邻居发现了，撞门救下了已经过电昏死的郭兴福。郭兴福醒来之后，依

然寻死，用菜刀狂砍自己，血流满地，依然没有死掉。三个孩子死了，他和他夫人却在命运的戏弄之下存活，面对更为残酷的命运。

虽然他自己没死成，却被“判”死刑。后来经过许世友和李德生多方面做工作，才从死刑改为二十年有期徒刑。然而此时的郭兴福虽在人间却已经是鬼魂。每当探监的时候，就是郭兴福最受折磨的时候。他不想听那悲惨的哭泣声，那声音勾起他的噩梦。他更不敢看孩子的眼睛，因为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自己还苟且偷生。他只能静静地蜷缩在角落里，等待可怕的时间过去。

文革之后，郭兴福再一次重见天日。天还是那天，地还是那地，但是昔日那个生龙活虎的汉子已经不在，从身体到精神都死在那疯狂骚动的岁月里。

一九八五年，郭兴福死于车祸，年仅五十五岁。

六、接班人林彪

（一）接班人的尴尬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林彪的命运如何呢？

形容那场风暴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暴烈，那么猛烈，以至于没有人能抵挡，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也不能抵挡；另一个特点则是无孔不入，除了野战军等少数角落，大街小巷一扫而过，居委会大妈都没能躲过。

两个特点相互依存，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即使是毛泽东本人。

林彪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上。那个位置特殊在：地位高，权力模糊，行为尴尬。

地位高：副统帅、接班人、最高领袖的亲密战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实在在的，一点也不含糊，比刘少奇的含金量还要高一点。

权力模糊：林彪是从军队走出来的，他的根系在军方。文革大风吹遍大江南北，只有野战军没有吹到。也就是说当行政系统被摧毁之后，林彪的根系一点没动。而且林彪的势力超出军方，延伸到政坛上。但是林彪行使权力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那个人把他压得不能动。林彪的根系都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如果林彪要对付其他人，那些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几乎足以打倒所有人。但是林彪一旦和毛泽东发生分歧，那些力量立刻就土崩瓦解。原因无他，林彪的力量都是毛泽东的力量。队伍是毛泽东拉起来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连林彪本人都是毛泽东刻意栽培的。所以日后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基本上是重复了当年张国焘的老路，孤身出逃。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调动的权力基本上在毛泽东手中。没有毛泽东的命令，不管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是军委副主席林彪或贺龙，很难私下里调动部队。所以林彪的权力相当模糊。

前面两点都容易理解，关键是第三点，行为上。

林彪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已经难以行使权力，个人行为更是尴尬了。

不管文革大风怎么刮，大家心里都明白，搞那一系列整人整风是一个得罪人的活。不管在哪里混都要为人处事。不管哪里为人处事，最基本的原则都是不要轻易得罪人。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把所有人都批斗一遍，换句话说就是都得罪一遍。那样的事情是不划算的。

如果说最高领袖可以扮演好人，说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后来弄坏了，其他人就不好说了。大家既然选择毛泽东为领袖，那就相当于给予他扮演好人的权力。大家愿意相信领袖出发点是好的，是下边搞乱了

林彪做了领袖最重要的助手——接班人，就尴尬了。因为他一方面要好好干活，把文化大革命搞得红红火火，显示自己对领袖的忠心。另一方面呢，他也想着接班问题。不管怎讲，自己是二号人物了。如果一号人物不在，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老大。那正是他的梦想所在。要当老大，也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就是当好人。

国家老大搞不好人际关系，真是太搞笑了。

所以林彪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两边都不能得罪。左思右想之后，再一次用他的脑袋搞创造，就是除了吹捧毛泽东之外，在具体的问题上不表态。凡是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画圈他跟着画。一方面显示自己无意出头，另一方面也不想得罪人。说文雅一点，就是继续务虚不务实。通俗一点说，尽量躲在毛泽东那巨大的身影里，不得罪人。

但是林彪并不是全部无动于衷。他的全部选择都是要增加权势和影响力，以便将来可以成为最高领导。那是他的最高战略。一切都是为了最高战略服务。如果务虚有利于那个战略，那就务虚。如果需要出击，那也是毫不犹豫。

说白了，一切还是那两个字——利益。

林彪在走向最高领导的岗位之前，他要做的就是保住自己接班人的位置，打击那些可能威胁到他的位置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接班人问题。

接班人的位置原来是刘少奇坐着的。刘少奇接班不成功，如今换成了林彪。在林彪眼中，至少还有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和林彪之间是一种相当奇妙的关系。

从年龄上看，邓小平年长林彪三岁。两人早期接受的教育相当，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改变。邓小平在十六岁时去了法国勤工俭学；林彪十七岁去了黄埔军校。邓小平在法国认识了比自己年长几岁的周恩来，逐渐接近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产党的文斗时代，两人基本上都没啥表现。林彪在爱情和军事中打发时间。邓小平呢，去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直到此时，两人基本上没啥接触，把他们弄到一块的，还是蒋介石。

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挥舞屠刀，成了所有共产党人的考验。假的共产党人，基本上都脱党了。真的共产党人，要么死了，要么活了。死的就死了，活下来的，都是经过烈火考验的真金。邓小平和林彪都是那样的人，而且殊途同归，最后去了井冈山。

井冈山上，应该是两人首次相见，时间应该是一九三一年之后。

因为邓小平回国之后，常常游走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他的地位在周恩来之下，做事风格又有很大不同。这个后面再说。

大革命之后，邓小平没有直接加入武斗行列，而是赶紧改一个名字，随着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担任中央秘书处长，级别不高，但很重要。后来中央在上海越来越难混了，邓小平从中央去地方，也搞革命根据地，发动白色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并且搞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那块地方搞得并不特殊，比起井冈山和鄂豫皖那样的庞然大物，实在不算啥。那个地方出来的人物，除了邓小平，后来级别最高的是张云逸大将。

确切说，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亲密，长时间以来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但是那段关系并没有影响到邓小平，而是刚上井冈山就表示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倒霉，邓小平也跟着倒霉。从此之后，邓小平就成了毛泽东的铁杆粉丝，著名的“毛派”人物之一。当时的林彪也被视为毛泽东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林彪是毛泽东一手提拔培养的。

虽然都是毛泽东的粉丝，但是人生境遇并不一样。邓小平因为强于政治，所以那段时间经常跟着毛泽东倒霉。林彪虽然也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但是做人比较低调，手握重兵，最重要的是专业能力强，所有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不管国际派那帮人怎么折腾毛泽东，对林彪还是以拉拢为主。毕竟嘛，不管开会如何炮火连天，在战场上还是需要天才。

井冈山上的邓小平和林彪没有可比性。因为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比较弱小，还在国军的围追堵截之中过日子。邓小平的地位也不高，还没有发挥特长的机会。林彪呢，自从朱毛会师，在井冈山站稳脚跟之后，一直都是军队的核心人物。而且林彪本人不喜欢搞关系，对谁都爱理不理。哪怕是老领导毛泽东和朱德，不高兴也不怎么说话。至于邓小平那样不起眼的角色，林彪更不会放在眼里了。

邓小平的特长也是搞政治，人缘很不错。比方说后来的十大元帅，邓小平和其中的九个关系都还行，只有林彪例外。那九个人中间，包括宽厚的朱德，包括豪迈的陈毅，包括刚烈的彭德怀，也包括和林彪同样沉默寡言、师出同门的军事天才徐向前。唯独和林彪关系不怎么样，好像预示着未来的不平静。

然后两位一起长征，然后抗日。林彪受伤去了苏联，邓小平一直在国内，但在战场上也没啥表现。中间也就是跟在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参与一把。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两人基本上也没有交集。林彪去了东北，在那里扭转乾坤。邓小平则和刘伯承一起驰骋于中原大地。

战场上的邓小平和林彪是没法比的。不是邓小平不行，而是林彪太行。毕竟能在战场上和林彪比的人，共产党内部，也就是寥寥数人。

离开了战场呢？

天下大势已定，各路地方大员进中央，就是所谓的五马进京。进京五马（高岗、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之中，一马当先的是高岗。论人气指数，邓小平和高岗是没法比的。从年龄上讲，邓小平比高岗年长一岁。入党资历上，邓小平比高岗早几年。革命时代，两人相当。红军时代，两人都不错，但都谈不上杰出。八路军时代，两人差不多。解放战争时代，邓小平级别更高，是二野政委。高岗在四野一开始既不是司令也不是政委。但是四野比二野的摊子大很多。所以高岗工作也没少干。而且在抗美援朝的过程中，高岗坐镇东北，负责志愿军的总后勤工作，其贡献丝毫不比其他大军区政委差。所以就整个战争年代，干工作方面，高岗不输于邓小平。所以才有高岗红红火火的进京。

当时进京的五个人中，高岗和邓子恢都是四野出身，邓小平是二野代表，饶漱石来自三野，习仲勋则是一野的。四野的总代表则是林彪。林彪当时虽然因为身体原因处于半隐退状态，但是地位摆在那里。高岗盛气凌人之前，首先要得到林彪的认可。

至少从建国之初看，邓小平的地位已然和林彪没法比。

高岗自杀之后，邓小平的地位逐渐升高，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名义上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外的第四号人物（把朱德也算上是第五）。实际上主持军委的彭德怀，和处于半隐退状态中的林彪都比他能量大。即使其他元帅们，声威也不比他弱。

尽管如此，邓小平依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和毛泽东一样，凡是认准的事，就会去干，坚定的去干。比方说初到井冈山，毛泽东和国际派的斗争中处于劣势，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对的，毫不犹豫的去挺毛泽东，不管结果如何。等到经济建设出现问题。邓小平又认定刘少奇是对的，决定跟着刘少奇干，不管结果如何。

当年挺毛泽东的结果，邓小平成为“毛派”小集团中的一员。挺刘少奇的结果更厉害，沦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人物。

当毛泽东“炮打敌人司令部”时，邓小平很悲催地发现，站在他前面的只有刘少奇一个人。当毛泽东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千人等打翻在地，新上任的林彪则走在原来的老路上。

老路，即继续务虚，吹捧毛泽东。

老路，即维护、巩固自己的位置。

要在那条路上走下去，就必须让邓小平跌入深渊。

从林彪的角度看，毛泽东身边那些人，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不论战功还是资历，毛泽东身

边的人都没有资格或者能力取代他。最有可能取代他的人是谁呢？很可能在被打倒的那些人中间。因为在文革风暴之中，绝大多数实力派都成了“走资派”、“造反派”等等各个新门派中的人物。

假如，从林彪的位置上假设，政治风暴突然转向的话，怎么办？答案很明显，对他很不利。即使不能把他怎么样，至少接班人的位置肯定是没有了。

即使风暴不转向，那么风暴弱了怎么办？

风暴弱了，那些实力派的人物必然复出干活。原因无它，他们很能干活。他们的历史地位都是干活干出来的。这个世界的权力，基本上都是干活干出来的。要说天上会掉下权力，绝对是瞎扯。天上连馅饼这种实物都掉不下来，怎么能掉下权力那样抽象的东东呢，呵呵。

而且情形更为不乐观的是，即使风暴没有减弱，也出现了一些很不正常的苗头。

比方说吧，在那样异常的风暴中，刘少奇被批斗臭掉，彭德怀、贺龙、陶铸、罗瑞卿等人遭到严酷的折磨，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贵为“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并没有受到如此待遇，就是“不正常”的。

比方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号到十二号，那是一次极为不寻常的会议。上一次开中央全会，还是一九六二年初。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全会每年都要开的。中间四年在干嘛呢，很简单，在政治运动。

那大概是建国以来，政治压力最大的会议之一。在那次会议上，刘少奇开始检讨关于派遣工作小组去校园的问题。会议随即批判刘少奇。会议的第四天，也就是八月五号，毛泽东写出了那张大字报。会议之后，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

正是那场会议，通过了文革纲领性文件。

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实际上那场会议是在毛泽东一手操控之下的，是文革的序幕。目的就是拿下一批人，换上另一批人。拿下的人物的核心就是刘少奇。换人的核心正是林彪。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当时正红得发紫）回忆，有三件事令他感到吃惊：第一，公报初稿送审名单上没有刘少奇；第二，送审传阅名单上，毛主席后边即是林彪；第三，初稿上，引述了刘少奇的一段话，在送审中被毛泽东勾掉了。

正是在那场会议上，林彪成了毛泽东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原因很简单，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必然得罪很多人，需要强有力的支持。林彪已经是军方代言人。

奇怪的是，在那样一场风暴巨大的会议上，投票结果，毛泽东毫无悬念的第一，林彪上升到第

二，周恩来一贯第三；之后的第四号人物竟然是邓小平。

而且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除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之外，没有人批评邓小平，林彪就感到不对头。为啥出现这个情况呢，根据王力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号，毛主席对我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按照王力的回忆，那个时间应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的半个月。也就是说那时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都准备停当，部署就绪。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想把邓小平留下来，留作一种备用，留一手后路。

这些是符合毛泽东的做事原则的。斗政敌，狠斗最大的那一个，之前的张国焘就是例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最终的目的并非斗人，这些后面再谈。对刘少奇肯定是不手软，如同当年对待张国焘。对邓小平是可以留下来。因为邓小平本人就是毛的铁杆，而且很能干。

但是在林彪看来，那样一种后路就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毛泽东看到那个情况，为了安抚林彪，就让邓小平去和林彪谈谈。话虽然没说明，也是很明显的，就是适当表示一下跟着林副主席。跟着林副主席就是跟着毛主席嘛。按邓小平自己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谈崩是必然的。因为大家都是毛泽东铁杆粉丝，原本都是平等的，凭啥要跟着你啊。跟着你也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那一套不行啊。邓小平就是因为之前那一套不行了才选择跟着刘少奇干的。如果这么容易服软，那么当初就不会选择跟着刘少奇了。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贺龙身上，而且情节更为生动。详情参见前面。

既然谈不拢，那就不客气咯。

林彪亲自上去批判邓小平，其实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因为毛泽东暗保邓小平，不可能向刘少奇那般，因为一点莫须有的材料就能整出那么多高帽子。

林彪批判邓小平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条是二野和四野争功。依据倒是很明显，毛选上有一条是四野的功劳，邓小平硬说是二野的。那个时代，毛选就是“最客观”的一种存在，至高无上的依据。拿这个来指责邓小平，谁也不能说啥。问题这是小事，并不致命。争一点又怎么了？谁能没有点小错误？

致命的是第二点：红七军临阵脱逃。红七军是邓小平在左右江搞出来的队伍。如果说红七军临阵脱逃，那邓小平问题就大了，不死也得脱层皮。刘少奇因为个人一点小原因就完蛋了。如果说毛泽东要是下决心修理邓小平。这个罪名或许足够邓小平去见马克思了。然而毛泽东说邓小平没有历

史问题。

林彪下决心去办的事，竟然没有办到，正好折射出他的无奈。

（二）林彪的心

说到这里，说了那么多之后，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林彪是如何看待文革的。

我们看到林彪支持毛泽东，看见林彪吹捧毛泽东，看见林彪想要接班。

我们又看见林彪因为那些动作从一个务实的军队统帅变成一个务虚的玩政治的政客。

我们还看见因为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才得以牢牢控制军队，放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所有这一切过程中，林彪的内心如何，他是如何认识的？这些问题其他人没法回答，甚至不好猜测。因为林彪本就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他不愿意说，更愿意想。晚年的林彪常常一个人静坐，坐在那里默想，就好像战争年代对着地图默想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习惯，比方说划火柴。划着了，再灭掉，再划，再灭。啥意思呢？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也许是借着火柴燃烧时的那一点点火光和火药味回忆一下当年战场的清醒。

林彪更不是一个容易猜测的人。他一辈子面对过很多对手，很多都是杰出之士，依然没有被猜透。如今的我们，几十年后的今天，生存环境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去猜？

如果要寻找蛛丝马迹，只能从当年他自己的言行中寻找。怎么寻找呢，很幸运。林彪自己留下过那样一篇讲话。林彪有过不少讲话。唯有那篇讲话透露的信息最多。那篇讲话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比任何人能猜测的东西都多。

那篇讲话发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号。两天之前，也就是五月十六号，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下发。那时候，文革标志性案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案正在定案。

林彪的那篇讲话和《五一六通知》一样，被认为是文革的宣言。不仅是文革宣言，也是林彪个人内心的一种宣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讲话：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

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的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治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甚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

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接下来林彪谈论政变问题。

这是我看到的，关于政变最强悍的论证。我很怀疑稿子是林彪亲自写的。因为只有他那种做事绝对认真，且思维与众不同的人才会弄出这样的东西。

下面这部分是追溯政变历史的：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了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6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

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闹闹，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15年。秦始皇只有12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26人。汉高祖在位12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隋文帝在位24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

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宋朝赵匡胤，在位 17 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 16 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 13 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 31 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 3 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取得政权已经 16 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看看这些，可谓通俗明白，老少皆宜，搞不清楚的还以为是在搞研究的呢。应该说比大多数搞研究的写的文章更具有可读性，更耐读。而这只是陈述，陈述历史。

对林彪而言，他可不会闲着无聊去陈述历史，而是要从历史事件中论证现实的必要性。所以再次来一个转折。转折到显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案子上来。

坏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们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

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还是两个前途。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甚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 70 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 100 岁。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

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不容易看出来。

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

——这段论证党内斗争的必要性。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共产党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讲到这里再来一个转折，转回到共产党历史。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共产党就是在斗争中壮大的。和军阀斗，和国民党斗，和蒋介石斗，和鬼子斗，和联合国军斗。

但是另外一方面，党内斗争不断。早期的陈独秀，中期的王明、张国焘，都是斗得天翻地覆。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党内斗争。谭震林在放大炮时就说得很明白：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斗争，我准备牺牲。

林彪对这一切同样明白，所以他对党内斗争有所回顾。只不过是未来即将拉开的斗争大幕造势而已。他就是要告诉大家，斗争一直存在的，虽然共产党赢得了政权，党内斗争一直存在，而且在所难免，所以他接着说：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要“审判”党。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极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

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互相联合的。

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 16 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有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讲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总之，要斗。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行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我们得了天下，要丧失天下，创了业不能守业，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

流的血，统统付之东流，我们就成为历史的罪人，成为机会主义者。

——既然要斗争，总得有依据。依据是啥呢，就是毛泽东。

从以往经验来看。共产党是在确立毛泽东为核心地位之后才迅速壮大，无往而不利的。所以才有了毛泽东思想。

从林彪本人来说，他的成功固然和他的天才与勤奋分不开，但是没有毛泽东作为那颗大树，他也不可能如此成功。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徐向前。两人师出同门，同样是天才，同样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徐向前一直在养病，身体不好的林彪则一直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既然要斗争，林彪再一次选择站在毛泽东身边，而且把毛泽东放到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凡是反对毛泽东的，都是叛徒，所以林彪继续说。

——林彪如此吹捧毛泽东不觉得脸红么？当然不觉得。毛泽东固然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拔高到那种程度就太危险了。

按照林彪的那个吹捧法，全世界只有三个人曾经得到过那样的吹捧，他们不是任何一个国王，任何一个皇帝，而是西方的耶稣基督，是伊斯兰世界的先知，是东方王朝时代的孔子。他们几个最终还是分别从那个位置上掉下来了。因为大家都是人，纵然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站得高、看得远、成就更大，但还是人。

如此吹捧，就算为了说服自己也要拿出足够的一句来。林彪有他自己的依据。依据如下：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 64 岁，恩格斯活了 75 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 54 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6 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

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那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甚么是主次。

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

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仗。毛泽东思想全部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 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 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

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摆脱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恨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合，无论那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20 万人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

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这次斗争以后，不要存太平观念。有些人，私有观念、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们随时都要搞鬼，还得提高警惕。

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集体主义、**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思想。要看到地球在运动，万物在发展的现象，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做违反历史前进的事。做这种事，害人害己，身败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以上这些就是林彪的那篇讲话，也是林彪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表露，至少很接近。会不会是违心的？那样也太小看林彪了。

从井冈山开始，林彪就敢质疑红旗还能打多久。

到达陕北之后敢提出去陕南打游击。

在东北敢让毛泽东脑袋清醒一下。

建国之后，敢不去朝鲜。

也就是说林彪吹捧毛泽东是“真心”的，基于他过往的经验，经过仔细思考之后的结果。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的风才能吹得那么猛烈。因为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发动，还有很多追随者。不能说他们的出发点怎么样，至少在当时环境下有那样的土壤。林彪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而已。

通过前面的讲述已经知道了当时林彪的若干特点：

第一，他想要接班，想要掌权，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中。

第二，为了接班，他卖力地吹嘘毛泽东。为了吹嘘毛泽东，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拔高，拔高到一个危险的高度。在那个高度上，毛泽东思想将进入死胡同。更为重要的是，他也不完全是刻意吹捧，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他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第三，因为吹嘘毛泽东，林彪本人陷入一种务虚的境地无法自拔。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干实事。在那种风暴下，所有干事实的人都可能授人以柄。因为干实事就会有缺点，就可能被抓去做缺点，就可能遭受攻击。林彪作为接班人，必须是光鲜亮丽的，而且必须站在毛泽东身后。所以在那个风暴下，他必须继续务虚，直到最后时刻的来临。

第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林彪是认可，并且全力支持的。而且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完全为了掌权和接班，而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世界观的一种认可。

正是基于这些特点，毛泽东才会放心大胆地让林彪成为自己的亲密战友。三个月之后的党中央全会上，刘少奇挨批，地位下降，林彪反而上升。

与此同时，凡是没有林彪这种特点和觉悟的人成了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对象。刘少奇、彭德怀就不说了，必须遭受冲击的人物。还有贺龙也遭受冲击，甚至四野出身的陶铸、罗瑞卿也不能幸免。

事实上，林彪本人为了自身地位，必须隐藏在幕后。除了批判邓小平时露一面之外，很少出面，很少讲话。他的目标主要靠另外一帮人，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江青那帮人完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魂魄是张春桥，领导则是江青。江青能够跻身高层，无非靠着她的特殊身份。如果没有她那巨人丈夫，她还是一个唱戏的。

其实林彪和江青是绝配。

林彪是党章里面的法定接班人，地位特殊。而且在朱德全面隐退、在彭德怀和贺龙挨批斗、在刘伯承、陈毅靠边站、在聂荣臻转行、在徐向前和叶剑英没有实权的情况下，林彪身为十大元帅，掌控军权，地位更为特殊了，实力悬殊。其实即使十大元帅都在，也没几个人能和林彪一较高低。

江青是领袖的夫人，身份特殊。所到之处谁敢不买账？即使心里不爽也不能说出来。凡是不买账的，都没有好果子吃。比方说彭真，不买江青账，最后就不用买了。

地位特殊的林彪和身份特殊的江青合作起来，那个能量是巨大的。因为身份特殊的江青可以指挥中央文革那帮书呆子到处煽风点火，她的身份让她畅行无阻。地位兼实力都很特殊的林彪可以成为他坚强的后盾。

这个怎么说呢？平时那些高干们都是威风凛凛的，不要说去批斗他们，就是见一面也不见得能如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被保护起来。大门前有保安，小门前有警卫，想见不见得能见着。

林彪代表的军方，再加上一个公安部长谢富治，控制着国家机器。大门前的保安，小门前的警卫不但不去保卫他们，还可能站在批斗的行列中，把红卫兵或工宣队的人带进去，大家一起批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方说刘少奇就经历过。

文革初期的风暴之所以能刮得那么大，很大程度上就是两人密切配合的结果。只不过，江青上串下跳在明处，林彪控制着国家机器在暗处，但本质上还是一种合作关系。

（三）林彪的肢体

文化大革命的暴走，灵魂人物当属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他们分别又有自己的力量和团队。江青的团队是文革小组里的那些秀才，周恩来身边围绕着一大群老人家。林彪也有自己的班底。在那个暗地里，林彪就是灵魂人物。

林彪的耳目是叶群。除了叶群之外就是所谓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这几个人共同的特点如下：

一，四野出身，林彪铁杆。

四野是四大野战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装备最好的。四野出身的高级将领比比皆是。五五年评军衔，只有四野有两位元帅，林彪和罗荣桓，占十大元帅的五分之一。大将三位，黄克诚、肖劲光、谭政，占十大将军将近三分之一。上将十九位，占五十七位开国上将三分之一。中将五十七位，占开国中将一百七十七位的三分之一。这还没算早死的陈光，还没算转业的那些人，如陶铸。其中很多是跟林副主席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四大金刚也一样。

二，级别不高，资格不老。

在那些人中，四大金刚处于哪个位置呢？级别最高的是黄永胜，上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也就是中将。即使上将里面，论资格老，肖华当仁不让；论战斗力，李天佑、韩先楚那些人没得说。也就是说上将里面黄永胜并不是最优秀的。

三，他们家庭条件都不好，都需要闹革命生存。

四个人中间，只有黄永胜是湖北人，跟着罗荣桓参加秋收起义。其他三人都是江西人，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后扩充的。有趣的是，四个人年龄相当，年纪最大的黄永胜一九一零年出生，最年轻的吴法宪是一九一五年，另外两个都是一九一四年的人。林彪已经够年轻了，他们比林彪更年轻。他们参加革命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

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都没有经历过抗美援朝的考验。

论战功，黄永胜当排第一，他参加革命很早，从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到东北，他一直都是高级将领，后来第四野战军成立，黄永胜为四十五军军长，政委恰好是邱会作。邱会作一直坐政委的位置。和黄永胜合作之前，他和猛人钟伟也合作过。他能干很多事，包括搞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演活报剧，唱歌，每一样他都能组织得起来，而且自己带头干。当初在陕北，邱会作因为善办事，能周旋，会说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均呼之“红小鬼”。

吴法宪和邱会作一样，也是干政委出身。只是他多一个特点，打仗不要命。比方说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整体被动的情况下红一军团打了几个漂亮仗。吴法宪所在的二团伤亡很重，但他始终冲锋在前，而且没死。后来每当作战艰苦时，林彪总是让二团顶上去，二团总是能完成任务。林彪对二团自然是青睐有加，视吴法宪为虎将。另一个例子是飞夺泸定桥。吴法宪和全团一起强行军按照既定时间抵达。战斗中吴法宪率先冲锋，手指被弹片切掉两根，简单包扎后，继续冲锋。吴法宪表明，政委也可以很勇猛。

李作鹏读过几年书，加入红军之后，勤于思考，善于归纳总结，向领导提意见，算是重点培养对象。他的级别一直是什么处长、什么科长、参谋长之类的，算是在军队机关单位工作的文职人员。后来红军到达陕北，李作鹏因而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个教官，在那里结识到校长林彪。林彪认为李教官有能力，李作鹏认为林校长有前途，双方有了良好印象。在整个抗战期间，李作鹏练兵。到解放战争中，李教官成功从文职人员转变为统兵大员。

四大金刚地位原本都不高，之所以日后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都是被风吹上去的，那股风就是把其他很多人吹到人生谷底的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一辈子有三大特点：打仗、玩女人、整人。

打仗就不用说了，从秋收起义开始，到井冈山历次反围剿，到长征，抗日，解放战争，甚至抗美援朝，基本上都有过表现，他的开国上将军衔完全是打仗打出来的。而且战场上的黄永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悍。当然，那年头能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将军都强悍。不强悍也走不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啊。但黄永胜是悍将中的悍将，他可以手持双枪打天上飞鸟，所谓百步穿杨不过如此，近身搏斗能单挑好几个。广州军区司令员那会，还在一次部队训练中表演过五十米开外飞刀削树叶的绝学。如果不是政治上出了问题，说不定日后会和许世友一样成为“传奇”。

玩女人应该是黄永胜一辈子的污点。不管战争环境多么困难，生活多么艰苦，都改变不了黄永胜找女人的习惯。抗战的关键时刻，黄永胜还有时间和精神与一个地主的女儿打得火热。聂荣臻看不下去了，把他好好教育一番。解放战争开始，共军挺近东北。当时的黄永胜已经是热辽纵队司令员，高级将领了，还是狗改不了吃屎，继续找女人，搞出丑闻。老上级罗荣桓特意把黄永胜拉过去大骂一顿：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是不改，还是不要脸了？据说那是罗荣桓在东北最大一次动肝火，可见黄永胜的能耐：玩女人和打仗一样在行。咋一看还以为是跟高岗混的，其实他是清教徒林彪的跟班。也许是精力太过旺盛吧，其实可以学学人家许世友嘛，多喝点酒，少造点孽。

黄永胜是四野猛将，但是四野猛将并不是黄永胜一个。能和他匹敌的还有好几个，像刘亚楼、李天佑、韩先楚、邓华等人都不在他之下。他之所以能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关键还是在第三点，政治能力，或者说整人。

共军里面很多将军相当有趣。许多政委出身的人打仗一点都不含糊，粟裕将军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有些司令出身的人，搞政治则是高人一筹，黄永胜就是。

黄永胜起于第一次庐山会议。当时彭德怀有一个“司令部”，大家都对司令员彭德怀群起攻之。黄永胜意识到眼前的机会，在同为四野出身的钟伟将军不顾压力替彭德怀和黄克诚辩解疑难时，黄永胜意识到机会来了，主动出击。除了攻击彭德怀之外，还把火力集中在“司令部”成员之一，老同事邓华身上。黄永胜主持一个小组开会，搞邓华的关于“反党反毛主席”和“军事俱乐部”的问题。

第一次开会时，大家是老同事，黄永胜还留点余地：“你现在还不是反党，把问题讲清楚就行了。”可是搞出的材料没能让领导满意。据说是林彪看了《会议简报》上对邓华问题的提法表示不满。黄永胜立马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了：主持第二次批斗会时，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已经走上了反党反毛主席道路，老实交代你的反党反毛主席罪行。”

给人家扣帽子当然要有证据。邓华本来就是冤枉的，随便安点其它“罪名”，邓华也可以接受，但是让他去“反党反毛主席”，打死也不干。邓华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也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

黄永胜也懂那个道理，他很快亮出自己的逻辑：“高（岗）、彭就是个反党联盟么，彭、黄也是个反党联盟么，高、彭联盟中你是个成员，彭、黄反党集团中你是个重要成员。你的错误性质就是反党反中央的。”

其他人马上附和：“实质上是这样，不承认不行。”

这个逻辑本来就很混蛋。邓华有口难辩，流下了伤心的英雄泪。朝鲜战场上铁打的汉子，竟然在会场上流眼泪，可见斗争之残酷，可见黄永胜整人扣帽子的水平之高超。黄永胜当然不会在乎邓华的眼泪，他完成了任务，赢得领导赏识，为日后升迁、整更多人奠定基础。

黄永胜除了上面那些特长，还有一个在政治舞台上必备的素质——会做人。所谓会做人，实际上就是站队问题。文革开始之际，黄永胜是广东军区司令员，自然也少不了被批。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狂潮中，广州“红色造反者”一派的造反派猛批黄永胜反对中央文革，还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文件：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

黄永胜当然很生气，向来都是他去修理别人，没有被别人修理的经验。斗争经验丰富的他没有向其他人一样低头，而是自己主动出击：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声向江青喊：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

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当然没有。为啥要“江青和中央文革听毛主席的话”呢，原因很简单：毛泽东让林彪做接班人。江青和中央文革虽然对林彪很尊重，绝不是没有自己的打算。那也是日后第三次庐山会议的导火索。黄永胜那么一搞，信息很明显，间接向林彪表达忠心呗——而且如此彻底且不漏痕迹。

不久之后，黄永胜达到人生的巅峰，成为解放军总参谋长——那可是解放军的核心位置。看看之前的各位前任，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罗瑞卿，级别分别是元帅和大将。罗瑞卿之后，杨成武代了几天，之后就是黄永胜。也就是说除了没能转正的杨成武，黄永胜是第一个上将级别的总参谋长。当时，十大元帅九个还在世（罗荣桓去世），十大将军九个在世（陈赓去世）。

黄永胜能当总参谋长，是因为林彪。林彪看上黄永胜，是因为黄永胜站队精明。黄永胜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和江青划清界线——他那是火中取栗。取得荣耀，也将带来灾难。至少从当时看，他是成功的。而在当时那种风气之下，他也不可能想太多。因为一步走错，甚至走慢一点，都可能被造反派搞得很难受，许世友就是一个例子。还是毛泽东心腹呢，依然被一群小年轻从南京追赶到北京。黄永胜要不是依靠自身的精明博得林彪的信任，处境会比许世友更好？当然黄永胜也是毛泽东的干将，他的名字就是毛泽东改的，他跟毛泽东的时间比林彪还要长很多。正因如此，林彪九一三出逃时，黄永胜也基本上不知内情。

黄永胜有多成功呢？看看那个“李必达事件”就知道了。

刚建国那会，人才奇缺。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不像现在这般臭大街，都是香饽饽。广州军区政委陶铸磨破嘴皮子才要了一百多个大学生，分配到机关单位，其中就有李必达。李必达是个文艺青年，擅长诗书绘画。黄永胜虽然是半个大老粗，就只有半吊子大老粗的习惯，喜欢附庸风雅，看上李必达，有意提携。李必达虽然是文艺青年，却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特点，狂热崇拜毛泽东。黄永胜和江青划清界线之后，私下里常常议论一番江青。

李必达在旁边，常常听到那些议论。李必达觉得黄永胜如此这般议论伟大领袖的夫人似乎不妥，就写信揭发黄永胜。李必达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信交给了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的温玉成。温玉成把信转交给了林彪。然后，李必达就光荣地进了广州军区监狱。

——那就是黄永胜当年的实力。李必达的行为固然不怎么样，但是一封检举信能把自己送进监狱，可见黄永胜走红到何种程度。原因很简单，林彪需要忠心耿耿的黄永胜作为他在总参的代言人。正如毛泽东需要林彪在军方代言一样。

李必达还算比较走运的。仅仅在监狱一直呆到九一三事变之后，而且李必达成了反对林彪集团的“英雄”。只是他那英雄比较尴尬，因为他揭发黄永胜议论江青的那些事，事后看起来都是事实，所以李必达的英雄也比较尴尬——世事往往就是这样尴尬。

那么走上人生巅峰的黄永胜又在干嘛呢？具体说，也没干啥。如果是林彪站在毛泽东巨大的阴影里。那么黄永胜则是站在林彪的阴影中。和他一起站在那里的，还有其他几个人。

吴法宪是一个能打仗的政委。从一开始就跟着林彪干，是林彪的死党。林彪很看好他，虽然四野之中他并不拔尖，但一直得到林彪的信任。

因为林彪的信任，吴法宪才能进入空军系统，最后成为空军司令员。

陆海空三军，空军是最后成立的。空军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的。共军方面，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空军。共军闹革命、打江山，主要靠两条腿。所以说共军两条腿能打赢国军绝对是一个奇迹。共军在战争年代没有空军不代表不重视空军，战争一结束立马筹建空军。

早在开国大典之前，毛泽东就写信给周恩来，要建空军，周恩来立刻动手去搞。结果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政委。两位都是四野系统的，都在林彪的领导下攻城略地，铁杆。

看看司令和政委的组合就知道空军是四野的菜。四野原本就是井冈山的老底子，又在四大野战中实力最强，算是精锐中的精锐。空军虽然是一个新组建的兵种，战争中却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激动灵活，反应速度快，效率高。

应该说从那时候开始，毛泽东就有意扶植林彪。只不过后来朝鲜战争打断了那一切。那个路子直到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再接上。

林彪把吴法宪推入空军，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吴法宪一直以来都很可靠，很听林彪的话，政治上没有问题；二，脾气好。

吴法宪在空军的职位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干部部长。后来肖华去了总政，吴法宪就成了空军政委。刘亚楼是典型的军人，作风强势，在空军一言九鼎；脾气比较暴躁，爱骂人。吴法宪脾气很好，而且一直是刘亚楼的下级，对刘亚楼比较尊重，刘亚楼也享受那种尊重，所以两人关系挺好，简直是天生一对。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政委就劝说一下。对司令不满意的，政委帮忙转达。

如果就这么合作下去，还是不错的。一九六五年，刘亚楼病逝，吴法宪随即升级为空军司令员。毫无疑问，也是林彪的力量。因为林彪要把空军抓在手里，没有比吴法宪更为可靠且听话的人选了。

林彪对吴法宪说：“空军司令员这个位置，许多人想干，我推荐你干，先不要出去讲。”林彪不对吴法宪说这些话，吴法宪也知道他当空军司令员是林彪的作用，所以吴法宪对林彪有感恩之心。他曾经对自己的老婆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吴法宪对林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那是绝对的尊重。因为吴法宪本质上还是军人，军人都崇敬战场上的强者。林彪就是那样一种人。吴法宪清楚地记得，井冈山后期，还有长征时代，多少次陷入死地，都是依靠林彪走出绝境。所以吴法宪对林彪的崇拜那是如同滔滔江水啊。正是因为他对林彪的崇拜，才导致对林彪的盲目跟随。

林彪让吴法宪干啥，吴法宪就干啥。比方说在罗瑞卿的问题上。叶群去告状。那些玩意很大一部分是无中生有。但是叶群说，吴法宪可以作证。吴法宪就去作证，不仅作证，还绘声绘色地说，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大体意思是林彪身体不好，早晚要退下来，要放手让罗总长管军队。刘亚楼都死了，还把刘亚楼拉出来搞一个死无对证。

吴法宪这一套让人所不齿。

不仅在罗瑞卿的问题上，还有很多事情，吴法宪都是甘愿冲锋在前。

因为吴法宪的功能，空军成了林彪的私家花园。在那个花园里，有一个小主人叫林立果。吴法宪那一套，很难说是帮林彪还是坑林彪。事后很多事实表明，如果不是林立果那个毛头小子瞎折腾，林彪或许是另外一种结局。

林彪的四大金刚很多相同点，却又各不相同。黄永胜原本是将军，日后是在政治斗争中卖力而

巧妙的政治表演而成为林彪的心腹，进而走上总参谋长的位置上。吴法宪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林彪的心肝宝贝。同样是林彪心肝宝贝的，还有李作鹏。

所以林彪把吴法宪安排到空军时，把李作鹏安排到海军上班。

李作鹏的经历不像共产党，更像国民党出身的军人。共产党的将军基本上都是在前线摸爬滚打，一边打仗一边摸索经验，很少像李作鹏那般搞教育出身。

前面说过，李作鹏在井冈山加入共军时有一定文化，属于稀缺货，重点培养对象。李作鹏本人也勤于学习，热心干事。经过井冈山和长征考验之后，李作鹏更加成熟，成为一个人才。所以到了延安就被调到抗大上班，去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且当上了基层干部，级别相当于班主任的小队长。要知道能进抗大学习的都是战场上的高人。李作鹏能当一帮战场高人的小队长，个人素质当然也不会差。当时林彪是抗大校长，对李作鹏印象不错。日后林彪出任一一五师师长，就把李作鹏带在身边，让他当侦查科长。

后来林彪受伤出国，李作鹏跟着部队一起去了山东，一直搞文职工作。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鬼子用毒气毒瞎了一只眼睛。所以此后李作鹏一直带着黑墨镜，不是耍酷，而是需要保护那只眼睛。

解放战争爆发之前，李作鹏跟着罗荣桓去了东北。在那里他又碰见林彪。在林彪手下，他有了领兵打仗的机会，出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随后队伍扩大，李作鹏变成六纵队司令员。不是因为战功，而是因为练兵能力。因为六纵队大部分是新兵，需要训练。

李作鹏在东北也有不错的战功。但是当时猛人太多了，他并不起眼。但是并不起眼的李作鹏还是进入林彪的视野，在海南岛。李作鹏带领第四野战军王牌四十三军抵达雷州半岛，接下来和韩先楚联手，解放海南岛。

当时国军处优势，共军处弱势，因为中间有大海，共军没有军舰，只有木船，而国军有军舰掩护。在那种情况下，共军实施海南岛登陆作战，实在是兵行险着。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共军成功了，而且消灭了大部分国军，迅速解放海南岛，打得非常漂亮，创造了战争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李作鹏作为主要指挥官之一，得到林彪的另眼相看。

日后战争结束，林彪让李作鹏干起了老本行，担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后来又担任了一系列的校长。转来转去都是文职，都是搞教育，情况到一九六二年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方，需要有可靠的人在各个部门。当时海陆空三军中，海军和空军都是新军种，建国之后组建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只是上将，海军稍微好一点，第一任司令员肖劲光为大将。在当时的情况下，海军和空军都比较薄弱，但是也需要人。吴法

宪已经在空军中落地生根。那么海军呢，林彪想到李作鹏。

一九六二年，林彪推荐李作鹏担任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在海军的功能和吴法宪在空军一样。凡事听林彪的指示。只要林彪有需要，无条件满足。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满足。比方说同样是罗瑞卿的问题，叶群让空军的吴法宪作证，吴法宪作证了。同时叶群也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从“海军的角度”写点材料证明叶群的论点：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李作鹏也和吴法宪一样，选择了顺从，向叶群表示：我决不会做对不起林彪的事情。

文革初期，批斗军内一小撮时，李作鹏受到冲击，林彪得知情况后说：我活着不准反对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对李作鹏。这个诺言只完成了一半，他活着是没人再批判李作鹏了，但是他死后，李作鹏还是挨批了。

正是林彪的担保，李作鹏跟随林彪更紧密了，晋级到四大金刚之行列。对林彪和李作鹏而言，遗憾的是始终没能把李作鹏当上海军司令。肖劲光在海军司令位置上摇摇晃晃，就是没有倒下来。李作鹏用尽全身力气也没用。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依然信任肖劲光。

四大金刚中，最为曲折的还是邱会作。

邱会作原本和林彪没啥关系。加入革命队伍之后，因为为人机灵，进入中央领导的视野，号称红小鬼。正因如此，邱会作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前线，而是留在后勤工作，一直在后勤工作。那样的身份不可能和“军事苦行僧”林彪有关系。

直到解放战争，邱会作去东北野战军，由文职转入五行，成为黄永胜的搭档，任东北野战军八纵政委，才有了和林彪见面的机会。邱会作参加了东北战场上的历次重大战役，在战场上的表现堪称出色。特别是阻击廖耀湘兵团时，邱会作呆在指挥所前线的一条大雨冲刷出来的沟里，炮弹倾泻而来，身边不时有人伤亡，邱会作冒着炮火，坚持在第一线指挥战斗。表现堪称英勇。

黄永胜和邱会作一直是搭档，第八纵队是搭档，后来四十五军也是搭档，再后来十五兵团还是搭档。与黄永胜不同的是，邱会作与林彪的历史渊源要浅得多。直到辽沈战役开打之后，邱会作才在四野指挥部首次见到林彪，第一次谈话，话不多，而且都是工作范畴之内。

甚至可以说，整个战争年代和林彪都没啥关系。

但是邱会作是那种为人机敏，善于随机应变、眼灵脑快的人，早期的放牛娃出身，参加革命却可以混到首长眼中的“红小鬼”。多年从事军队的后勤工作，练就了精于盘算的本领。对于时局和人事的揣摩已经有很深的造诣。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需要在各个部门安插人手。他手下能打仗的人很多，精于搞后勤的却没多少。于是就让关系不是很深的邱会作担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虽然和林彪关系不是很深，但是

红军时代和其他大领导的关系都不错。所以让邱会作上，符合各方面的心声。同时林彪那一招，就如同推荐吴法宪和李作鹏一样，也算笼络邱会作。

邱会作也是精明之人，自然知道谁提拔了他，对林彪也有感激之情。

真正使得邱会作铁心追随林彪的，正是文化大革命。

邱会作和黄永胜的性格不太一样，他们属于互补，至少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好色。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对那一套还不能容忍。文革之风刮起之后，邱会作自然就惨了。

当时邱会作被造反派抓住，享受经典的疲劳战、车轮战，直接把他在总后的礼堂里批斗到昏厥过去。当时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

但是林彪依然没能保住邱会作。三个月之后，邱会作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被迫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迎接更为残忍的批斗。过程：罚跪、坐喷气式都是基本的，肋骨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

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几次电话向叶群求救。叶群也觉得邱会作挨批是应该的：“邱会作小姘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他，叫我们怎么说！”主要情况还是，邱会作当时还不是林彪的心腹。比他更好色的黄永胜也没有怎么样嘛。

最后邱会作实在没办法了，给林彪写呼救信：“向林总求救！今后仍同过去一样，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林副主席走！”据说信写好之后夹在裤子里，最后找到机会送出去的。林彪接信后，立刻与陈伯达共同签署一道手令：“立即将邱会作放出来，不得自由拘留。”

几天之后，叶群拿着林彪的手令到总后大院，将邱会作救出。

后来邱会作在日记中写道：“1967年1月25日零点40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妻子儿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我听到‘林副主席办公室派人叫我去’，我就知道得救了。抑制不住的感动从内心里像炸弹一样爆发出来。”又写道：“为我事林总亲自挺身而出，并派夫人来接，以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写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动，不能不流下温暖的热泪。”

从此之后邱会作将全部政治赌注押到林彪身上。

邱会作那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事后林彪和江青大吵一架。其他几个老师更为愤怒，直接去大闹怀仁堂了。正因如此，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给林彪写了那封“准备牺牲”的信，希望林彪出面和中央文革斗（详情参照文化大革命篇）。

由此可以看出。四大金刚之中，黄永胜虽然能征惯战，实在是因为自身的政治选择投靠林彪；吴法宪和李作鹏是出于对林彪的知遇之恩；邱会作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感激林彪伸出的温暖的手

掌。四个人相当于林彪的四肢，分别延伸到陆海空三军的内部。

四个人把林彪侍候得妥妥的。

有黄永胜坐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相当于掌控军队的神经中枢。

海军当时不是很强大，空军是最为机动性的力量，林彪的后花园。吴法宪是那花园里的园丁，负责除草啥的。吴法宪除掉的最典型的一株草，叫刘震。

刘震，生于一九一五年，湖北人，十六岁参加革命，起于红二十五军。就是说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在张国焘、徐向前的带领下参加长征的。但是到陕北之后，刘震被编入一一五师，在林彪的手下干活。刘震很能打仗，平型关大捷之后就当团长了，整个抗战中表现都不错。

解放战争开始，刘震被任命为中共吉江省委书记，并兼吉江军区司令员。然后和吴法宪一起组建第二纵队，两人开始了长时间的搭档生涯。刘震主管军事，吴法宪主管政治，配合还算可以。刘震是一员猛将，打仗很有一套，经历共军各个阶段的考验，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吴法宪虽然是政委，也能打仗。两人英雄相惜，合作愉快。

两个人见证了共军在东北的初期低谷和后期的全部荣耀。两人搭档从第二纵队一直搭档到三十九军，合作都很愉快。三十九军在锦州之战中战功赫赫。随后东野入关，三十九军也是一马当先。即使在歼灭白崇禧主力的衡宝战役中，三十九军依然表现出色。

朝鲜战争开打，三十九军成为志愿军的核心队伍，但是那个时候刘震和吴法宪都不在那里，他们都在空军。

空军组建之时，刘震和吴法宪一起去了共军。刘震是担任副司令。朝鲜战争爆发，刘震还是加入了志愿军，职位是志愿军空军司令。战争开始之前，空军非常柔弱。战争结束，空军已经具备了雏形，也就是说抗美援朝加速了空军的成长。

一九五五年，刘震，上将。

第一次庐山会议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黄永胜因为抓住了机会成为林彪的心腹，成了后来的总参谋长。刘震恰好相反，因为不理解政治形势，替当时的总参谋长黄克诚说了几句话，走了背运，成了彭德怀、黄克诚死党，“贯彻彭黄打烂仗的思想”。

随着刘震的倒霉，吴法宪和刘震的搭档关系也走到头了。吴法宪恰到好处地和刘震撇清关系。文革开始，刘震成了“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人物。

后经国防部长林彪批准，吴法宪令刘震停职反省。接下来，吴法宪把持的空军党委会对刘震“罢官夺权”设立专案组。此后批斗成了刘震的家常便饭，刘震常常在批斗会上被打得鼻青眼肿。

某次批斗会上，肋骨被打断两根，并造成终身残疾。由此可见当时文革风暴的残酷性。

通过打倒刘震，吴法宪在空军的地位巩固加强，所有反对者都沉默了。空军成了吴法宪的一言堂，吴法宪成了林彪的走卒。正因如此，林立果才能在空军内为所欲为，最后走向一条以他的能力绝对不该走的路。

不过要说整人之狠，四大金刚中，邱会作当属第一。原因很简单，邱会作成为林彪的心腹最晚，而且被人整的最惨。既然成了林彪的心腹，那就应该通过不停的整人表示自己的忠心，同时也为自己报仇雪恨。一箭双雕，何乐不为呢？

邱会作为了表达对林彪的忠诚和感激之情，无所不用其极。比方说在他得救一周年纪念日，邱会作亲自选定了一个象牙底座的台屏晋献给林彪，并给叶群写信：海枯石烂不变心！

邱会作说到做到，利用总后的便利，对林彪一家的衣、食、住、行全力保证。给林彪、叶群提供特制睡衣、高级毛衣和保温拖鞋这些生活用品还不过瘾，还敢动用外汇为叶群进口两辆高级轿车。那年头可不像现在，外汇很紧张的。

如果说给林彪一家衣食住行算是分内事，因为他们一家本就是特供的。如果说给叶群买进口轿车也算特供的范畴，那么好吧，看看另外一件事。当年林立果长大成人，要找对象。其实以林立果的条件找对象轻而易举，想找哪个阶层都行。当时的林家正处于社会最顶层，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写进党章。如果林彪接班成功，成为新任领袖，那林立果就是领袖唯一的儿子，是“太子”。那个本来是好事。

但是叶群那个傻女人把好事变成了坏事，满世界替林立果“找老婆”，那阵势和帝国时代给太子选妃差不多。何况林彪还没有接班，就是接班成功，那么搞也太招摇了吧。即使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结婚之后也是非常低调的。毛泽东仅仅借开会的机会摆两桌饭，告诉大家儿子结婚了，两桌饭也是家常饭。林彪当时也不知道在干嘛，任叶群胡闹。从这事上也可以看出，林彪的政治头脑离第一流政治家的差距。

实际上林家满世界找媳妇并不是叶群亲自下去挑选，而是邱会作的老婆胡敏挂帅，跑了十几个省市挑选好姑娘。说真的，那绝对是得不偿失。别的不说，林家怎么能相信胡敏就能找到最好的姑娘？要知道看人也是一门学问。但从邱会作的角度看，能不能找到姑娘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找姑娘那事向林彪表示忠心才是重点。

当时的邱部长看起来更像林家的后勤部长。

如果仅仅给林家当后勤部长也就算了，毕竟林彪对他有再造之恩，就算拍马屁拍得有点肉麻也可以理解。邱会作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的暴行。四大金刚中，论打仗，邱会作比不上黄永胜；论搞政

治，吴法宪不在他之下；论教育，李作鹏最牛；论暴行，邱会作排第一。

或许是文革初期被折磨得太狠了，所以邱会作的心理有点不正常，得到机会之后变本加厉折磨别人。在邱会作看来：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对那些拒不交代的人就没办法吗？应当是有办法的。邱会作在总后规定了总的办案方针，三狠方针。听这名字就够唬人的。哪三狠呢？分别是：狠斗，狠审，狠专。

狠斗：坚决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

狠审：可以连续多天进行审讯。

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

在三狠方针下，总后进行了很多种审讯创造，仅摧残人身的刑法就达 50 多种。比方说车轮战：日夜连续审讯，不让休息。比方说打反骨：用棍棒打后颈骨。比方说吃元宵：集体拳打。还有坐高低凳、打嘴巴、烟斗烧踝骨、头顶大碗、烟头烫嘴、限制喝水、逼喝脏水、电击等等。其惨绝人性之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原总后军械部副部长梁冰因反对邱会作而遭到关押。在关押期间，梁部长遭受了二十多种刑罚。在车轮战中，最长的一次连续审讯达十七昼夜（超出人类极限）。残酷折磨下，致使梁冰身体致残，半身不遂。

邱会作亲自在总后专案会上指示：“心要狠，对敌人要残酷，斗争手段是专政的手段；对敌人要连续审讯，几天几夜地干；必要时手铐脚镣都戴上”邱会作指示：“我看四斗、五斗、六斗都可以，要死的，不斗他也死；不死的，斗他也不死，十六条并没规定要赔命嘛！”

在邱会作的操控下，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直接制造十七个反革命集团（仅仅总后哦），迫害干部群众四百多人。其中八人被迫害致死，如汤平。日后在法庭上，邱会作亲自向汤平夫人下跪认错。很多人落下残疾，如梁冰。

邱会作迫害的人之中，最特殊的一个是傅连璋。

傅连璋并不是特别重要，但绝对是相当特殊，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人。即使如此，邱会作也敢动手。不是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而是因为傅连璋涉及到一段很隐秘的事，就是关于林彪是否有吸毒的问题

傅连璋生于一八九四年，福建人，家庭条件不怎么样，很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到汀州城谋生，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因此有机会加入教会学校读书学手艺。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用科技摧毁了清帝国的尊严，然后教士们蜂拥而入，跑过来代表上帝向东

方传递福音。他们取得很大成功，因为清帝国被摧毁之后，政府组织被破坏，基本上政府不管百姓，百姓不管政府。但是人嘛，总需要精神寄托。当传统的华夏文化跌入低谷，大家都争相寻求新的精神依托。

基督教适时而来，从上到下都取得巨大的成功。教会确实给予贫困之人某种精神慰藉，所以吸引了很多下层人。与此同时，上层人士为了跟欧美套近乎，也改信基督教。比方说冯玉祥号称基督将军。比方说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实际上就是基督家族。因为宋家的影响，蒋介石也改信基督教。这样反过来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当然也有例外。比方说洪秀全，接触基督教之后，就来一个基督教中国化，搞出拜上帝教，自称基督为大哥，闹得天翻地覆，搞得老外哭笑不得。

傅连璋一家入基督教，就是以下层人的身份在基督世界寻找某种慰藉。傅连璋还能在教会读书识字，实在是不容易。一九一一年，读书识字结束，十五岁的傅连璋又借助基督教的关系学手艺，加入亚盛顿医馆，那是英国伦敦基督教会教徒亚盛顿捐款兴办的。一开始由英国医学博士赖察理任院长，设有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手术室等，药品和器械均由英国进口，是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综合性的医院。傅连璋在那里学了四年（相当于念大学了，呵呵），毕业之后开始当医生。

傅连璋本身是穷人出身，对底层贫穷感同身受，在教会里又接受基督思想。不管基督教会如何有缺点，但基督思想的核心是一种普世的爱，就是告诉大家，神爱世人，世人互爱。真正的基督徒应该非常有爱心，那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傅连璋自然不会成为一个庸俗市侩的人。而且他的职业又是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这样一些原因加在一起造就一个结果：傅连璋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也许他并不是热血沸腾的革命者，但对普通人看来比较宽泛的字眼“爱”和“正义”有坚定的信念

所以他看见外国鬼佬欺负中国就不爽，他看见权贵欺负百姓就不爽，他看见为富不仁者就不爽，看见世人冷漠也不爽，所以就造成那样一个局面：当第一次国共合作搞革命，当共产党轰轰烈烈的领导工人搞文斗，当文斗中出现外国鬼佬屠杀中国工人的“五卅惨案”之后，教会背景出身的傅连璋签名通电：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随着第一次大革命闹起来，福建那一带不再平静。外国医生相继回国，医院由傅连璋主持，摆脱了英国教会的束缚。傅连璋成为革命者，其实他不参加革命也可以好好生活，用他的职业谋生。真正的考验来自国共分裂。傅连璋当时虽然是一个积极革命者，但是并不属于任何一方。他跟着国民党走，也有一个不错的前途。经过一番思考选择之后，他还是偏向了共产党。因为那个时代，国民党右转，共产党还在左边。

国民党四处捕杀共产党。而傅连璋则暗地里救助红军战士。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傅连璋奇迹般保住了陈赓将军的腿。

原因无他，在傅连璋眼中，共产党红军那些人都不该死。不管是从普通大众的视角，还是从基

督教义的视角，还是从医生的视角，所以他要救他们。傅连璋利用自己的身份，救助了三百多人。从傅连璋那里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为啥国共第一次分裂，国民党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始终拿共产党没办法。共产党反而越来越强，逐渐壮大。不是共产党人多么厉害，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有一帮支持者。

一九二九年，红四军拿下汀州后，傅连璋开始和共产党合作，成为共产党最早一批高级技术人员。四年之后，医院迁往江西瑞金，创办中央红色医院。然后长征。直到一九三八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傅连璋才加入共产党。

傅连璋加入共产党后，就成了红色根据地的王牌，得过一个绰号，叫活扁鹊。

毛泽东是傅连璋的长期病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就是傅连璋亲自接生的。长征前夕，毛泽东在江西患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傅连璋骑着骡子从瑞金梅坑走了三百多里去给毛泽东治病，三天之内手到病除。毛泽东非常高兴，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那场抢救成功，保证了毛泽东的长征。想象一下，如果毛泽东像陈毅一样，因为伤病留在南方，历史会怎么样？

长征途中，周恩来病得不行了，傅连璋负责救治。过草地时，他又帮助朱德料理身体。三人组中的王稼祥负伤，也是傅连璋治疗。其他人更不用说了。傅连璋挽救了一大批高级干部。正因如此，他成为红色世界的权威。要是比人脉关系，很少有人能比得了他。因为他可以见到所有的高层领导，毛泽东对他一直信赖有加。尽管如此，他依然没能躲过那场政治风暴。不是因为毛泽东不信任他了，而是因为林彪的关系。

傅连璋和林彪之前有过关系。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受伤，傅连璋应该给他查看过，但是之后两人接触不多。因为林彪去了苏联，回来后又去了东北。那场厉害冲突来自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原本让粟裕出场，粟裕伤退。粟裕之后，毛泽东想到林彪。林彪的理由也是身体不好，而且列出一大堆病症。

毛泽东为了表示关注林彪身体，就叫傅连璋去检查林彪的身体。傅连璋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而且久经考验。检查过程还有一系列勾心斗角的细节，这里就不说了。据说检查出来的结果是，林彪吸食吗啡，也就是吸毒。

问题来了，林彪有没有吸毒的可能性？

这一切只能是推测。因为九一三之前，林彪的形象是光辉的，任何缺陷，哪怕是人之常情的缺点也会被隐藏起来。九一三之后的林彪是可鄙的。任何缺陷，哪怕是人之常情的缺点也会被无限放大到丑陋的地步。比方说在解放战争后期，因为配合问题和陈庚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摩擦，就有人借

题发挥，说林彪打仗不如陈庚，甚至还有人厚颜无耻地说林彪不会打仗。

根据现在的资料。第一阶段军事实践中的林彪，虽然行为有点怪异，但生活很正常，不存在吸毒可能性，但是第二段军事实践中的林彪就很难说了。林彪那个伤本来就很诡异，当时看并不严重，过一段时间还是不严重，可是总是无法痊愈。即使到苏联去疗养，依然没有痊愈。说那个是伤到了神经。因为伤到神经，又引起种种副作用，比方说怕这个怕那个。

战场压力又是巨大的，常常几个昼夜不睡觉。平型关战役开打之时，林彪就因为长时间超负荷运转支撑不住，需要戴健脑器了。当时的林彪才三十岁，身体处于顶峰。

林彪去东北之后，将近四十岁了，身体肯定在走下坡路。伤一直没好，精神肯定大不如前。而且在东北最初一段时间又不顺利，搞战略大撤退，压力之大可以想象。精神和身体都不如前的情况下，还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在某些时候，借助吗啡提神是可能的。

吗啡也许伤害身体，但是比起战败的伤害，微不足道。对一个统帅千军万马的人，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存亡之时，那种压力绝对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对于很多人而言，修说吗啡提神，就是砍下手臂都愿意。

如果事情真是那样，即林彪吸毒的话，对整个共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所以绝对不能扩散开来。毒品同样对林彪那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造成伤害，因为他神经本来就没有治愈，再加上毒品侵袭，肯定更为严重。而林彪后来那些病症，表现形式和吸毒者有几分类似。

这个证据从傅连璋后来的遭遇中得到佐证。

文革开始时，林彪的权威还在军队里。很遗憾，傅连璋也是军人，就在林彪打压范围之内。傅连璋的遭遇很凄惨，殴打、游斗、抄家。其中最为积极的就是邱会作。

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常委会上对大家说：“傅连璋是条毒蛇，这个人的党籍是长征时捡来的，卫生部不烧傅连璋就是没有党性。”

那话估计连邱会作本人都不相信。如果傅连璋是毒蛇，那么高层估计会被毒死一半。实际上一个也没有毒死。但是邱会作就是敢说，昧良心、带黑心去说。不仅去说，还要去做，用对付毒蛇的办法对付傅连璋。

傅连璋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垂垂老矣。即使是毒蛇，也不可能有啥毒性了。被斗得实在没办法了，傅连璋写信给老领导毛泽东，希望他能替自己说句话。几十年来，毛泽东对傅连璋感情是很深的。接到傅连璋的信，毛泽东特意写了一个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保护。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只见周恩来到处灭火救人，毛泽东很少写批示保某人。按道理说，以毛泽

东当时的地位还有啥办不到的么？有！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是一张大字报的事。举手投足间可以决定无数人的前途和命运。亲自写批示，那力量不下于之前的皇帝的圣旨。内容不过是挽救一个自己信得过的老医生而已，但结果偏偏就没有救得了傅连璋。

邱会作决定来一个欺骗：不让傅连璋本人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同时对一般干部群众保密，并继续组织对傅连璋的批斗。傅连璋的肋骨被打断，头也被打破。

他们那么做究竟是为了啥，就是为了把傅连璋整死，并且钉在耻辱柱上。在邱会作的主持下，成立了“傅连璋专案组”。文革中间，只要成立某人专案组，就表示那人前景堪忧。比方说刘少奇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没结案之前人就挂了。当然也有人熬过来了，比方说罗瑞卿，却也落下残疾。通常情况下，有资格享受专案组待遇的都是大人物。傅连璋只是个医生，手中没有实权，怎么会享受哪个？很诡异。

专案组成立之后，一系列的“罪行材料”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邱会作总结发言：以我看主要批他三点：一，三反言行；二，黑线关；三，斗志衰退。

接下来在康生、江青（注意这两个人）的插手下，傅连璋又有新的罪行：特务。

然后抄家、逮捕、投入秦城监狱。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号，傅连璋七十四岁。

在秦城监狱，他只有一个身份，六八四七囚犯。当时进入秦城监狱的高级干部都是数字代号。专案组让他交代罪行，他当然没啥交代，就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他们当然不敢去问，但是又想收集罪证，只能折磨他的身体。

所谓继续折磨，就是继续疲劳审问，继续打。傅连璋的肋骨一共被打断三根，没有医疗。虽然 he 自己是医生，对自己的伤也无能为力。他七十多岁了，胃不好。监狱只给他吃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即使是健康的人，那种伙食也能吃出胃病。何况原本就有胃病、七十多岁的衰弱身体、肋骨被打断几根的老人家。他要求喝点稀饭，监狱不给。

四天之后，眼看没有希望之火，傅连璋失望了，他觉得自己的老骨头可能要埋在这里了。开始吃不下饭，最后干脆绝食，拒绝吃药。三月二十八号，入狱两周之后，傅连璋痛苦地呻吟着、难以入睡，也没人管他。第二天一大早，打开牢门时，傅连璋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浑身冰冷，已经冤死去多时。然后是火化，仍然只有一个代号。

这事名义上都是邱会作干的，实际上邱会作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在毛泽东发话担保的情况下，邱会作没有理由一意孤行。即使邱会作想要去干，也不见得能拉动江青和康生。要知道那两位可是毛泽东铁杆中的铁杆。他们愿意暗地里去搞傅连璋只能说明一点，会得到很大利益。能给江青和康生利益的，放眼天下，除了毛泽东之外，也只有林彪了。因为林彪当时是军方代言人，又是法

定接班人。能操纵邱会作的，也只能是林彪。

傅连璋只是一个医生，一辈子行医医人，很少得罪人，更不太可能得罪林彪。两人地位悬殊，很少接触嘛。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唯一的解释就是，傅连璋掌握了林彪某些见不得光的东西。那见不得光的东西，就是吸食吗啡了。也就是说，从现在流传出来的资料分析，林彪有吸食毒品历史的可能性偏真。

七、许光达倒下

（一）许光达的故事

说道文革的遗患，无非是法制被践踏，人权没有得到尊重。具体表现，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很多人遭受不应有的残酷对待。这样的案例前面已经说了不少，但主要都是社会上的。这个案例涉及到军方，文革之风对军方的破坏。

文革风暴起来之后，野战军内部比较平静，基本上是个避风港。但是在其它地方就不一样了。结合许光达将军的遭遇讲述一下。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生于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国将帅之中最年轻的一位。

许光达，湖南人。十大将军中有六位是湖南人，分别是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如果再加上湖北的徐海东和王树声，八位来自两湖。只有四川的罗瑞卿和海南的张云逸是例外。当然，那是有传统的。

在共军的高级将帅之中，许光达算是典型的沉默一族：信仰坚定，目标明确，默默干活，百折不回。而且在战争结束之后成功转型，成为中国装甲车的领军人物，在军史上留下重重一笔。正因如此，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才让人更为叹息。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许光达出身贫寒，七岁本来应该去读书了，他却要给人家放牛，补贴家用。沦为放牛娃的许光达非常羡慕那些能念书的孩子，时不时跑到学堂窗外偷听老师讲课。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许光达在偷听过程中晕倒了。老师了解他的情况之后，做一个感人的决定：“莫难过，你要读书，就来喽，我不收你钱！”这样年幼的许光达有了学习的机会。那位老师就是许光达人生之中的第一盏明灯——邹希鲁先生。

邹希鲁是清末举人，但并不保守，干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教过很多大牌学生，其中最大牌的那个就是毛泽东。正是他的无心插柳，改变了许光达的人生轨迹。许光达在邹希鲁那里免费读书到十三岁。许光达也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勤学好问，品学兼优，各方面都出类拔萃。邹希鲁很欣慰，他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自古寒门出奇才。他把许光达看是寒门奇才。

许光达十三岁那年考上长沙师范，那所学校是毛泽东的老师、近代教育家徐特立创办的。邹希鲁和徐特立是同窗好友，后来也在那里任教。许光达依然非常出色。邹希鲁非常高兴，决定把女儿邹靖华嫁给穷小子许光达。当时许光达十四岁，邹靖华只有九岁，算是定下娃娃亲。娃娃亲之后，邹靖华跟着老爹去长沙女子职业学校。许光达在长沙师范毕业之后去了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和邹靖华结婚。两人几经磨难离别，风风雨雨一辈子，不离不弃，成就一段佳话。用现在的话说，算是

先结婚后恋爱的典型。

许光达和邹靖华结婚时是个秘密共产党员、国民党政府的通缉犯，邹靖华依然毫不犹豫地嫁给他。结婚十天之后，许光达因为战争需要和妻子分别。分别两年之后，许光达逐渐成长为贺龙身边的干将。贺龙见许光达总是光棍一人，好意对许光达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湖南妹子吧，不能总是光棍一条呀！”

许光达没有同意，邹靖华这边也在苦等许光达。一九三零年，李立三冒险路线，让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彭德怀找到一个机会攻入长沙。邹靖华冒着风险去找丈夫。结果当然没有找到，失望而归，许光达正跟着贺龙干。

与此同时贺龙也带着红二军团去攻打大城市，一九三零年底攻克天津市，与对手展开巷战。当时许光达担任红二军团十七师师长。突然，他发现一间民房旁站着个姑娘，在硝烟中东张西望，匆忙中吩咐参谋过去叫她赶快进屋躲避炮火。许光达没有想到，这姑娘就是邹靖华。邹靖华趁机向参谋打听许德华。参谋自然不知道许德华就是现在的师长许光达。一对乱世鸳鸯就这般失之交臂。那是他们十年分别中距离最近的一次。——如果拍电影，将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镜头。中国的电影人啊，打着艺术创作的头衔，创作出来的东东还不如历史上发生的精彩，谁的悲哀？

国军知道许光达跟了共产党之后，隔三差五到许家要人。他们找不到许光达，就去折磨邹靖华。他们把她抓起来，在她脖子上挂“共匪婆”的牌子游街示众。邹靖华的表现堪比杨开慧，坚贞不屈。长沙警备司令部的人拿着一份事先写好的与许光达的“离婚声明”，让邹靖华签字，声称她签了字就可以获得自由。邹靖华的表现堪比杨开慧，坚贞不屈，把那张纸撕得粉碎。好在邹靖华比杨开慧幸运。因为许光达不如毛泽东那般耀眼，所以她活下来了。

此后若干年，他们偶尔有音信往来。所谓音信，就是许光达用别人的名字往家里写一些含糊其辞的信。邹靖华认识许光达的笔迹，在那云里雾里的言语中猜测许光达的处境。随后许光达受伤去了苏联，音信中断。抗日战争开打，许光达回国。一九三八年，许光达回到延安，在抗大担任教育长。当时许光达只有三十岁，身材高大，一肚子洋墨水，行为举止都与众不同。所以他的婚事就成了女学生议论的焦点。后来林彪从苏联回来都没有那般受欢迎，可能是许光达更帅气吧。抗大的女学生不多，择偶标准很高。但是许光达的条件超出了他们的期望。有人决定先下手为强，但许光达婉拒了所有人的好意，告诉他们自己有老婆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音信中断了很多年，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永不相见的概率非常大。就有同志开导许光达：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而且生死不定，再娶也说得过去。看看彭老总，苦等那么多年，等来的消息是老婆已经嫁人了。

许光达回答非常感人：“不，我要等。万一她没有死，我另娶她人，岂不伤透了她的心？这些

年来，战争的烽火紧紧地追赶着我们，她为我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盼望与我团圆，我怎能辜负她！假使她真的死了，我也要见到她的坟，哭一阵，添上一抔土。”共军高层将帅对待感情方面，许光达和彭德怀非常类似。

追求者们也纳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知道高大帅气的教育长如此苦等。他们很快有了答案。

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很多积极分子从全国各地到延安抗大学习，邹靖华和妹妹拿着徐特立开的介绍信去了延安，全然没想到朝思暮想的丈夫在那里等她。姐妹两人刚到延安旅社，刚想痛痛快快地睡一觉，就有一个小战士跑过来大声问：“哪位是邹靖华？”

邹靖华很纳闷，自己没啥名气啊，延安应该不会有人认识自己，不解地问：“是谁找我？”“我们教育长。”“你们教育长是谁？”“许光达！”

话刚落音，邹靖华还没有来得及喜悦，许光达出现了。

结婚十天，一别十年的丈夫出现了。

一切仿佛在梦中。管他呢，即使是梦又怎样？她扑进丈夫宽大的怀里，痛哭一场。

十年的苦等，相见的喜悦，化为一场眼泪。不是梦，是现实。从此之后，重新开始。天地有情，有情人终成眷属。

大家都是干革命的人，讲过太多的悲欢离合。之前彭德怀苦守十年的感情是一枚苦果，许光达的苦守则成了佳话。为此毛泽东特意把许光达夫妻请过去吃顿饭道喜。

但也有人不服气，特别是许光达的粉丝们。因为在她们眼中，经过生活磨难的邹靖华早已芳华不再，就是一个平凡的妇女，完全配不上帅气威武的教育长。那也是事实。但是人和人之间的爱情，不仅仅是外在匹配，还有一种东西叫生死与共。

能理解那一层关系的人不多，必须有足够的人生阅历，经历生死，方能看破。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古往今来能实践者有多少？许光达就做到了。

当一切表象散去、繁华落尽，惟愿与君共生死。古人说，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我说，今生今世，有君一人，足矣。

此后数十年，夫妻二人相敬如宾，为夫妻之典范。哪怕是风吹雨打，终究生死相随。

长沙师范的许光达变成一个热血青年，读过很多书，对共产主义感兴趣。不仅如此，还参加了学生运动。其中一个领导就是长沙师范学长毛泽东。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随后转入共产党。当时许光达只有十七岁。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九二五年入党还算老资格，比很多元帅资格都老。一

九二六年，十八岁的许光达被组织选送到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炮兵。并且在一九二六年底前往武汉黄埔分校。

黄埔精英基本上都出自前四期，不是因为后来者不行，而是先前那些人抢占了先机。前四期有机会参与蒋介石崛起时的一系列战争。第五期的许光达就处在比较尴尬的位置上。而且他又是共产党，毕业时正好面临国共分裂。当时许光达有国共双重党员身份。可以跟国民党，也可以跟共产党。按照当时的形势看，跟着国民党走更有利一点。他选择跟共产党走。

当时的一幕非常有趣，廖昂拿一张表格，让许光达表明政治身份。许光达填写共产党。廖昂对许光达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真是不识实务！”接下来又劝导说，“国民党是孙总理三民主义的继承者，统一天下非她莫属，我们年轻人要想实现宏大的理想，就必须加入国民党才行。”

许光达不理他。廖昂讨了个没趣说：“哼！死顽固，走着瞧！试看今日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许光达大笑回敬：“廖昂，我许某奉陪到底！”二十年后西北战场相遇，已经成为国民党中将师长的廖昂成为老同学、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的俘虏。

许光达毕业后在第二十五师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

南昌起义开打之后，许光达带着六个年轻军官，偷偷溜出武汉，前往参加那场革命，把张发奎气得直跺脚。其实他们也就是运气好才赶上南昌起义，也有运气不好的，比方说罗瑞卿，同样是从武汉溜出来的，结果就没有赶上起义队伍，差一点命丧黄泉。

许光达虽然赶上了南昌起义，遭受的磨难一点不比罗瑞卿少。许光达随南昌暴动和起义军南下潮汕一带。起义并不顺利，一路南下之际，减员严重，很多人离队了。关键时刻朱德挺身而出拯救了队伍。但是三河坝激战中，许光达身负重伤，安排在农家修养。

但是许光达干革命心切，伤未痊愈，就急着去寻找部队、寻找党组织。一路辗转终于在安徽寿县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担任了学兵团的教育副官，想要策划组织武装暴动。很不幸，被国军察觉了行踪。幸好他们足够机警，虎口逃生。随后他们又奉命打入西北军，去冯玉祥部队开展工作。前往西北途中，许光达请假回家看看。也正是那次回家，和邹靖华结婚。但是很不幸，他的行踪又被发现了，匆匆逃亡，又和组织失去联系。

逃亡过程中，许光达改了姓名，去投奔河北省清河县当县长的岳父邹希鲁。邹希鲁当时还不知道许光达加入共产党，就让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女婿在自己的县里当警察局长。许光达一看，这情况也不错啊。好吧，就一边当警察局长，一边联系组织吧，顺便再发展一批武装力量，一举多得，呵呵。

然而国军那边也不是吃素的。长沙警备司令部顺藤摸瓜，查到许光达的下落，许光达只好再次潜逃。可怜的清末举人邹希鲁遂，好不容易熬到县长的职位，却因为高徒兼宝贝女婿给搅和了，被革职回乡。

逃亡中的许光达找不到组织，四处漂泊、无依无靠。他想去北京找组织，一无所获。最后生活没着落，只好到煤矿上当矿工糊口。挖了一阵子煤，然后又辗转漂泊到上海，终于找到了组织。

组织推荐他去一个军事训练班学习，那个军事训练班是周恩来主办的，目的就是培养干部的。许光达结业之后去了湘鄂西，在那里见到了贺龙。从此以后，许光达成了第二方面军一员战将，跟着贺龙南征北战。日后评军衔。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元帅代表，许光达是红二方面军的大将代表（同时代表第一野战军）。正因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许光达不可避免地遭殃。因为贺龙和彭德怀都遭殃了。

许光达的军事生涯和林彪有点类似，前后两段，中间受伤。但是林彪受伤是倒霉，错过了整个抗战；许光达的受伤很有点幸运。

许光达跟着贺龙打过不少仗，也算是经验丰富。一九三一年，李立三冒险主义搞起来，红军主动出击，打城市攻坚战。许光达身受重伤，国内医疗水平有限，子弹在体内一直没法取出来。最后没办法，去苏联疗养。

苏联一行改变了许光达的人生轨迹。

第一，他恰到好处地避开杀人狂魔夏曦。夏曦把洪湖根据地的红军来回杀了好几遍，红军骨干基本上被杀得差不多了。当时比许光达更有前途的段德昌将军都被夏曦杀掉了。按照夏曦当时的杀人状态，许光达要是留在那里，很可能凶多吉少。

第二，许光达在苏联不仅是养病。因为许光达是个爱学习的人。小时候放牛娃都知道跑到人家的教室外面偷听。好不容易来到苏联，那还不多学点啊。伤愈之后，许光达先后入读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看这两所学校的名字就知道，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其中的高材生更可能成为政治家。然而许光达不同，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对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兴趣。啥呢？坦克技术。

共军高层将帅里面，刘伯承也在苏联念过军校，而且是纯军事的伏龙之学院。日后刘伯承为共军现代化做了很大贡献。但是刘伯承在苏联的学习时间比较短，而且三零年就回国了。许光达不同，一直在苏联呆到一九三七年。那年头欧洲各国都在备战，都在搞装甲师。热兵器时代的坦克车在战场上的作用巨大。许光达出于军人的敏感，对装甲车产生浓厚兴趣。回国之后也不能忘怀，时不时写点论证装甲车的文章。

那个时代的共军还是土八路，别说装甲车，自行车也找不到几辆。许光达那些文章，看起来更像“学术论文”，空中楼阁，可望不可即。但许光达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知道，终究一天会用到。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装甲车是钢铁洪流的代称。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欧洲上空阴云密布。大家都明白战争爆发是迟早的事，许光达在延安的报刊上写一篇文章，叫《闪电战的历史命运》，准确地预测了战争走势：即战争开始德国抢占先机，最后的胜利者会是苏联。那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并不是许光达独创，而是来自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回国之后的许光达再次跟了老领导贺龙，任独立旅旅长，跟着贺龙领导的一二零师战斗。还是默默地干着大家都在干的事，反扫荡啊、开辟根据地啊、扩大队伍啊，没有特别出彩（如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许光达志向在坦克啊，在正规战啊，在装甲师啊，怎么能安心打游击战呢？当然，许光达就是游击战出身的。但是一个心想装甲车的人，却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用游击战和对手周旋，至少证明一点，许光达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不需要出风头，只需要做事。

不喜欢出风头的许光达最后还是要出风头，在解放战争中。

国军全面进攻之后搞重点进攻，其中一个攻击点就是延安。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胡宗南向延安突进的过程中，西北野战军成立。许光达的第三纵队编入西北野战军，许光达的领导从贺龙变成彭德怀。

中央离开延安之后，处境并不乐观。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带的中央机关被挤在三县交界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军压来。而当时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部队只有一百多人，处境危险。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派一个得力的将领过来帮忙。彭德怀告诉周恩来，已经让许光达去了。

许光达带人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把指挥所设在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的地方，对大家说：“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他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正在转移，那正是中央机关。

从八月十八号开始上午到十九号早晨，许光达带着第三纵队（相当于一个军）硬顶了一天一夜。对手则是一个军和三个旅。当时共军还没有展开战略反攻，基本上还是和抗日战争差不多，游击战、运动战为主，很少正面出击。即使正面出击也是集中局部优势兵力啃下国军一块肉。不到万不得已，共军不会以少数兵力和国军死扛。共军高层统帅中，也只有彭德怀敢如此刚猛。正面硬碰硬，说明情形必然相当严重。西北边战场上，延安都放弃了，还有啥更重要的，明显是中央嘛。所以说国军的反应太慢了。

胡宗南进入延安之后，基本上就寻不到共军主力。许光达带的第三纵队，就是西北野战军精锐，出现了，国军又吃不下。许光达聚集玩乌龙铺南方的国军，又指挥人们狙击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国军。那是刘戡的二十九军主力。

刘戡，湖南人，生于一九零六年，黄埔一期毕业生，徐向前的同学。刘戡毕业后一直跟着卫立煌，打仗一根筋，围剿红军过程中，眼睛被打瞎一只。抗日战争时代，刘戡担任第十七军八十三师长，全师为德军装备，战斗力颇强，参与过忻口保卫战。解放战争期间，刘戡跟着胡宗南在西边作战。决定国军命运的宜川战役，刘戡因为胡宗南的失误而战死。

此时决战还没有开始，刘戡带领精锐的二十九军向许光达压过来。许光达毫无退路，只得背水一战。战争的结果是刘戡无法前进一步。许光达反冲锋中，甚至一度冲到刘戡军部，俘虏了一部分警卫连士兵。许光达是西北野战军主力，刘戡是西北国军主力。决战尚未开始，国共双方的军队素质高下立判。

许光达那一仗仗打得非常漂亮，不仅保卫中央脱险，而且试探出国军主力水平。许光达在西北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是清涧大捷，歼灭胡宗南的王牌七十六师。该师师长正是许光达老同学廖昂。当初国共分裂，廖昂跟着国民党走，嘲笑跟着共产党走的许光达没眼光。其实廖昂在国军中混得也不错，中将师长，又是王牌师，号称常胜将军。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两位选择不同的老同学终于在战场相见了。

廖昂是骄傲的，带着他的王牌部队坚守清涧。清涧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廖昂认为他足以阻挡许光达。两军相逢，谁也不会客气。激战经过三天三夜之后，许光达扫清了清涧镇外围。但此时胡宗南援军也要到了。许光达亲自给廖昂写信，让那位骄傲的老同学放下武器投降。如果是别人，廖昂或许是投降了。偏偏是许光达，投降的话，老脸往哪搁？不投降。许光达指挥人马通过爆破手段炸开东门，干净利落地全歼守军。只有廖昂同志，不投降的结果只能当战俘了。

决定命运的宜川之战，负责围攻宜川城的就是许光达。因为宜川是关中屏障，打下它，就能摧毁胡宗南在西北的大本营，西安。既然是战略要地，就少不得增援。共军的拿手好戏就是围点打援。林彪在东北硬是把国军围点打援打到不敢动，许光达也精于那一招。许光达一开始猛打宜川城，逼得守军向胡宗南求援。援军出动，被打，刘戡战死。许光达发起总攻，拿下宜川。胡宗南再也呆不住了。宜川大捷，是共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标志性一战。许光达是此战的主要指挥官之一。日后西北野战军横扫西北的过程中，许光达带着精锐的第三纵队一路推进到兰州，纵横千里。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许光达为第三军长，三个月后，升级为第二兵团司令员。

解放后终于回归本质工作，担任装甲兵司令。一九五五年评为大将，为红二方面军和第一野战军在大将中的代表。

开国将帅之中，许光达并不以战功显著（能打仗的太多了）。以至于后来有声音认为许光达不应该获大将军衔。上将之中有人比许光达资格更老，比方说肖克；有人比许光达更富有传奇色彩，比方说许世友。我想说，当初评定军衔的那些人比后来局外人更清楚许光达的贡献和价值。

还有一种声音说，许光达之所以能评上大将，是因为他是装甲兵司令。因为当时中国的装甲兵一穷二白，需要苏联接济。在和苏联方面接洽的过程中，需要军衔平级对等。这个观点可以参照刘亚楼。刘亚楼也在苏联学习过。建国之后就是空军司令。空军也需要和苏联接洽。如果按照那个原则，也应该评大将。事实上刘亚楼只是上将。

当时评军衔非常有意思。仿照苏联编制，毛泽东应该对应斯大林，称为大元帅。天津一家总后军工厂给他的大元帅制服都搞好了，毛泽东不穿。他的理由：不舒服。

其实毛泽东是不是大元帅无所谓。因为他是毛泽东，有没有那身制服，他还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不评元帅，无疑省事很多。因为如果按照那个模式搞的话，要评元帅的还有好几个。比方说周恩来，肯定要占一个元帅名额。邓小平，资历和级别各方面都不比罗荣桓差，估计也要评一个元帅。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那些人，都是大将级别。另外还有刘少奇，如果评军衔，也不可能低了。

按照那个搞法，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二十个名额还真不好平衡。这方面也能看到毛泽东的平衡艺术。他自己不评，还问问周边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你们的军衔还要不要？几个人都很识相，摆手表示不要了。

军衔的事现在说得比较多的是粟裕。按照战功排列，粟裕可以当元帅。因为种种原因，粟裕只是大将（参照第二篇）。据说评军衔时，许世友找到周恩来说要当大将。周恩来告诉他说，粟裕也只是大将。许世友就不说话了。

许光达听说自己评上大将之后，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辞掉大将头衔，内容如下。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我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勋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时期：蒋匪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斗，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喝牛奶，吃面包。自苏联返国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呢？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的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

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拿着这份申请书，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激动地对朱德、彭德怀等人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毛主席、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而是依据他的贡献，仍然授予了他大将军衔。

十年之后，一九六五年，军衔制取消了一段时间，一律实行行政分级。元帅行政三级，大将行政四级。身为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再次向中央提出降级，把自己降为行政五级。这次中央同意了。这样许光达成了大将之中唯一为行政五级的人，也就说领上将工资。顺便说一下，张云逸将军因为自身的特殊条件，成为为唯一行政三级的大将，领元帅工资。这些都是趣闻。

真正的问题是，为何要取消军衔？这个问题一直很重要，其实也很简单。

说重要，军队在和平时代，平白无故地把军衔全部取消了，毫无理由啊。但是看看当时的时间就明白了。一九六五年，文革爆发前夜。当时身为十大元帅第二位的彭德怀正蒙受不白之冤。说不清，道不明，看不到结果那种。大将黄克诚也一样。大将罗瑞卿也倒下了。贺龙元帅即将倒下。还有许光达大将即将倒下。还有许多人即将挨批斗，靠边站，如二月逆流中的那些人。如果他们就是这样那样罪名下的混蛋，那么共军颜面是不是……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文革注定要冲击很多人。而文革的基础是军队，军队必须控制局势。所以必须把需要冲击的那些人和军队分开，一律转入行政级别，淡化他们和军队的关系。军衔制取消之后，军队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年代，谁死了，谁伤了，谁成为敌人了，都不稀奇。

正是在那种情况下，许光达遭殃了。

顺便说一下，邓小平上台后的一九八零年，再一次考虑搞军衔制。经过八年的准备之后，到一九八八年，军衔制再次推广。那已经是二十三年之后的事了。邓小平告诉大家：和平时期的军衔等级要设得简单一点，最高设到上将。就现在这样子。

（二）巅峰

尽管许光达的军事生涯足够辉煌，取得很多荣耀，担任很多职位，但是他的人生是在建国之后才达到顶点。也就是说，建国之后的许光达事业依然处于上升期。从这方面来讲，只有领导军工建

设的聂荣臻元帅有类似经历。

军人的人生顶点都在战场上，这是历史常识，和平不是军人的年代。许光达能够继续上升的事业，主要原因就是装甲兵司令的角色。

在中国军事史上，从来都是陆军为主。主要是骑兵、步兵，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花样繁多的阵型和战术。这些都是冷兵器的作战方式。进入热兵器之后，一切都需要改变。共军能够在残酷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且夺取天下，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不可复制的机缘。

夺取天下之后，要想保证成功，甚至取得优势，就要建设。不仅要建设国家，还要建设军队。军队其实一直都在搞。比方说刘伯承的理论教育，彭德怀从朝鲜回来之后主持军衔正规化，都是军队建设的尝试。为此各方面还搞出不少矛盾，比方说军队反教条，彭德怀和刘伯承就搞出不少矛盾。但是一切始终绕不过一个坎，那就是坦克。

二次世界大战，装甲部队已经成为尖刀。很多时候，坦克车就是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德国能够横扫欧洲，基础就是无与伦比的装甲部队，后来失败，除了西伯利亚寒流，还有苏联工业机器生产出来的钢铁洪流。隆美尔在非洲战场所向无敌，靠的就是那些坦克车，后来失败，就是坦克车的后勤保障跟不上了。日本人本来有北进计划，想要和德国东西夹击苏联。但是在诺门坎被朱可夫指挥的装甲部队打疼了，才选择南下。

国军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法抵挡日军的坦克车。国军后来自己也组建坦克车，但是一直都不怎么样。直到抗日战争后期，缅甸远征军在印度集训之后才像样子。具体就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在反攻中，就可以和日本陆军匹敌了。

国共内战，国军所谓的王牌部队，只是几支装甲部队。国军开战之初在东北的胜利，就是仰仗缅甸下来的那几个军。张灵甫覆灭，除了共军强悍和粟裕出神入化的指挥能力，最关键的是张灵甫把装甲部队开到了山区，失去了钢铁洪流的优势，成了没有爪牙的老虎。新一军和新六军的覆灭，也是断了后勤和指挥官（廖耀湘司令部被韩先楚一阵风吹走了）。淮海战场新五军，也是在内外绝境之下从自我崩溃开始的。即使是英勇异常的志愿军，胜利依托于山地作战，可以从容分割打狙击（前三次），或者依托航道（上甘岭）死扛。真在平原上大规模集团军作战，最后还是拼钢铁洪流。钢铁洪流的基础就是坦克车。

共产党夺得天下之后就要为天下负责。天下不仅包括山地，还有大量的平原地带。山地虽然占据了大多数，但是平原才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千百年来，国家靠平原存活。

专家部队，必须有装甲部队。只有强大的装甲部队才能守护国家的命脉。

建国之初，许光达几乎是共军高层中唯一对坦克和装甲车认识较多的。人家本来就勤学好问嘛。可以说许光达在建国之后干的那些事，相当于古德里安在德军中干得那些事。所以许光达成为装甲兵司令，而且兼政委，完全集权于一人，在共军之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特别是和平年代，都是几个职位相互制约。由此可见国家搞装甲兵的决心。

成为装甲司令的许光达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同时也明白，挑起那重担意味着青史留名。所以在他接到任命的那一刻起就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生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

事情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当时中国有哪些家底呢？也有一些坦克车，都是在战场上从国军那里夺来的。有的能开，有的不能开。不能开的那些东东都是需要维修。共军没法维修，因为那些东西也不是国军生产的，都是买美国人的，收缴日本人的，售后服务没保障的。转手之后更没有保障了。怎么办？

可以把国军那些玩意拆掉装上，仅此而已，并不能保证已经损坏的坦克变好，也无法保障优质的坦克变坏。零件没有，生产零件的工厂没有，技术人员也没有。

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所有人都知道该怎么办：一，从头做起，没有工厂建设工厂，没有零件就生产零件，没有人才就培养人才。第二，找老大哥帮忙。

建国之后，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全面倒向苏联，依此换取苏联人的工业援助。虽然沙俄从中国割走了大片土地至今没还（也看不见还的希望），但是苏联帮助中国不少，其中有两次非常重要。第一次帮助孙中山建军，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才搞成了黄埔军校，在广东立足。蒋介石就是靠黄埔军校完成东征北伐，一举奠定在中国的地位。第二次就是建国之后帮助新中国搞工业。那时候赫鲁晓夫刚刚上台，需要中国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支持。中苏进入真正的蜜月期。

苏联各种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搞建设，装甲部队是其中的核心项目之一。但是专家也就是动动嘴，高兴的时候就画点图纸啥的。其他大事小事一大堆，懂行的人又少，都得许光达一个人干。要在各大军区把装甲兵的领导班子搞起来，还要搞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等等，还要选择基地，还要建立修理厂。

还要办学校培养各种人才。问题是缺乏老师，很多时候许光达得亲自动手。看看这些事，我们看起来都觉得很烦，许光达得样样去干。这种人从来不显山露水，从来不会作秀博眼球，不会说一些无聊的话，但是会干事，干实事，实实在在地干实事。这种人从来都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精魂。

其它地方可以搞政治，可以搞各种花样，但是在装甲车部队不需要那些。许光达告诉大家：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

正是在许光达的亲自操劳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苏交恶的那一年，一九五九年，苏联撤走专家那一年，中国第一辆自主生产的坦克，五九坦克，正式诞生。

许光达的人生到达巅峰。

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装甲部队已经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规模的装甲部队。这一切都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五九坦克诞生，对中国意义非凡。它意味着中国依靠外国钢铁装备的日子结束了。设想一下，如果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坦克车，日军还敢嚣张？苏德战场上，苏军在最初的惨败之后能缓过神，靠的啥，就是后方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钢铁洪流。

随后是三年大饥荒。当然，不论怎样的饥荒都饿不到许光达那个级别的人。在局外人看来，许光达的装甲部队相当于一个独立部门。许光达是装甲部队的王国，享有很多特权。确实，许光达有特权。但是有人拿特权为自己，有人不是。

大饥荒开始之后，很多人从四处到北京探亲，实际上就是吃饭。当时装甲兵大院住满工作人员的亲属，正常工作难以开展。装甲兵党委规定，凡是探亲来的，只能住三天。许光达的四哥和六弟从湖南老家到北京找当了大官的兄弟吃饭。许光达招待了他们，只有一盘盐水黄豆和一盘青菜，搞得两个兄弟很不理解。三天之后，两兄弟又回湖南。六弟在河南安阳时病倒了，再回到北京，就死了。死因，饿的。

许光达并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只是当时情况，除了一声叹息又能怎么样呢。

（三）漩涡

六弟的死让许光达非常伤心，但那只是他的个人问题，真正的问题还是当时的政治风暴。五九年庐山会议是一道分水岭。不少人跟着彭德怀遭殃了（如邓华、钟伟），又有不少人因为彭德怀遭殃爬上去了（如黄永胜）。许光达身为西北野战军，后来第一野战军的高级将领，处境非常微妙。

因为在政治斗争年代，打倒其他人，自己就可以飞黄腾达。打倒一个彭德怀，就很多人爬上去了。如果打到一个和彭德怀有关的有分量的人物，那自然也能得到机会。看看黄永胜同志，仅仅狠狠修理老同事邓华，就赢得林彪的信任。如果是许光达呢？

许光达的地位比邓华高，和彭德怀的联系比邓华密切。在那种情况下，许光达简直是一块肥肉，让人两眼放光。但是要打倒许光达并不容易，需要证据。怎么收集证据呢？自然要采取迂回之策。

在那样的情况下，丁铁石成了牺牲者。丁铁石，生于一九一五年，辽宁本溪人。家境原本非常殷实。九一八事变之后，他逃难到北京。抗战之前加入共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参与过开国大典。由于之前成分复杂，在建国后三反五反的过程中遭殃，行政降级，留党察看。但是后来

又变好了，因为他去了朝鲜。

丁铁石人生的最大价值是建立中国第一所坦克学校。

庐山会议开始，丁铁石在哈尔滨军工学校进修。当时军委装甲兵派人在哈军工搞了一个快速成材进修班。进修一班三十多名学员，数他年纪最大、级别最高，其他不少人都是他担任解放军第一个坦克团团长的老部下。丁铁石的每门功课都是优秀。

然而丁铁石莫名其妙地成了彭黄分子。根据：军工学院政委谢有法传达了庐山会议的文件之后，要各个班组讨论时，学院派了一名干事到进修一班做记录。他回去向学院领导反映说：“丁铁石说：彭老总有什么错？彭老总这一生至少也有三分功吧！”

大小批斗会不断。由于装甲部门都是干事情的，忙着坦克生产和训练，没多少时间和心情搞政治批斗，所以批斗会一直不温不火。而且丁铁石毕竟分量不够，把丁铁石打成彭黄分子和右派，也无法带来更多好处。他们的目标是装甲兵司令许光达。

进修班全体开会，由军事工程学院少将院长刘居英（北大肄业生，一二九运动时北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亲自主持。他要大家踊跃揭发批判丁铁石的“反党言行”。会场冷冷清清，没有人发言。刘居英少将再一次动员：“开批判会，应该人人发言，谁也不能坐球场上光吹哨儿的！”依然应者寥寥，而且所说也都是丁铁石的好：学习成绩优秀，带动全班通过了劳卫制，掏大粪都走在前，不靠老资格、高级别吃饭等等。

会议开不下去，但是目标一定要实现。

学院党委组织部长王坚为组长的学院“反右倾”斗争五人领导小组，专门找丁铁石谈话。他们漫无目的地东扯西拉了一阵之后，王坚突然问丁铁石：庐山会议前，（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与向仲华副政委、贺晋年和张文舟副司令员来我们学院，你和他们谈了些什么？

丁铁石明白许光达和彭德怀的关系，变得警惕起来。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从丁铁石口中弄点关于许光达的材料，把许光达和彭德怀联系起来。那样就立下“大功”了。

王坚见丁铁石好像顾虑重重，就在一旁吹风加油鼓劲：“说吧，说吧！你说了，你自己不但不会有什么事，说不定也会给你的肩章上添颗金豆儿，嘿嘿嘿。”意思很明显，如果丁铁石昧着良心诬陷许光达，就有可能加官进爵。

但是丁铁石是响当当的汉子，当初就是不满鬼子才从东北到北平的，才加入共产党的。如果连那点脊梁骨都没有，是小人的话，当初直接留在东北当汉奸了。那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也是对一个党员党性的侮辱，所以他反问：“你说，你到底要我说是啥？”

王坚的目的没达到，很恼火：“你顽固到底，绝没有好下场！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丁铁石也火了：“随你们的便！你们自己心怀鬼胎，还想拉上别人和你们一起为虎作伥？你们这种人，才绝对没有好下场！”好样的，丁铁石。（注：丁铁石文革被批斗，熬过文革，平反，九六年去世。评价，战争年代是战士，和平年献身装甲兵事业）

许光达之所以能安然度过残酷的庐山风波，原因有两个。日后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还是那两个原因。同样的故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因果。

第一个原因，许光达是搞技术的，参与政治运动的程度不深。建国之后的十年，基本上沉浸在装甲兵建设上。装甲部队是新兵种，没有太多人事关系纠纷，而且主要是把坦克车搞出来，主要搞技术。

而且许光达搞出了成绩，当苏联专家撤走时，中国搞出了五九坦克。五九年国庆阅兵，许光达亲自陪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当坦克车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紧握着许光达的手，向许光达表示热烈祝贺。当年那个时候，五一和十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的距离远近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高低。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有了坦克车意味着很多很多。

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想动装甲部队的创始人都不容易，都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第二个原因，贺龙。

许光达虽然跟着彭德怀一起纵横西北，但是他的根基还是在红二方面军。他是第一野战军在大将中的代表，同时也是红二方面军在大将中的代表。彭德怀虽然挨批了，贺龙还在。彭德怀下去了，贺龙可以保他。

庐山会议上，军方批判彭德怀的主要人物就是林彪和贺龙。原因前面都说过了，都是跟随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之后，林彪上升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为第二副主席。林彪身体不怎么样，具体事不怎么管，日常军委由贺龙主持。

贺龙是许光达的老领导，对他非常信任，自然不会找他麻烦。甚至可以说，许光达的装甲兵可以看成是原来红二方面军力量，是贺龙在军委的后盾。

许光达本人也在刻意避免麻烦。不管是庐山会议，还是庐山会议之后的各种运动。许光达都在避免参与。他把精力放在那个装甲兵王国里，一心筹划着自己的、也是新生共和国的全新兵种。

但是许光达本人身为中央委员，又是十大将军中最年轻的大将，又是装甲兵司令。位高权重不说，对政治方向是非常了解的。随着政治风暴越来越猛，在任何一个高级的、中级的、甚至低级别

的党政军干部都难以置身事外的情况下，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节奏。

有人选择去争，有人选择让。

比方说罗瑞卿将军，就选择去争。因为他已经处在那个位置，只能进不能退，所以选择去争，在争的过程中走到林彪的对立面。虽然他依然忠于毛泽东，当他走到林彪对立面时，两人相比，毛泽东还是选择林彪。

许光达将军是另外一种选择，让。

他不想参与。从庐山风波时就小心翼翼地避开。之后在各种运动中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开。等到文化大革命，取消军衔制时，他还是避开。所以行政划分时，他坚决把行政级别从第四级的大将级别坚决推辞到第五级的上将级别。

现在我们说许光达将军请辞大将军衔，请求行政降级，只是从人品上说许将军很棒。实际上许光达的人品确实无可挑剔，从对待患难与共的妻子，到和领导同志打交道，到干事业，都非常棒。堪称伟男子。

但是也该认识到，在他那个位置，那个级别，那个环境之下，重大决定不可能仅从人品出发。如果说许光达当初请辞大将，是人品和党性的优点，是一种谦让的话。那么后来请求行政降级，除了谦让之外，应该还有一层含义，避让。避让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他看到那种风暴的猛烈，想要后退一步，把心思用在装甲兵上。因为那个年代装甲兵往往决定着兵团决战的制胜因素。特别是北方的苏联，钢铁洪流从北方冲过来的话，其杀伤性和破坏性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草原骑兵南下都要严重。

往前争的罗瑞卿落到悲惨的结局。往后避的许光达又将如何呢。

实际上是避无可避，原因还是上面两个。

如果说庐山会议之后的历次运动，许光达因为专注装甲兵能躲得过。那么风暴再猛烈一点的时候，这个原因恰好促使他跌落深渊。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发动成功，关键在军方。军方的关键代言人是林彪。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凡是在林彪面前不太听话的人统统要靠边站。正因如此，罗瑞卿遭殃了。

许光达也无法避开。因为许光达的装甲兵虽然是个新兵种，但在陆军的地位举足轻重。林彪要想在军方树立绝对威望，不可能对装甲兵视而不见。看看建国之后成立的几个新军种。空军落入吴法宪手中。吴法宪是林彪一手提拔栽培的，林彪的铁杆粉丝。空军因为吴法宪而成为林彪的后花园。日后林立果嚣张的后台就是空军。林彪把李作鹏一手提拔、推荐到海军。李作鹏到海军之后把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折腾不轻。

但是许光达和林彪基本上没关系。看看两人的简历。虽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林彪四期，在广东。许光达五期，后来搬迁到武汉，两人基本上没有交集。两人虽然都参与南昌起义，但都是低级别军官。林彪出身于叶挺独立团，许光达在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两支队伍之前基本上互不相关。等到三河坝战斗之后，才有朱德合编在一起。而那时候许光达又受伤了，离开了队伍。此后林彪和朱德在湘南转了大半年之后最后去了井冈山，成为红一方面军的骨干人物。许光达一番辗转去了湘西，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一员战将。日后许光达在战争中受伤，去了苏联养病，错过了长征，再回国已经是国共第二次合作。许光达回到延安时，林彪领兵在外。接下来林彪也受伤了，去了苏联养病。解放战争中，林彪去了东北，许光达在西北。

当然许光达的军事成就不能和林彪比。但从军事实践中看出，两人没有交集，也就谈不上关系。建国之后林彪基本上在养病，许光达埋头搞技术。还是没有交集。如果没有严酷的政治斗争把所有人都强行卷进去，以两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估计直到最后许光达和林彪都不会有什么来往。

但是政治斗争把两人拉到一起。因为林彪要全面掌控军方，就不可能忽视装甲兵，不可能忽视许光达。许光达从来就不是林彪的人，也不可能是林彪的人。许光达不仅不是林彪的人，还是贺龙红二方面军出来的。

贺龙正是林彪掌控军权必须搬掉的石头。

文革开始时，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一的朱德淡去了，排名第二的彭德怀被斗臭了，刘伯承靠边站，陈毅、聂荣臻转行，徐向前、叶剑英说不上话，罗荣桓去世了。真正还在军方有话语权的只有林彪和贺龙两个人。林彪不太管事，军委实际日常事务由贺龙主持。

当林彪搞掉大将罗瑞卿，换上上将黄永胜；当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靠边站，中将李作鹏兴风作浪；当吴法宪把空军摆弄成林家军，贺龙当然很不爽。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爽，不可能视而不见，除非他是林彪的铁杆。贺龙不可能成为林彪的铁杆。

所以关于海军问题，贺龙针对李作鹏在海军内部拉帮结伙曾如此表态：“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来斗争。要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贺龙还说：“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有的人的屁股凭什么摸不得？党章有权利嘛。”

但这话传出去之后就变成“林彪的屁股有什么摸不得”。林彪就说：“贺龙在海军的讲话只能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军委，也不能代表毛主席。”

吴法宪在空军内部搞反党集团，贺龙在军委常委会研究空军的问题时指出：“空军内部派性比较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只会报喜不会报忧，有些事情就是一面之词，有些成绩经过了解以后发

现是假的。”

凡此种种都证明，贺龙不可能屈服于林彪。毛泽东让贺龙找林彪谈谈，结果两个人话不投机半句多。林彪绝对对付贺龙。林彪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同时提醒吴法宪注意贺龙，“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

林彪从来就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他做的永远比说的多。要打到贺龙，必须“剪其羽翼”。所谓羽翼，不见得就是真的羽翼，看起来像的，也要拿下。

贺龙的羽翼有哪些人呢？——罗瑞卿。罗瑞卿原本是红一方面军的，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推荐的。但是后来罗瑞卿和贺龙走近了，所以罗瑞卿被打倒了。还有杨勇，也是长时间跟着林彪干革命的，也跟贺龙走得近，也被打倒了。

林彪打仗时别具一格，搞斗争同样是别具一格。他总结罗瑞卿、贺龙的诀窍，第一段是十六字诀：“大将点火、元帅升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第二段：“大将、元帅不能一勺烩。”除了林彪，估计再没有第个二人能够用这么简练的文字来表达政治斗争了。

另一种人就是原红二方面军出身的，例如廖汉生和王尚荣，也被打倒了。

那些人被打倒之后，贺龙也就倒了。打倒贺龙那个级别的人物并不容易，常用的大帽子只能有两个：里通国外，或兵变。

当初高岗和彭德怀都戴了里通国外的帽子。同样的款式不能太泛滥了，那就换一款，兵变吧。于是有了二月兵变。前面说过，所谓二月兵变，实际上是一种“被兵变”。在二月兵变中，贺龙和彭真是总策划，廖汉生、王尚荣等人都是成员。当然根据剧情需要，任何一场兵变都需要一个参谋长。跟贺龙扯上关系、有分量、能服众、需要拔去的高级将军是谁呢？只有许光达了。该来的总是要来，躲是躲不掉的。

文革开始那会，许光达正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回国时是九月份，正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文革风暴突起之时。许光达下了飞机就听见刺耳的高音喇叭：“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看见潮水般的人群，看见年轻的红卫兵手里都拿着小红皮书，奔走呼喊。几个红卫兵拦住了几个年轻女人，剪短了她们的头发，毁掉她们的高跟鞋。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的象征。

许光达很困惑：他搞不懂运动究竟要搞到啥时候，搞不懂为啥。但是他必须支持，至少不能反对。没有人敢反对。许光达也不敢。他回到家中也不得清静。依然听见刺耳的高音喇叭：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不革命的滚蛋！

许光达很无奈，他看看生死与共的妻子，她也很无奈。但他们也许想不到，那场风暴将要把他们吞噬。

邹靖华拿出几张红卫兵的报纸给许光达看，内容是二月兵变的事。写作风格跟当今网络上那些造谣大师同一个水平：某时某刻贺龙调动军队，调动军队干什么？是不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对，一定有密码！某时某刻彭真在北京造房子。彭真造房子干什么？是不是干某些勾当？然后又挖掘出一些秘闻：彭真和贺龙关系很好，从来就很好。再以此为基础展开联想：彭真的行动和贺龙的行动是一致的。他们能干啥呢，肯定有一个惊天阴谋——兵变。兵变目的：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等每个学校驻扎一支军队。再加一些知情人透露：贺龙私自调动军队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大概就是这样子。把瞎掰、胡扯、意淫说得有板有眼。在那种情况下，真相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宣传，如何造势。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许光达看到之后怒了。因为那事的前前后后许光达都很清楚。那事在宋朝发生过，发生在岳飞身上，那叫莫须有。在明朝也发生过，发生在于谦身上，也是莫须有。

如果许光达知道在不久之后，他自己成了政变的总参谋长，估计更愤怒了。

当时的许光达还是中央委员，却很少能看到中央文件，也很少参加中央的会议。他的情报从哪里来呢？就是红卫兵的大字报。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都是奇闻，偏偏就发生了。

许光达意识到，风暴一定会吹到装甲兵的内部的，啥时候来不知道，但一定回来。红卫兵到处贴大字报，到处辩论，甚至大打出手，装甲兵大院自然也不能幸免。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八号，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来到装甲兵机关大院。

一群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跑过来找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庄严提出要借装甲兵大院用一用，办重要的事。干嘛呢？开批斗大会。他们批斗当时的装甲兵政委黄志勇。黄志勇是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授衔中将。黄志勇是文革开始之前被调到装甲兵大院的，之前在工程兵学院上班。红卫兵说，黄政委之前的生活作风不检点，还有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要清算。

按照当时的社会空气，许光达没办法阻止，只得同意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而且双方（许光达和红卫兵）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装甲兵机关大院的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都到会参加观摩。相当于说，红卫兵用装甲兵的地方、批判装甲兵的人，而且还要装甲兵的领导们在旁

边观看。——活脱脱霸王条款。

但是没办法，当年的红卫兵就是牛。牛到啥程度呢？可以不遵守诺言。原本许光达同意他们的要求，也就是应付一下时局和年轻人：大家最好都文明一点，不要搞人身攻击啥的。但到了开会现场就不一样了：红卫兵觉得，批判会就应该是批判会的样子，太文明了还叫批判大会么？就应该挂牌子，就应该戴高帽子。红卫兵也不管那么多，直接拿出纸糊的高帽子往黄志勇头上戴。

许光达一看红卫兵食言赖账，上去制止。牛气冲天的红卫兵直接把共和国大将一把推开，并且牛气哄哄地高声斥责：“这不关你的事，走开！”堪称天下奇闻。

那是许光达第一次领受到红卫兵的蛮不讲理。愤怒之下，心脏病发作，倒在会场，进了医院。进入医院的许光达依然没能摆脱红卫兵的纠缠。

红卫兵代表到医院找许光达，要求老将军接见，说向老将军表达歉意。医院护士出于为病人的健康考虑，把红卫兵代表挡住了。红卫兵代表真的来道歉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工程兵学院的学生对装甲兵司令还是有尊敬的成分在。毕竟他们毕业之后，一部分人的就业目标就是装甲兵。他们失手让老将军住院，总有点过意不去。说不是，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他们是跑过来讲道理的，也就是解释自己的行为。

因为医院阻止，所以道理没有讲成。但是他们不甘心，千方百计想把要说的话讲清楚。既然医院去不得，那就去许光达的家。许光达离开医院还没进家门就看到红卫兵的解释。红卫兵们发挥了他们的才智，把要说的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副对联贴在许光达家的大门口。

上联：小将造反有理

下联：老将理应支持

横批：造反有理

能用一副对联把意思表达得如此清楚，逻辑健全的同时，不乏诙谐幽默，不容易啊。如果当时那代人的才华用在干实事上，说不定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

但是对许光达而言，危机才刚刚开始。二月兵变的阴影徘徊在京城上空，如同一只盘旋的幽灵，可能附体在每一位将军身上。

那副对联一直贴在许光达家的大门上，代替了许光达家的过年春联。一九六七年春，夺权开始了。从伤害开始，蔓延到全国各地。许光达终于没能挨过那场风暴。

一月十六日灾难来了。那天晚上，许光达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由于整体局势不好，许光达心情也不好。共患难几十年的邹靖华一如既往地安慰他。许光达身体不好，正准备回医院修养，同时可

以清净一下。医院相对好一点，避开无孔不入的红卫兵，但有些事是避不开的。一群红卫兵钻进来了，而且态度很嚣张。

许光达的地位是很高的，特别是建国之后，位列共和国大将，装甲兵司令，中央委员，标准的高干。大家平时对他都是相当尊敬、相当客气，特别是装甲兵单位内部，特别是年轻人，见了许光达都是礼貌加微笑的。大家都想给老将军留下一个好印象，饭碗和前途都和他联系一起呢！

然而那天晚上，一切都变了。礼貌没有了，笑容没有了，只有煞气。原本和善的年轻人换了另一副脸孔，如同绵羊变身饿狼。

红卫兵叫嚷道：“许光达，走，到办公室回答问题去。”仿佛司令员召集下属。

邹靖华对他们说：“司令员有病，正在住院。病好后再回答你们的问题。”

红卫兵回答：“不行！必须今晚回答。”态度极为强硬。

许光达风风雨雨一辈子，枪林弹雨都爬出来了，当然不会在意这些场面，平静地配合红卫兵。但他们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叫许光达去回答问题，而是另有所图。许光达和红卫兵离开之后，另一伙人进来了。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陈志文。

原来陈志文已经变身为造反派。但是他和一般的造反派不同，不是造反的，而是收集证据的，进门就直奔主题——许光达书房的保险柜而去，把保险柜反复翻了好几遍之后也没有找到想要的证据，又气呼呼地跑出来。为了消气，把邹靖华卧室里的一石膏仕女像给砸碎了，说是砸“四旧”。

砸完之后，陈志文牛气哄哄地对邹靖华说：“把黑名单交出来！”

邹靖华不解：“什么黑名单？”

陈志文说：“‘二月兵变’的名单。”

邹靖华说：“你是秘书，你都知道，还用问别人？”

陈志文无言以对。事情不会就这么罢休的。大家继续翻箱倒柜，继续搜，继续砸，全然不顾及什么法律程序，不顾及对方是中央委员的身份。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这些还不算啥，那么看看陈志文的表现。他原本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怎么会跑来造反呢？只有一个理由，他被策反了。谁有那么大的能力让堂堂装甲兵司令员的秘书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相信装甲兵司令员参加兵变呢？说不清是谁。因为整个大局就在那里。所有人都那么疯狂，不是一个两个。

正是在那种大局下，才能把所谓“二月兵变”编造得活灵活现，是有了二月兵变才能扯上许光

达。在一般人眼中，既然地位崇高如贺龙都可以发动兵变，其它还有啥不可以的？在陈志文和那帮翻箱倒柜的造反派看来，自己并不是什么不良分子，恰好相反，自己是在保家卫国，是在为人民服务呢！是不是很讽刺？

一群家伙把许光达家翻底朝天，搜了好几遍，累得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也没有找到所谓的黑名单。唯一的收获就是一面日本旗。好的，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那面旗是许光达在抗战中缴获的战利品，一转眼成了叛国投敌的证据。其实不用脑子也能想明白。当时日本被美国人牢牢抓在手心里，三军完全被阉割。许光达即使叛国投敌，也得投靠苏联、美国那样的有实力的国家。去投降日本？说真的，太掉价。

但是不管怎么说，许光达已经被定为“二月兵变”的一员，而且身居“参谋长”高位。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这个“定性”进行。

既然大家认定二月兵变，认定许光达是贺龙的参谋长，那么黑名单就一定存在。在许光达那里一定有黑名单。既然家里没有，一定在别的地方。哪儿呢？自然是医院咯！因为许光达要么住家里，要么住医院里。但是当时的解放军总医院实行军管，不搞“四大”，造反派没辙。

陈志文从邹靖华那里没能得到收获，但要完成任务交差，并借机辉煌腾达，于是找到另外一个人，曾正魁。曾正魁是许光达之子许延滨的未婚妻子。她爸爸曾诚富是解放军总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是高干楼的副主任，也是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所以陈志文认为黑名单一定是通过曾正魁转移到解放军总医院去了。

陈志文说：“你是许光达的‘黑联络员’，能瞒别人，还能瞒住我吗？”

人家一个未婚姑娘被陈志文说成是黑联络员，当然很生气。但也没办法，只能声明：“你们可以派人到总医院去搜我家，你们刚才已经搜过，我身上没有黑名单，那好，我现在就回学校去，在问题没搞清楚以前，我不回家，这总可以吧？但是，你们必经把问题搞清楚，对你说的话负责。”曾正魁告别许延滨和邹靖华，回到北京钢铁学院去了。

就在陈志文灰心丧气之际，一个红卫兵有重大发现：许光达的写字台上有一张照片，是许光达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和恩维尔·霍查的一张合影。他如获至宝，说：“陈秘书，你看，许光达到现在还保留着同苏联人的合影，这就证明他与苏联勾结，充当苏联的特务。”

——明明是定性搞兵变的，这么一来变成通敌叛国了，有趣。

一帮人翻箱倒柜一晚上，所有的收获就是一面日本军旗和一张照片。

那场景之滑稽，堪比莫里哀的经典喜剧，但好戏才开始上演。既然在许光达的家里找不到搞兵

变的证据，那只能从许光达本人那里找了。

许光达被带到装甲兵机关大院，许多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人群之中，既有原本视许光达为偶像的来自装甲兵所属各院校的红卫兵代表，还有三总部的群众代表，还有其他人。虽然剧情很滑稽，但现场庄严肃穆，仿佛大家都在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一排红卫兵小将坐在主席台上，手中拿着他们的《圣经》：红宝书。一个个稚嫩的脸上写着不合时宜的庄严。仿佛他们是法官，仿佛他们是法律，仿佛他们是他人命运的主宰。处于受审位置的那老人，却是为国为民几十年，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英雄。

过程跟审理案件差不多。红卫兵气势汹汹地说：“许光达，你知道我们要你回答的问题吗？”就像电影里的县太爷：“某某某，知罪吗？”如果嫌疑人不说话，按照程序，接下来就应该是拍惊堂木，大声斥责：“某某某，你犯了什么罪，快从实招来！”

红卫兵没有惊堂木，只能摇一摇红宝书，说：“一、你要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位置的罪行；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三、听说你有三个老婆，除了北京的一个，老家还有两个。这是犯重婚罪。”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要打倒一个高级将军，只要按上政变或通敌的罪名就可以了，干吗搞那么多花花绕呢？只要交代落实兵变，许光达就完了，还扯生活问题干吗？实际上三个罪名是精心编制，有内在逻辑的。

许光达一看这情形，滔天脏水扑面而来，觉得有必要辩护一下。他平静地扫视了全场，说：“好吧，我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怎么辩护呢？就是把自己的一生回忆一遍呗。彭德怀被冤枉，八万言书，就是一篇自己的回忆录和奋斗史。许光达也一样，把自己一辈子干的事，跟年轻人大概说一说。

有啥好辩护呢？只要了解许光达的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问题已经被定性了。既然被定性，怎么辩护都没用。彭德怀和贺龙的问题也有辩护，但有用么？

许光达辩护说：“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既然问题已经被定性了，那就用别的办法。会场立马有人高喊：“打倒许光达！”又有人高喊：“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红卫兵有时候很可笑，有时候又很幼稚。看看那情况，说理说不过，构陷缺少证据，就泼皮耍赖。跟孩子吃不到奶就大哭是一个德性。

许光达平静地告诉大家：“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

亏本的买卖我不干。”

是啊，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谁能不明白呢？就有人不明白，很多人不明白。所以许光达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人生进入了黑夜。

许光达被关押之后，最着急的人是邹靖华。她想不到，夫妇二人风风雨雨一辈子了，到最后还要分离。她知道许光达的年纪大了，身体有不少毛病，特别是心脏问题，最让她担忧。她担心他们侮辱他，担心他们动粗。

接下来，红卫兵当然也没闲着。他们的辛勤劳动终于有了收获，继日本军旗和照片之后又找到一个新证据：许光达之前写给邹靖华的信，情书。

好吧，生活腐化的证据。有机会攻破第三条，三个老婆，重婚。

一帮刚刚到做春梦的年纪的男男女女把邹靖华拉过去进行思想教育：“你保留这份‘情书’就是思想糜烂、精神颓废。革命者应该心里只装着革命，不能有任何杂念。”

邹靖华表示很无语，但还得应付：“年轻人，你们无法理解一对老夫妻在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眼泪凝成的爱情，它无碍于革命，却鼓舞我们献身革命！”

“住口！”，一个估计还没有和男人牵过手的女红卫兵打断了邹靖华的话，“许光达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为什么美化他？”。仿佛邹靖华的话触犯了她的某个敏感的神经末梢。

邹靖华对她说：“姑娘，你今年才多大年纪？许光达当纵队司令员的时候，你还没来到人世间哩！你怎么知道他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

那女红卫兵不知如何应对，只能强词夺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同许光达划清界线，揭发他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他有什么罪行？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出生入死；建设时期，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分白天黑夜地忘我工作。这些都是他的罪行吗？”邹靖华平静了一下她的情绪，接着说：“我们结婚都快四十年了。彼此的心都凝在一起了，界线能划清吗？”对邹靖华而言，那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原本想从邹靖华那里打开缺口，找到许光达“三个老婆”下落的红卫兵生气了，说啥道理嘛，拉出去游街。大伙一合计把邹靖华拉出去游街示众了，跟唱大戏差不多。

大家不仅纳闷，写个情书有啥了不起？再说还是人家夫妻之间。其实问题很大。给许光达列出的三条罪证中，第一条才是致命的。第二条和第三条都是可大可小，并不致命。但是三条罪证之间彼此关联。

第一条搞兵变。既然搞兵变，必须有征兆呗，必须对现实不满呗。怎么表现出来呢，那就是反对毛主席呗。那年头谁都不会说反对毛主席。毛主席是政治领袖呗。林彪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拥护毛主席。把许光达说过的话，如“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断章取义，就是反对政治，就是反对毛主席。那么如何解释风马牛不相及的第三条呢？谁都知道许光达的婚姻是共产党人的典范，干嘛要瞎编乱造呢？那是为了给第二条设的伏线。人家许光达是开国元勋，又是高干，为啥要反对政治、反对毛主席呢？那是因为毛主席代表光明正义一面，而许光达受不了欲望的诱惑滑入欲望的陷阱，找了好几个老婆，贪得无厌，罪该万死。

看看这三条，从人性，到逻辑，可以说面面俱到。实际上这三条是政治运动年代的万能公式，要想打倒某人，必须和那个万能公式拉上关系，比牛顿定律在自然界的运用范围还广泛。

由于许光达的分量很重，所以三条都要扯上。

让邹靖华揭发许光达不成功，造反派再次把突破口放在许光达未过门的儿媳妇曾正魁身上。他们让曾正魁和许家划清界线，揭发许光达。曾正魁是个好姑娘，顶住政治风暴和许延滨结婚，无怨无悔地成了许家的人，骨气很有几分邹靖华当年的风骨。

接下来发生一件诡异的事：一月份被莫名其妙关押的许光达，三月底被莫名其妙的放出来。两个多月，许光达还算好，没有遭到武斗。出来之后，将近五个月的时间，许光达在家写检讨，写了十几万字。到八月中旬，许光达再次被莫名其妙的关押，遭遇最残酷的对待，悲惨地死去。这一切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情牵扯到另外一个人，开国少将程世清。

程世清生于一八一八年，河南人，十一岁参加红军，十五岁入党，起于红四方面军，长征之后在陕南干革命。仅仅念过一年私塾，却能吹笛、吹箫，拉二胡、拉手风琴等，亦能快板书，演活报剧。登台作报告，声音洪亮，铿锵有力，富鼓动性，而且不用稿子。天生搞政治的好材料。后历任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中跟着林彪在东北干。

程世清吃过苦、立过功，但人生中最重要的是揭发。最有名的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前，被毛泽东点化之后，揭发林彪可能叛逃。在揭发林彪之前，程世清一直都是林彪的铁杆粉丝。在当林彪的铁杆粉丝的过程中，写过一篇马屁文章《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证明他和林彪关系非同一般。

在那段时光里，他给林彪写过最有名的一封揭发许光达的告密信。

程世清原本和许光达没有关系，但是在装甲兵干过一段时间的政治部主任。搞政治的人嗅觉都

比较敏锐。文革开始，许光达因为和贺龙、彭德怀关系密切，就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肥羊。前面说的刘居英少将就是其中一员，只是没有成功。显然刘居英神功不如程世清。刘居英虽然也想踩着许光达的尸体辉煌腾达，但手段还算正常，仅仅想借助丁铁石找证据，在那年头还是可以理解的。程世清则是毫无节操，直接给林彪写一封长信。

程世清在信中发挥了全部的才华和阴险，说：许光达对林副统帅“最不满、最仇恨”。为啥是那个样子呢，因为林副统帅是光明的，而许光达“与苏修有勾搭，有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疑”。在那个莫须有的嫌疑下，得出结论：时机一成熟他就会出来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的江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封信是一个关键。原本贺龙和彭真组合在一起的二月兵变只是一个假设。程世清的那封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信给兵变提供了“证据”。由于检举有功，程世清少将很快升迁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九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程世清飞黄腾达之时，许光达和贺龙正一步步走向地狱。

拿到证据的林彪很高兴，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点了许光达的名，说“贺龙准备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林彪的这个点名给以后审讯许光达定了总调子。那也是许光达成为“二月兵变”总参谋长的根源。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那天贺龙专案组成立。当然林彪想不到，几年之后，程世清揭发的矛头指向他。

此后就出现了红卫兵去许光达那里抄家的情况。这里还要涉及另外一个人，就是黄志勇。前面已经出现过，被红卫兵批斗过，许光达救过他。

但是那年头风向转得很快。许多人一开始被批斗，转眼就红了。比方说邱会作，被人家批斗得哭爹喊娘，投靠林彪之后，更为狠毒地去批斗别人。黄志勇也是一样，一开始被造反派批斗，一看风向不对，立马调转矛头，在装甲兵内部成立“斗许光达、张文舟（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专案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到三月份，关押许光达的就是黄志勇，所以说人心易变，所以说需要明晰的制度减少人性变恶的可能性。

文革之所以最后失败，现在遭非议，根源就在于，它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人性变恶的可能性。不仅文革，所有政治运动，除非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都不应该出现，所以才要求法制。

黄志勇还有一层身份，整人专家。徐向前一直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但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把黄志勇狠狠骂一顿。黄志勇搞逼供有很多办法：比如即席坦白，比如示范坦白，比如集体劝说，比如五分钟劝说，比如个别谈话，比如大会报告，比如抓水萝卜。那些招数已经很难说清楚，最特殊的一种是照相：开大会时，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许光达落到这样的人手中，日子怎么可能好过？

那么中间又为啥把许光达放出来一段时间呢？原因很明显，还是贺龙。

其实第一阶段关押许光达两个月，目的就是要敲打许光达：识相点，站队。因为兵变的主角是贺龙，而非许光达。如果许光达能站出来揭发贺龙。那么贺龙就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至于许光达本人，还可能因此高升。毕竟帽子是他们给的，也可以收回去。

所以他们只是给许光达施加压力，而没有残酷的武斗。

但是许光达本人只是写了十几万字的自我剖析，剖析自己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根本就没提贺龙的事。在如此背景下，只能把许光达拉进去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几个彪形大汉冲进许光达的家，不由分说，撕去他的领章帽徽，把他逮捕关押，没有任何征兆和理由。

邹靖华大声地斥责：“你们要干什么？他是中央委员、大将，要逮捕他必须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至少要有军事检察院的逮捕证，你们随便抓人，是非法的。”但无济于事。

许光达自己相当清醒，平静地对妻子说：“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准备再过十年那样的生活。”那样的生活，就是国共第一次内战时期，许光达和邹靖华结婚之后分别十年。只是那时候大家年纪轻轻，对未来的事业坚定不移。如今已经鬓发斑白，还有那精力、那信念耗过十年么？

许光达又对儿子和儿媳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爸爸的一生交给了党，你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那一刻他心中应该有点歉疚，因为他对儿子一直保持一种淡淡的隔膜。

许光达还是被关押在装甲兵大院。

为了对付许光达，造反派特意找两个人高马大的大个子（许光达个头大）进行武斗。一顿武斗下来，打得六十多岁的老将军几次休克。一边打一边骂：“许光达，今天就让你知道革命小将的厉害！”

大家已经把他定义为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同时戴着三反分子的帽子。他很担心自己的妻子。邹靖华再次受牵连，被关进有色金属设计院的“牛棚”，勒令她与许光达划清界线，揭露他的罪行。

二十三天之后的九月八日，“许光达专案组”挂牌成立。这个是正规的，比黄志勇在装甲兵内部搞的那个正式多了。

许光达一开始还据理力争，接下来索性不开口，看见嘴脸特别丑恶的就骂人。

那样又耗了三个月，直到十二月份，正牌专案组开始批斗许光达，火力全开。许光达要经常被罚站立、弯腰，也就是车轮战，最长一次车轮战持续三天三夜。但是依然没有达到让许光达“坦白交待”的目的。

既然车轮战不太有用，那就更换招数，降低伙食标准，试着用饥饿来摧垮他的意志。大约相同的时间，傅连璋就是那样死的，但是依然没能让许光达屈服。

专案组成员们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感到自己的整人技术手段没有得到认可。不行，一定要发大招。

当时的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将是贺龙专案组组长，就是日后的“杨、余、傅事件”中的那个“余”。文革中有人由黑变红，又有人由红变黑，余立金属于后者。而且他由红变黑的原因也很有趣，罪名也有一条，宣传突出技术，跟许光达一样。但此时的余立金很恼火，斥责许光达专案组办案不力，让黄志勇从装甲兵那里抽调一些得力骨干来对付许光达。黄志勇找来与许光达有怨恨的人如都曼林、党志壁进来。

与此同时，吴法宪对许光达一案的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

海军政委李作鹏的批示：“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

总后部长邱会作的批示：“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余立金、黄志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那些人的级别都是中将或少将，却决定大将许光达的命运，太诡异了。而且打下许光达则是为了搞掉元帅贺龙。元帅和大将搞兵变真的会落到一群中将、少将手上，让他们审判？

疯了，都疯了。

在“刺刀见红”和“不怕许光达死”的批示下，专案组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血洗许光达”。之前干革命时都没有提出过血洗某人某地的口号，如今对自己人倒是亮出来了。怎么血洗呢？技术手段是现成的，比方说邱会作就归纳总结了很多种超级残忍的方法。前面都介绍过，这里不再累述。

究竟有哪些刑罚用在了许光达身上不得而知。据《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记载：专案组的打手们，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光达趴下去舔吃，并放肆地呵斥说：“你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你大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什么时候斗你就什么时候斗你！”

专案组组长薛振先是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对许光达不爽。犹如李忠奇对彭德怀不爽。为了解恨，审讯时薛振先率先动武，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起模范作用。打手们见领导动手，便纷纷赤

膊上阵，把许光达打得昏死过去。当医生将昏死的许光达弄醒，打手们接着再打，直打得他内伤累累，却不见出血。他们是经过职业训练的。打手们把许光达打得站不住了，就把他按在藤椅上继续打。一个粗壮的打手飞起一脚，将许光达连人带椅踢翻，然后又把他揪起来推倒在椅子上，鲜血终被打了出来，浸透了他的白衬衣和军装。

同时他们还创造性发挥审判战术，把原本精神疲劳的车轮战改编为武力车轮战。审判中身高马大的党志壁和都曼林，一左一右地反拧许光达的胳膊，将他的腰摠弯了九十度，主审人硬要他承认是“贺龙兵变总参谋长”，许光达据理力辩，坚决不承认。都曼林便一拳又一拳地猛击许光达的腹部，边打边狂叫：“我干脆给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算了！”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便怀恨在心，乘机对许光达大打出手，致使许光达口吐鲜血。

因为暴打许光达有功，都曼林被提拔为兰州部队十九军副军长。此人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黄志勇也活到二十一世纪，活了九十八岁。

原本都是小人物，如果不是暴打许光达谁还记得他们？他们的一生是连正常人的一生都不算。因为他们靠为恶而扬名，充其量就是可怜卑微的一生。所有靠为恶而扬名的人都是卑微的，可怜的。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度，那是要下地狱的。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也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碌碌无为。

许光达身体本来就不好，连续不断地被批斗殴打，致使他咳嗽吐血，心脏病经常发作。专案组决定趁机逼他交待“罪行”，未果。他们就在材料上写道：“许光达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就装病。”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眼看许光达不行了，材料没搞全，不能让他死了，就把他送进医院，加紧逼供。此后两个月的时间，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实在挖不出啥东西，专案组的徐长浩、姜永兴通知许延滨夫妇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和他谈话，他都骂人，你们去做工作，要他赶紧认罪。”

——认毛线罪啊，本来就是莫须有。搞得一本正经，究竟是傻还是天真啊？

但他们没能完成“打掉许光达，给九大献礼”的任务。

一九六九年四月份中共九大召开，权力重组完毕。那些身陷囹圄的人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比方说刘少奇，比方说贺龙，还有许光达。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许光达再次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一周之后，病危的许光达已卧床不起，竟被专案组残忍地拖下床去向毛主席像请罪！此时离许光达的死还有三天。

许光达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借许延滨探望之际，小声说：“请设法转告周总理，我有话要和他

说。”时间是六月一日。许延滨连夜写了一封信，信上道：请总理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许延滨按照组织原则，要求专案组、装甲兵党委把这封信转呈总理。

六月二日，专案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信已转走。”

六月三日晚，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到办公室，说许光达病重，让许延滨去看，但又不放许延滨走。两个小时之后，有人进来通知：“许光达在八点半去世了。”

许光达惨死在病房厕所的马桶上，死因至今不明，终年六十一岁。

但是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九一三事变之后，听说要给许光达平反时，当时负责现场看管许光达的警卫连连长罗治芬，惶惶不可终日；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号，罗治芬在受到恐吓的当晚，便在家中上吊自杀。

许光达死后，专案组在没有家属参加的情况下，强行将遗体火化。好在死后还算仁慈一点，没有像刘少奇、彭德怀那般把骨灰编个号码放在某个角落里。周恩来看到许光达死亡的报告，又上报给毛泽东。毛发出指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于是，许光达的骨灰盒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许光达死后第六天，即六月九日，贺龙惨死。

二月兵变的统帅和大将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以类似的方式死去，是不是太诡异了？

在许光达的遗物中，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已经陈旧的墨印却发出耀眼的光芒：身经百战驱虎豹，万苦艰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也心甘。那是许光达连续被审讯三天三夜，心脏病发作又抢救过来后写下的，是其一生的绝笔。

许光达的一生，是光明利落的一生，实实在在的一生，早期标准的共产党员的一生。

人生天地间，一时得失或许看不清，但时间终究会还原一切。正如许光达和许延滨在最后一次见面时所说的：“你告诉你妈妈，好好休息，保重身体！我想，总有一天，历史将会公正地评价我们这些老家伙的。”

许光达死后，邹靖华熬过了那段风暴，离开牛棚，又孤独地活了三十多年。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邹靖华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她最后的遗嘱是：“我走了不要搞什么仪式，那样会麻烦，打扰很多人。老人来了，他们会伤感，那会影响他们的身体。搞仪式，公家要花很多钱，那些花圈都很贵，花的是公家的钱，人民的钱。你们要清清白白地做人，要为人民做事。我留下两万多块钱，一万块钱交党费，剩下的钱在老许诞辰百周年的时候给他出书。”

祝愿：你们化为比翼鸟，双飞在天际！

八、林彪和江青

（一）蜜月期

林彪和江青之间原本没有关系。战争年代，江青的职责只是侍候毛泽东的生活，地位、角色可以忽略不计。文革开始，文革小组诞生之后，江青才有了和林彪对话的资格。

江青能够和林彪对话，不为别的，只因他是毛泽东的夫人。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夫人，所以才能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操控中央文革小组，逼得原本的组长陈伯达投入林彪的怀抱。

两人的真正合作是在文革初期那段时间。江青以文化大革命旗手的身份到处点火。林彪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掌控军队，确保文化大革命的火焰不会被浇灭。因为林彪的存在，江青无论想放火烧谁都不会有阻力。因为江青的存在，林彪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一部分人清理掉。所以两人关系是互补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特别是九大之前，合作得相当愉快。

气候有较大的变化，相互请安问好。一方身体感到不舒服，相互请安问好。逢年过节，相互请安问好。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的前后，相互请安问好。如此这般，相当融洽。

据江青的秘书回忆：“一次，林彪从外地回到北京，没回毛家湾，就风尘仆仆地来到钓鱼台看望江青。这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看样子林彪有很久没有理发、刮胡须了。秃顶下边一圈的头发长长的，乱糟糟的，胡须白白的，足有半寸长。我从未见过他那副狼狈相。就是那样一个脏老头，一向讲究干净的江青，一见到林彪就高兴得眉飞色舞起来，亲热得几乎要去拥抱，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舍不得撒开，江青歪着头，向林彪热情地问安。”呵呵，别说脏老头，就是满身泥巴，江青也不会介意的。

江青是个眼高于顶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神”一样存在的毛泽东，只有林彪和康生能让江青感到有点敬畏了。

江青是级别原本不高，只是行政九级，在中南海算非常低了。后来林彪亲自批示，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一下子提高到五级。叶群亲自给江青解释说：“林彪同志说，给江青同志提级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不给江青同志提高级别，能斗过杨成武他们一伙吗？”（杨成武一伙是九大之前最后一次上档次的整人，这事后面再讲）。江青当然很高兴，虽然她不缺那点工资，但是行政九级在中南海是小鱼小虾级别，行政五级是上将级别，好看多了。

江青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林彪的仰慕。她知道林彪怕风、怕冷、好感冒，一年四季从室内到室外脑袋包得严严实实的，就请人给林彪特做了一个貂皮围脖，亲自送到毛家湾给林彪围上。林彪高兴得拉着江青的手连连说：“江青同志政治上考虑得周到；生活上想得也很细致。”林彪指着叶

群说：“江青同志在这方面比你强得多。”叶群赶紧回应：“那是，那是，不但在这方面，在许多方面我都得向江青同志学习。”

来而不往非礼也。林彪怕江青大风天气不能到室外晒太阳，就叫后勤部在江青住处一个房间安上特大玻璃，让江青可以晒紫外线。

林彪怕江青出楼门、下汽车被风吹着，伤风感冒，叫叶群带上“林家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和建筑设计师到江青的住地钓鱼台十号楼，给江青修建一个直接通往楼房的汽车库。从选址到设计，到请江青审查，在邱会作亲自指挥、亲自监工的情况下，五天时间搞定，可谓神速啊！整个施工过程，邱会作全程跟踪。

林彪和叶群两个人之间的桥梁是叶群。叶群是林彪的办公室主任，管事很多。同时叶群还自称是江青的学生，就和林彪自称为毛泽东的学生一样。叶群是江青的常客，常常去江青那里走动一番，互通信息。信息包括，红卫兵又去哪里抄家，抄到多少宝贝；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要私下对付某人，如消灭孙维世等等。

这种和谐一直持续到九大。在那次大会上，不管是林彪一帮人也好，江青一帮人也好，权力瓜分完毕。要想继续掌控更大的权力，必须彼此开火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林彪 陈伯达 周恩来 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彪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二）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

叶群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聪明，能看到眼前利益；缺点是仅仅有点小聪明，仅仅能看到眼前利益，缺乏智慧。

叶群看见江青的地位崇高，能量极大，就想办法跟上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那是光芒万丈，红极一时。红卫兵兴起那会，毛泽东因为接见红卫兵时穿了军装，全国上下纷纷效仿，从上到下，都穿军装。当时刘少奇刚刚倒台，林彪被确认为接班人。林彪刚上台，叶群就以林彪的名义给江青送一套军装。不仅如此，还给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送了军装。有人说那是林彪授意的，事实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接到同样的东西。

当时林彪对江青还看不顺眼，但叶群却很识时务，她曾跟秘书们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

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

事实上她说到做到。江青所到之处必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叶群则一模一样：“我代表林副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林副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完了之后，叶群经常带头喊两嗓子：“向江青同志学习！”

如果江青不在场，叶群绝对不去出风头，绝对不抢江青的风头。一九六七年的国庆节，周恩来带着大家去首都机场迎接阿尔巴尼亚代表来访团。叶群早去了，江青没去。来宾都到了，叶群要退出。叶群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周恩来不让退，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叶群可不管那么多，趁周恩来不注意，悄悄溜了。她的理由：“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出现，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

——看看，这就是叶群的小聪明。她还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对江青很够意思。当然，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江青能让她“很够意思”而已。实际上她没有搞明白，她之所以可以和江青混到一起，不是因为她很够意思，而是因为她是林彪夫人，仅此而已。

在江青的眼里，叶群是什么样子呢？据秘书回忆：“像请安问好之类的事，叶群打电话的时候，大多是直接打给江青的秘书，请秘书转告。她很少直接打给江青，怕电话铃声打扰江青的休息或办公。江青打电话给林彪是通过秘书打给叶群。”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江青看来，叶群的档次级别不够。如果类似的电话由她直接打叶群，有失体统。而且江青打给叶群的电话要秘书记录。江青认为：叶群鬼点子多，需要多几个心眼，免得将来出事不清楚。

这样就造成这样一个画面：江青需要给林彪打电话时，先把要说的话交代秘书写下来。江青审查之后同意。秘书再依照记录好的内容打回去。

——这就是政治，所谓“朋友”之间都是如此小心翼翼的。

涉及到自身的利益问题时，江青更是不给叶群面子。九大结束之后，叶群和江青两个原本没能力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人都进入了。但是名单出来之后，江青大跌眼球。名单是按照姓氏笔法排列的。“江”比“叶”多一画，叶群的名字排到江青的前面。江青愤怒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

林彪当时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江青带着文件急匆匆地去找林彪。浙江厅门前，叶群笑脸相迎，手伸到老长准备和江青握手。江青一点面子也不给，阴沉着脸，手连抬一点都没有抬，昂着

头直接进去找林彪——那一刻，叶群在江青的眼中就是尘埃。

在江青看来，她自己和林彪是一个档次的，叶群只是陪衬。此后的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的前面。叶群和江青之间怎么样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江青和林彪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三）裂痕

林彪和江青之间的裂痕一开始就有。江青跟林彪比，原来就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文革之前的江青基本上没地位，也就是以第一夫人身份到处瞎嚷嚷。林彪虽然不怎么喜欢说话，但内心是比较骄傲自负的。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而且他也懒得去搞人际关系。江青那种叽叽喳喳到处瞎折腾的人，让林彪去亲近她，绝对是瞎扯。

江青带着文革小组到处点火，林彪可以装作看不见，也不想去看。如果那火烧到林彪身上会怎么样呢？

江青当然不想把火烧到林彪那里，因为当时的江青还没有力量跟林彪叫板。但江青是个演员，在人生舞台上一直很卖力地演出，不知不觉就演到林彪那里。

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从上海掀起的夺权风暴蔓延到全国，军队自然也不能例外。江青趁机洋洋得意地指挥人马到处放火，烧向军委。大笔杆子关锋和王力在江青的授意下，熬死了很多脑细胞之后拼凑出一篇大作《关于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内容是“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想从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那里打开缺口。于是江青、陈伯达、叶群攻击肖华，惹起了还在管事的元帅的不满，认为肖华在总政把军队文革搞得不好。

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他的功能就是灭火：“军队里不能搞任何战斗组织，军队要绝对保证我党的领导。都搞战斗组织，三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好几派搞起来，军队这个指挥就瘫痪了。军队是拿枪的，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飞机每天几百架起飞，搞起来就乱了。军队里面不能和一般单位一样搞大民主。我看军队里面现在乱得很。我经常头痛，身体不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这是一个难题。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长征老干部最小的也快六十岁的人了，都身体不好。这个揪，那个揪，都斗争，无休止地斗争，这样斗下去，不斗死也斗垮了。过不了多久，老干部都会垮下去。老骨干还是要的。”

但是新成立一个全军“文革小组”，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那样徐向前就变成一个空壳，那样他们就可以批斗肖华。但是肖华是总政治部主任，批斗他相当于

打乱军委。

陈伯达说：“肖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并且为了攻击在场的老师，把军队顺带上，“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一旁的叶群当然不会让江青一个人战斗，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之前写好的稿子，按照之前设定好的场景对着肖华念：“你为什么反对江青同志？你算什么总政主任？你就是总是专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军院校的师生检讨你的严重错误！”如同和尚做法场。

贺龙倒台之后，叶剑英上去主持日常军委工作。叶剑英一看叶群那婆娘如此捣乱，很来火，就问叶群：“请问叶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么新指示呢？”

叶群当然不买叶剑英的账，说：“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反对谁，首长（林彪）也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的。”为了增加感染力，掩饰内心的心虚，她站起来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真把现场的老人当成红卫兵了。

随后江青让肖华晚上到工人体育场受审、挨批斗。但肖华没去，躲到了叶剑英那里。第二天就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的事。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不再累述。

发生这么大的事，军方招牌人物——林彪不在场，他的意见是怎么样的呢，是被叶群代表了？当然不是。林彪刚开始根本就不知道，王力和关锋的大作，林彪是签名画圈了，那是按照“自古以来”的策略。林彪那么干，是为了把自己隐蔽起来，不得罪人，任凭别人斗得热火朝天，他自己闷头增加实力。但是他不会轻易允许有人挑战他的权威，除非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之后叶剑英向林彪汇报了情况。据吴法宪的回忆，在叶剑英汇报完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林彪一见江青就怒火冲天，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

林彪把毛泽东搬出来吓唬江青：“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江青完全没有往日的嚣张，解释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并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吴法宪这段回忆，有其有道理的一面，也有没道理的一面。

从这段表现看，林彪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冷静。林彪平时很少说话的，除了对毛泽东偶尔会多说点，对其他人很少说话，很少长篇大论。再看林彪的性格，只有在严重的挫败感时才会焦虑不安。比方说长征时代的湘江之战，红军损失很大，情绪很低落。又比如说在第一次四平保卫战失败之后，千里大撤退时表现焦虑不安。那么文革初期，林彪需要焦虑么？

初看林彪升为党内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国家二号。那些副主席都是空的，唯有军权是实的。作为军事统帅，看起来很风光。风光是需要前提的，就是秩序。没了秩序的统帅是很危险的。

秩序，是军队的基石。混乱，只会把军队变成一种危险的存在。

有谁希望当乱军统帅？所有林彪焦虑的时刻，都是手下队伍比较混乱的时候。如果军队乱了，林彪也不会有好结果。

无端打击肖华，扰乱军委，就是在扰乱军方的秩序。扰乱秩序时，连已经靠边站很久的徐向前都不能忍受，连领导军工生产的聂荣臻都不能忍受，连当了外交部长的陈毅都不能忍受，全军统帅林彪能忍么？很显然，也不能。这是有道理的一面。

所以林彪不理江青的狡辩，穷追猛打：“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继续狡辩：“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肖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这里不禁又纳闷。江青向来眼高于顶，很少对别人看得顺眼。从年轻时代当演员时就很骄傲，时不时干点大家想不到的事。现在看到的资料都是她如何嚣张跋扈，她会在林彪面前认怂么？答案是可能的。

也许后期不太可能，文革初期是必须的。

江青嚣张的基础有几个人。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一个林彪和一个康生。没有康生背后出主意，江青很可能像泼妇一般到处吵闹。没有林彪操控国家机器，江青嚣张不起来。

到这里吴法宪的回忆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接下来就出现漏洞

江青的话彻底惹火了林彪。如果说批判肖华，林彪还能勉强忍受的话，那么“清规戒律多”，彻底触怒了林彪。按照吴法宪的回忆：林彪掀翻了茶几，气匆匆地去抽屉里找枪要毙了江青，多亏身边的人及时劝阻才勉强压住了怒火。

——这些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在，但也能理解。军队没有那些严肃的军规，还叫军队么？没有军规，哪来战斗力？要打碎那些“清规戒律”，相当于挖林彪的心。

但是接下来就出现了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是明显漏洞。

林彪说：“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林彪连声高叫警卫：“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吴法宪），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肖华、抓肖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这段叙述有明显的漏洞，就是时间对不上。

江青攻击肖华是一月十九号，第二天是大闹京西宾馆。叶剑英甚至手掌拍桌子受了伤。当时吴法宪在场，按照吴法宪的回忆，叶剑英是在二十号下午三点向林彪汇报了情况。

四天之后，即一月二十四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去找林彪，要搞几条保证军队的稳定。后来就搞了七条。毛泽东又加上一条，一共八条，时间是一月二十六号。周恩来又和大家一起商量修改，又在二十八号给毛泽东审阅定稿，签发。

也就是说林彪不可能在一月二十号就对江青发火，说《军委八条》的事。也就是说吴法宪这段回忆有水分。可能是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了，这是最简单的原因。

但也有可能是其它原因，即吴法宪故意掺水。因为吴法宪的回忆录是在文革之后写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已经落到林彪和江青的身上，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以逮捕四人帮结束的。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想划一条线，造出一种林彪一直反对江青的假象。其实完全不必如此，因为林彪从来不需要反对江青，不需要——江青的级别不够。林彪只是想要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江青试图去抢。

林彪和江青闹崩，并不是因为江青搞乱军委。而是一个人，陈伯达。

（四）陈伯达的命运

陈伯达，生于一九零四年，福建人，破落秀才之家走出来的孩子。

陈家原是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是进士，清朝刑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官，祖父也是乡进士、惠安县文峰书院院长，到他父亲那一代，只是秀才，家庭破落了。

因为生于书香之家，陈伯达有机会读书写字，并且在十五岁那年，考上了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那学校是华侨富商陈嘉庚创办的。陈伯达开始以教师为职业，谋得一个饭碗。他成功了，又失败了。说成功了，是因为他在十七岁时确实找到了一个教师职位；说失败了，是因为在那年头，教师并没有保障。比方说徐向前之前也是教师，也没法活。特别是偏远山区，那是相当没前途。如果在大城市，按照陈伯达的年龄应该会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

年轻时代的陈伯达，偶像是郭沫若，希望有朝一日像郭沫若那般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诗人。然而陈伯达并不是一个写诗的料，只能混社会了。他在厦门当过编辑，锻炼了笔杆子。在混社会过程中，偶然的机会，他同后来叛变革命的陈文总和大批发商林绍平结拜为义兄弟。按年龄，以“松、竹、梅”为序，他排老三。

那是国共合作的时代，革命党人都很能混的。在厦门混的陈伯达接触到共产党。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陈伯达的人生迎来新的转变，有机会去上海大学学习。在那里，除了学习一肚子的马列主义理论之外，他还认识一个将来要共事很久的同学，康生。

然后再次回到厦门，并且写了人生中唯一一部名叫《寒天》的小说。

然后他又经过一系列国共复杂斗争，在两党之间摇摆不定。当时陈伯达甚至认为共产党没有前途。而他当时还给福建土军阀张贞当秘书，还在何应钦的下面当过政治教官。但是蒋介石发动政变，使得陈伯达成了共产党，因为陈伯达成了通缉犯。当时陈伯达还不是共产党员，开始了人生流亡生涯，在流亡途中，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在上海杀人太狠，所以陈伯达去了武汉。不久，汪精卫在武汉也干起了杀人营生，在组织的安排下，陈伯达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个学校差不多算是共产党人的早期培训班，刘少奇就在那里学习过，陈伯达的同学之中就有王明。尽管是同龄人，陈伯达和王明关系显然不怎么样，要不然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应该有他。估计是王明看不上陈伯达吧，毕竟当时陈伯达刚刚入党，刚刚到苏联。

学成归来，本来应该大展拳脚之时，却被捕了。时间是一九三一年，被关在北平的草岚子监狱，被判刑两年。应该说 he 比较走运，北平是张学良的地盘。张学良虽然改旗易帜，对共产党人远不如蒋介石和汪精卫凶狠。如果在南方被捕，估计不死也得脱层皮。

陈伯达向张贞的亲属、军需员张达卿写信求救。张贞也很够意思，没有忘记之前的秘书，拿出一笔钱，让人去北平活动。在那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年代，陈伯达很快出狱。随后去了吉鸿昌那里转了一圈。吉鸿昌被杀后，他再次去了北平。在那里撞上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陈伯达发挥笔杆子的实力，搞宣传工作。他的同事中，有当时另一个笔杆子，柯庆施。

刘少奇到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那会，陈伯达是他的宣传部长。应该说，陈伯达和刘少奇的关系还算不错。日军南下，大家都回到了延安。在那里，陈伯达遇到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那个人——毛泽东。

陈伯达一开始不被重视，因为他的身份是留过洋的。当时的国际派知识分子，大多善于高谈论阔，但是陈伯达与众不同，他闲着没事写了一本书，叫《三民主义概论》，并且托王明把它带到重庆出版。书中以编辑的方式对北伐之前的蒋介石吹捧了一番。当时虽然国共再次合作，虽然蒋介石是抗战领袖，但是国共两党的隔阂很深。毛泽东就告诉陈伯达，书不是那样写的。

陈伯达接触到毛泽东之后，立马和毛泽东神侃起中国古代哲学。因为陈伯达之前在北平以哲学老师的身份打过掩护。毛泽东认识到陈伯达和苏联那帮理论家不同。一九三九年春，陈伯达调到毛泽东办公室，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在那里，他终于实现了人生的腾飞。那一年，他三十三岁。

从陈伯达的前期简历上看，他是个书生、理论家。毛泽东的秘书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战争时期的毛泽东要注意全国局势，他的秘书都是要干实事的，陈伯达一下子怎么能转变过来？那是因为毛泽东给他拟定了研究课题，即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等。陈伯达负责收集资料，再把他们理论化。抗战中，陈伯达干过最有名的事，就是批判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为了确立中国领袖的身份，找枪手代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陈伯达就负责批判蒋介石那本书，把那本书和蒋介石说得一文不值。骂蒋介石的同时，自己也大大出了一把风头。

几年之后，抗战末期的中共“七大”上，陈伯达已经跻身为中央候补委员一职。当时的陈伯达，已经尝到成功的滋味。再过四年，解放战争结束前，陈伯达已经进身为中央委员。尽管如此，他仍然只是个文人。在武人纵横天下的战场上，陈伯达并不突出。但是在和平年代，他开始崭露头角。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给五大秘书分配任务。其中陈伯达和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十年之后，沧海桑田，五大秘书的结局各不相同。胡乔木挨批，叶子龙在“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中受到牵连，田家英更是自杀，除了江青身份特殊之外，只有陈伯达辉煌腾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文革小组组长。

但陈伯达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好几次险些翻车。

比方说三面红旗席卷一切的时代，身为党内理论家的陈伯达决定表现一把。他给毛泽东提了一个书面建议。他认为那个建议会得到毛泽东的重视，结果在一九五八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非常重视地提到了陈伯达的建议：“陈伯达同志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他的建议是什么内容呢？他建议我国消灭商品生产、取消商业、否定货币的作用。取消货币，这是否定价值法则嘛。”毛泽东说话时板着脸，搞得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

郑州会议的经历导致了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一开始赞同彭德怀“反左”，遭到批判后，迅速转变路线，跟随大部队批判彭德怀：参加革命“是来入股的”，说他“有军阀习气”，有“反骨”。

如果是这些还不是特别严重，那关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事情就不好说了。当初刘少奇写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人气正火。陈伯达为了赢得刘少奇的好感，主动提出帮助刘少奇修改，但是刘少奇那本书后来成为毒草。再比方说王光美在大四清中的“桃园经验”，曾被陈伯达大力推广。但王光美在文革时也成了反面角色。

那么陈伯达是如何化解那些危机的呢？他看准时机，去找老同学（上海大学）康生，和老同事江青，一番掏心窝，证明他们是一条船上的，结盟。接下来陈伯达充分发挥笔杆子的威力，呕心沥血之下，与康生一道拿出大作一篇——《五一六通知》，文革纲领性文件。

此文一出，奠定了陈伯达在文革中的地位，加上毛泽东多年来的信任，陈伯达成为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长。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陈伯达的人生达到顶峰，同时地位也变得尴尬起来，因为他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长，但并不是核心人物。

谁都知道，文革小组的核心和灵魂人物是江青。江青鉴于身份太刺眼和资历太浅薄，不好挂帅，

才把陈伯达拉出来当旗帜。实际上凭陈伯达，没有可能扛大旗，也不可能扛大旗。如果让陈伯达真正指挥中央文革小组干那些事，他也干不了。

在陈伯达巅峰的日子里，他一句话可以使得很多人挨批，丢饭碗，甚至没命。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胆大包天之人，相反，他有点胆小怕事，总需要一个主心骨才踏实。他和江青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微妙。在文革小组内部，陈伯达地位很尴尬。

既然是文化大革命，那么理论家还是很有用武之地的。当时大家都在编写《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召集秀才们开会。陈伯达看见了《语录》，觉得很奇怪。“这是在给我编《论语》！”毛泽东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打趣说。陈伯达是中宣部副部长，回去之后，立马组织人员编写。凭借几十年的经验，陈伯达意识到，谁编《毛主席语录》，那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是理论家，当然不能把这面大旗拱手让人。但是陈伯达的心思很快被另外一件事吸引了——那就是姚文元那篇大作。

由于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对那篇文章不认可，北京各大媒体都没有转载。原本没有陈伯达啥事，但是陈伯达意识到危险。因为文章是在上海发布的，他身为北京的“首席”理论家，居然一点都不知道！那意味着他有被抛弃的危险。

陈伯达马上采取行动，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戚本禹的大作《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与之呼应。

当时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集秀才们开会。那时候正要炮轰罗瑞卿，毛泽东在开会时趁兴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陈伯达正想和江青联络，就抓住机会，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话转告江青。江青非常高兴，她明白，自己多了一位盟友。当时陈伯达的身份是中宣部副部长，喉舌。

此后陈伯达又给江青写了一系列的马屁文章，树立江青的文革旗手的地位。两人有过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两人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多次去北大、北师大等校，组织批判会，撤销工作组，号召学生“甩掉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反正就是干些添油加醋、唯恐天下不乱的勾当。

但是很快，陈伯达就成了多余的人。在江青眼里，她自己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陈伯达当组长，简直是碍手碍脚。因为陈伯达虽然能写很多马屁文章，能发明很多理论，但他本质上是一根墙头草，没啥主见，关键时刻帮不上忙。

一九六六年底，中央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烧等问题。江青闯进去搅合：“我有意见，他们总不让我民主，不让我说话。”江青当时的地位还不高，没资格参加中央会议。大家看见江青来了，知道又有好戏看了。江青也没让大家失望，大声尖叫：“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来？”毛泽东皱眉头说现在不讨论此事。

当时江青担心大家把发动起来的学生管起来，那样文化大革命这出大戏也就唱不下去了，江青也就失去了表演的舞台。虽然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但仍然很担心。于是，她大声冲着毛泽东说道：“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就要造你的反了！”毛泽东不理她。

一旁的谭震林看不下去了，呵斥江青：“你这是干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讨论国家大事的庄严会议上，你有什么权利胡闹？！”余怒未消的谭震林还加上一句：“什么东西？！”

会再也开不下去了，毛泽东宣布散会。江青大哭大闹，大家赶紧逃离是非之地。

直到此时，还没有陈伯达什么事。他跑到江青跟前，故作高深地说：“太悲伤是要伤身的。制怒，制怒。”这还不算，他还在江青面前来回踱着步子，拖着腔调说：“今天你也太过分了一点，我都替你感到难堪。这是会议，不是家里呀……”等等啰嗦一大堆。

江青本来就被谭震林抢白了一阵，难受得不行，已经很没面子了。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陈伯达不但不敢跟谭震林干，还来自己面前唠唠叨叨装唐三藏！要如此战友何用？何用？！

于是，江青爆发了，也不管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陈伯达的领章也揪了下来。陈伯达感到非常意外，想不到一个“第一夫人”敢来这么一手，老脸丢完。

不仅如此，江青还高声告诉陈伯达：“你这个窝囊废，我瞧不起你！”揪完，骂完，转身就走。等陈伯达回过神来，会场只有他一个人了。为了挽回面子，陈伯达大声喊道：“你又算老几？母乌鸦！”

此事之后，陈伯达开始明白，江青是靠不住的。万一哪天翻脸，他岂不是死得很难看？毛泽东当时已经接近七十岁了，搞不好哪天就去见马克思了，他需要新的靠山。谁呢？党章里不是写着林彪是接班人吗？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之后就是林彪了，他决定和林彪搭上关系。

说干就干，陈伯达给林办打电话，接电话的正是林办主任叶群。

陈伯达是搞关系的能手，政治敏感性也还可以。在毛泽东身边，相当于在权力中心的枢纽，所以陈伯达和很多人的关系都不错，例如和周恩来、刘少奇的关系。唯独和林彪扯不上关系，主要是林彪太特殊了，在战争年代他谁也不鸟；现在林彪的级别上来了，身边又被一群军人包围着，陈伯达想和他搞关系，也没机会啊。

不过陈伯达和叶群很熟，两人早在延安就认识。当时叶群是有名的大美女，很多人追求，陈伯达偶尔也去找叶群神侃两句。叶群一听是陈伯达，以为又要听到某个政敌被打倒了。

陈伯达抓住机会，说要打倒陆定一。当时陆定一的地位已经风雨飘摇，但还是宣传部长——陈伯达的上司。陈伯达之所以说要打倒陆定一，是因为他知道叶群和林彪对陆定一家都没有好感。打倒陆定一，至少能让叶群开心，尤其是严慰冰时常发神经写匿名信，让叶群相当不爽。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陈伯达又和叶群一起商量整治陆定一的办法。陈伯达的一系列行为，使叶群颇为开心。得知江青和陈伯达有矛盾之后，叶群就想挖墙角。

陈伯达需要林彪，是因为林彪的大腿很粗；林彪同样需要陈伯达，因为林彪身边所谓的四大金刚，说白了都是大老粗，整人还是需要笔杆子写文章，折腾来折腾去还是没超出军队之外。而陈伯达不一样，他是党内的王牌笔杆子，被广泛认可，而且又是文革组长，掌控着理论大旗。只要文化大革命还在，陈伯达的作用大大滴。

经过一番接触、沟通之后，陈伯达向叶群表决心说：“今后，我一定在林副主席的指示下工作，步步紧跟林副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为捍卫林副主席贡献自己的一切！”

就这样，陈伯达投靠了林彪，当然是暗地里的。为了避免嫌疑，陈伯达很少去林彪那里。直到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还没有明显的追随林彪的迹象。陈伯达和林彪之间，主要是靠叶群的热线联络。

尽管叶群表面上是江青的学生，处处跟随江青，到处跟着吆喝，但是该挖墙脚时一点都不客气，而且是暗地里的。所以说她们之间的友谊？呵呵，是可以用利益来交换的！

由于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关系逐渐冷淡，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老资格的康生只是顾问，隐居在幕后出谋划策，也得到江青的尊重；王、关、戚等人是小字辈，惟江青是从。只有陈伯达，资格老，地位在江青之上，干得好，会威胁到江青的利益；干不好，又会成为江青的眼中钉，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

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陈伯达不再召集文革小组开会，只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不在钓鱼台开会时，陈伯达就不去，免得碰到江青。

江青一旦看见陈伯达，就来火，总会无缘无故地把他臭骂一顿。她骂他的一个常见理由就是：为啥不开文革碰头会？然后借机臭骂一顿。其实江青也不在乎陈伯达是否召开小组会议，只是借机会发火而已，因为陈伯达还是组长，但在那个位置上碍手碍脚的，简直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啊！

同样是文革小组的成员，其他人都在钓鱼台，开会随叫随到，唯独陈伯达躲得远远的。为了避免江青的怀疑，陈伯达甚至两年时间没有见毛泽东。

更为要命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日渐深入，开始出现很多问题，越来越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些不满就要发泄到中央文革小组身上，陈伯达身为小组长，自然也是发泄对象，所以陈伯达开始意识到他的处境越来越不妙。

第三次庐山会议的分裂，导火索正是陈伯达。那么陈伯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很难给他定位。仔细观察一下陈伯达，就会发觉，他非常有趣。他相当有才华，知识面相当广阔，懂很多理论，但没有一套理论是属于他自己的。不，应该说 he 有很多理论，现实需要哪一套理论，他就拿哪一套理论出来。

也就是说他的特点是橡皮泥，随便捏，随便使用。究竟捏成哪种样子，根据他的嗅觉和判断。他的嗅觉很敏锐，因为他混迹在最高层，和所有人都很熟，对内部情况相当了解。平时无所谓，关键时候，他总是可以脱险。

正是因为他的理论可以随便捏成任何样子，所以他任何时候都在捏造理论，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一个情况：和每一个时期的每一个当红人物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但这些当红人物倒台，他又会留下这样那样的把柄。

比方说大跃进，陈伯达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表现过于激进，挨批。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原本是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的，由于毛泽东的反击出人意料，陈伯达的嗅觉没有足够灵敏，犯了错，再次挨批。

陈伯达和刘少奇的关系从来都很好。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来势汹汹，陈伯达心理也没谱。他甚至有过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当初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秀才们开会，实际上已经在部署文化大革命了。陈伯达当然很明白，他还在那段时间里投奔了江青，而且顺便报复了他不怎么看顺眼的田家英。

而与此同时，刘少奇和邓小平正向各大高校派遣工作组。刘少奇回到北京后，陈伯达写了个条子给刘少奇，上面只有一句话：“不要搞工作组。”那句话搞得刘少奇莫名其妙，要知道之前刘少奇搞大四清的时候也派遣了很多工作组，那时候陈伯达跟着刘少奇后面可是兴高采烈的。

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把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之后也很不满，不知道陈伯达在搞什么鬼。邓小平不仅当众念了陈伯达的条子，而且反问道：“陈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别忘了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

陈伯达哑口无言。邓小平接着还把陈伯达批评了一顿，陈伯达很郁闷。那么陈伯达为啥做出这个反常的举动呢？实际上当时陈伯达是想“拉刘少奇一把”。

早在起草大作《五一六通知》时，他看见了毛泽东在草稿上加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就睡在我们的身旁”非常吃惊。当时陈伯达向江青“请教”天机，江青对陈伯达说：“老夫子，

你简直成了老糊涂！你还不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指谁？你帮他推荐、修改、发表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哼，什么《修养》，全是唯心主义的一套！你给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点儿！”江青的话让陈伯达茅塞顿开。同时也惊出一身冷汗。

回北京之前，陈伯达又从江青那里得到信息，毛泽东不赞同派遣工作组，所以陈伯达才写条子给刘少奇。那么陈伯达为啥那么干呢？原因很简单嘛，因为过去几十年陈伯达和刘少奇走得太近了。刘少奇的每一个动作的后面都有陈伯达的举手赞成。如果刘少奇遭殃，搞清算的话，他自己也可能遭殃，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陈伯达清楚地记得，之前的庐山会议，他仅仅因为给彭德怀说了几句话，就被批得眼泪、鼻涕一大把。

所以陈伯达好心提醒刘少奇，让他少犯点错。

江青火了，陈伯达又想方设法投靠江青。在江青那篇自我吹嘘的《纪要》中，就有陈伯达很大的功劳。可以很肯定地说，陈伯达如果不是因为跟着林彪栽跟头，若干年之后，也必然会跟着江青栽跟头。所谓长在江湖走，必然要湿鞋。

这就是陈伯达，用他那神奇的钻营能力在各个时期搞关系。从延安时期的不得志，到毛泽东的秘书，到中央委员，等到九大时，已经是政治局常委，而且紧跟毛泽东和林彪之后，排在第三位，在周恩来之前，分量已经很足。陈伯达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排在周恩来之前；同时他也没有意识到，那绝对不是个好兆头。之前他的分量不是很足的时候，说错了话，跟错了人，还有回旋的余地。当他成为巨头之后，却狠狠地摔了下来。

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和林彪之间的关系是隐藏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陈伯达已经搭上林彪。搭上林彪之后，陈伯达暗自喘了口气。毕竟，照那情形发展下去，林彪接班，衣食住行、荣华富贵还是有保障的。可以说他胆小懦弱（江青观点），但必须承认他善于钻营，但同时也暴露了他的思想缺陷——他的思想很多，却没有自己的。虽然他脚踏两只船，看似双保险，实际上还是一条船——文化大革命的船。他好像没有想过，如果文化大革命的船翻了怎么办？

当然咯，比起那些想上而没有上文化大革命之船的，陈伯达还算幸运。

当然咯，以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他离开了文化大革命肯定完蛋。看看他干的那些事，写的那些文章，整的那些人，就能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蹲监狱都是轻的。

或许大家有兴趣，这样一个人在文革中的心境如何？难以揣摩！不过他的一段回忆录可以提供一点提示。陈伯达回忆：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大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

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接任天津市委书记。

——自己不想干了，又不能不干。

回忆录可能又有掺水的成分，但也不会全是水分，毕竟大家都是人嘛，看见自己熟悉的人在运动中惨遭横祸而产生厌倦情绪，是人之常情。陈伯达并不是一个强悍的人，何况还受到压抑和排挤，但陈伯达也没有勇气辞职。因为他明白在那种情况，辞职意味着绝望，意味着下船，所以他依然是他的小组长，依然整人，比方说闫红艳之死，就和他关系很大。

陈伯达和林彪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表面上“好”得不行，比方说陈伯达经常和叶群通电话。某次陈伯达在电话里闲聊时说了几句想吃海螃蟹。叶群非常精明，马上以“林办”的名义打电话，让空军用飞机送螃蟹到陈伯达那里，陈伯达自然受宠若惊。

但陈伯达毕竟不是林彪的心腹，虽然他极力想拉近和林彪的关系，但毕竟他曾经是毛泽东的秘书，林彪的机密他是无法参与的。据林办秘书张云山回忆，陈伯达打电话过来，叶群常常也留一手，让秘书做记录。张云山一次记录如下：“——啊！你想来毛家湾，还有点怕。你怕什么呢？——啊，你说不是怕林彪同志（叶群故意重复对方的话），你对林彪同志还是完全信任的。啊——你说你怕的是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畅，甚至一个人在暗地里哭过——怎么搞的？那几个小的（王、关、戚）过去对你不好，不是都已经处理了吗？——啊，你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嗯，你说主席对你好的，林彪同志对你好的，可是还有人对你不好。谁呢？——总理吗？——那又是谁呢？——你不好说——江不是对你很好吗？——嗯，江不像过去了——她批评你政治上不成材——你说心里难过，总想哭——你想到毛家湾来，又不敢来——你暂时不来也好。你放心，林彪同志是关心你的，支持你的——对，一组那里对你的看法也还好，你别伤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讲。再见！”

这段通话记录反映了陈伯达当时的心理状态，同时也能反映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前林彪和江青两派人马的大致状况，甚至可以反映出第三次庐山会议的背景。

为什么是陈伯达开第一炮？因为必须是陈伯达开第一炮。在林彪的集团之中，只有陈伯达最合适。如果不开那一炮，就无法表达他对林彪的忠心，就瞎忙活了。